"新史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摒弃了传统史学具有文学色彩的叙事方式，采用科学的方式将自身转换成一种历史科学。在这种所谓科学的面具下，史家借"同名异义"之法重新运用史学语言进行叙事。

本书中，朗西埃批判了传统史学修辞学式的历史书写以及年鉴学派科学浪漫式的历史书写，以诗学方法检验各种政治修辞学的美化，从这种美化中无法取得名字的历史之间，找出断裂的空隙，破除意义与真实在书写上的连结。

或许，这种"新史学"不过是另一种"同名异义"的字词游戏，但即便如此，亦无碍于朗西埃将其称赞为一场史学的革命。

上架建议：哲学 历史
ISBN 978-7-5675-5751-2



定价：45.00元
www.ecnupress.com.cn

责任编辑 / 王莹兮　装帧设计 / 姚 荣

VI HORAE

历史之名　论知识的诗学

Les noms de l'histoire : essai poétique du savoir

[法] 雅克·朗西埃 著　魏德骥 杨淳娴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4





轻与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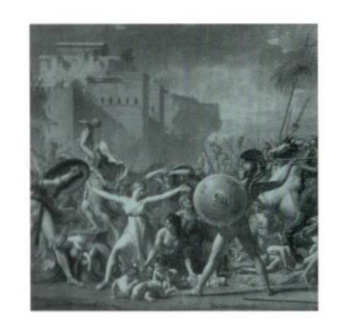
44

历史之名

论知识的诗学

[法] 雅克·朗西埃 著　魏德骥 杨淳娴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Jacques Rancière

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poétique du savoir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与重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Fabian Heubel） 主编

历史之名

论知识的诗学

[法] 雅克·朗西埃 著 魏德骥 杨淳娴 译

Jacques Rancière

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poétique du savoir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世纪的战斗

[f.7|c.1]“超过一世纪以来，那些关心历史的人，且不在少数，始终与文字奋战不辍。”

一位这门学科的大师曾这么说，他的意图也很明显。想要跳脱编年传统的历史学家，尽可能地将科学的严谨注入历史，与那些附加于历史之名的预设前提和模棱两可进行抗争。所谓历史，就一般意义而言，是一系列的事件经由专有名词普遍指定而成为主体(sujets)[①]。然而一场历史科学(la science historique)的革命，其主要目标即

① 〔译注〕sujet 在此理解为主体。关于作者对历史主体形成的说明，请参考第七章，特别是第 219 页注 1 标示的段落。

为废除那些重大事件及专有名词的优先性,为了彰显那些长时段(longues durées)[1]与无名之辈的生命。[f.8]以这样的方式同时要求追还它属于科学时代和民主时代的关系。且历史的第二个层次,则是将一系列事件的叙述(récit)[2]归属于专有名词。而叙述通常特征在于不确定性,当它关联到相关事件的真理,以及它所归属之主体的实在性。根据它所要表达的(l'expression consacrée)[3],如果任何历史都可说不过是个故事(histoire)[4],那事情就太简单了。历史的特性就在于,总能够太是或太不是个故事。如果认为事件的确定性乃随同于主体的确定性,

---

① 〔译注〕长时段(longue durée)是由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重要概念:"去定位一种可以延续得更久,一次可以数世纪的历史:长期的,同时是非常长期连续的。这种形式(formule),不论好坏,变成我习惯用于指明与其对立的……'事件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引自 F. Braud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s: La Longue Durée, *Écrits sur l'histoire*(Paris: Flammarion, 1969), 44—45. 该词已成为历史学的专有名词,在中文里固定翻译为长时段。

② 〔译注〕法文的 récit 与另一字 narration 在意思上互为解释,而英译均为 narrative。为了有所区别,前者翻译为叙述,后者翻译为叙事。在以下的章节里除特别注明,对此二字的翻译保持固定。

③ 〔译注〕consacrée 原意是被视圣的。此处意指一种被限定的表达。

④ 〔英注 1—1〕作者在此援引法文 *histoire* 的同名异义,同时有历史和故事两种意思。

也是将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但精确地说,[c.2]总是有可能将真实事件归属于虚构或替代(substitution)的主体,或将虚构事件归属于实在的主体。趣味化的历史(l'histoire amusante)和历史小说(le roman historique)同样在此不确定性所授权的路径与曲折中栩栩如生。

很显然的,这些问题已经不再困扰我们。历史科学的兴起把自己构作成对抗趣味的历史与历史小说。为了这个目的,旧学派的历史学家提倡对于数据源的严格检视以及对档案的考订。[f.9]也是为此,新学派的历史学家钻研起地理、统计、人口统计学。如此一来,这些在历史研究中用来建构的材料就必需栖荫于舆论的寓言故事(fables)和文人的刻意扭曲。舍去这些方式,没有结构的材料什么都不是。一般来说,知道一件事便不需再去思考它,而我们避免去考虑的仅是:历史,终究被认为只有一种且永远不变的结构——发生于诸般主体身上之一连串的事件。我们或可选择不同的主题:王权的更替、社会阶级、研究地中海或大西洋的历史而非将军或船长,但我们总不免堕入任何辅助学科的严格性都无法保障避免的虚空:要去命名主体,去将它归属于状态、情感、事件。编

年传统的追随者早在一世纪前便等待着这些历史革命的党徒，为了提出如下警告：那些欲使历史能赶上科学和大众的时代而提出之对象与方法，[f. 10]只有造成指涉(référence)的不确定，以及推论(inférence)的难以证实。而使用那些好的旧方法，不断地更新，便可望在某种程度上充分确定君主、将军、使臣的所作所为、驱动他们的想法、其政策的后果、成功或造成后来失败的理由。借由档案和史家的考订，我们能够区分可严肃归属到路易十四或拿破仑身上的事件序列，与否定了拿破仑存在或者虚构路易十四孪生兄弟①之挑衅有所不同。但统计序列的严格性如何能够让历史学家毫无风险地支持宣称(énoncé)，根据这种宣称，布尔乔亚②曾经验过某些情况，无产阶级已然知道某种演化，或地中海(la Méditerranée)

① 〔译注〕指法国史上的一段轶闻：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有一名受到长期监禁的囚犯，辗转于包括巴士底及皮涅罗要塞(今意大利境内的 Pinerolo)等著名监狱，他脸上戴着黑天鹅绒面罩，无从知晓其身份。在伏尔泰于 1771 年出版的 *Questions sur l'Encyclopédie* 中提到此人戴的是铁面具，是路易十四的兄弟。但也有一说为路易十四的私生子。大仲马以此为题材写成了《达达尼昂浪漫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布拉热洛纳子爵》(*Le Vicomte de Bragelonne ou Dix ans plus tard*)，在书中铁面人身份为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

② 〔编注〕即资产阶级(bourgeoisie)。

曾经历过某些事件？[c. 3]远离历史的传统主体以及附属于其可见性上的证实方法，就是穿入一个主体和事件的确切意义为之动摇，以及对主体加以指涉与对事件加以推论的方式也为之动摇的领域。举例来说，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来自新史学的典型句子：[f. 11]"征服的沙漠是否不止一次侵入了地中海？"①诚然科学时代的历史学家想从大事件和大人物肤浅便宜的可见性上转向。但他所宣称越是确定的科学，同时也是一个越不可信的历史，把任何历史特有的指涉对象(référent)与推论的不确定推向了界线。

或可这么说，这是个字词(mots)的问题。这是在法语中不幸的同名异义(homonymie)，将生命的经验，与其忠实的叙述、欺骗的虚构、知识的解释，都指定到同一个名字。正是为了寻求避免此种同名异义的陷阱，像是英

① 〔法注 1—1〕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Armand Colin, 1949, p. 184. 除非特别说明，书中引用概以此版本为准。〔英注 1—2〕英译者的说明：书中引用的文本如有英译，则直接引用英译本的句子；若无则由译者从法文直译。〔译注〕此处此书已有中文译本《地中海史》(曾培耿、唐家龙译，台湾商务出版，2002 年)。以下的章节译文中凡提到此书名，概以《地中海》简称之。

国人将故事(story)与历史(history)区分开来。为了关切在它们之间的特殊性里,探索生存经验的厚度以及论述建构的条件,德国人则分成史学(Historie)和史事(Geschichte)。这些常见的指涉规则能够在其方法的展露里填补某些漏洞;但它们的作用也仅止于此。同名异义的猎人所作所为与其他人并无不同:他们将一连串的事件归因于各种主体。除此之外别无他事可做,至少写不成历史。且同名异义的猎人也普遍地成为那群同名异义的受害者,[f. 12]于年鉴学派(*Annales*)中认识到历史论述科学革命的父亲血脉。其原因基本上很简单,但却往往以自相矛盾的方式显现。语言的混淆事实上是必需的,为了在其严格性当中测量如下两难:新的历史科学将不再是历史,但依然必须要成为历史。在作为科学的历史与作为叙述的历史之间的差异,必然产生于叙述的核心,随着叙述的字词以及对字词的使用。

这场新历史的战斗一开始就是两面作战。在自恃尽其所能地赋予历史确定性之旧学派面前,出现了科学的好使徒和坏使徒,俯身向着新历史的摇篮。坏使徒鼓励新历史采取行动以投身于科学确定性的领域:[c. 4]抛弃

事件中不重要的连续性或任意的因果关系;以事实来代替:事实不再归属于任何特定主体,而是在重复中可被观察,让自己根据自己的特性加以分类,与其他同类甚或不同类的事实相互关联。[f. 13]他们也指出了所有用来找寻数据源与运用适合于研究这些新对象的方法的手段。借由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中介,新历史以追随统计学家的教诲为荣。它承认自己受到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①的挑衅去攻击旧历史的三个偶像:政治的、编年的、和个人的。但在西米昂之前,一个无名的哲学家路易·布尔多(Louis Bourdeau)②在他出版于1888年的重量级作品中,已然语带争议地描绘出此一新历史的代表性场景:一片几乎波澜不兴的汪洋,这片深广宁静对立着

① 〔译注〕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 1873—1935),法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为涂尔干的学生。在他于1903年发表的论文《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Méthode histor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6, 1—22)中,认为有三个史家族群的偶像必需推翻,即本文中提到的:政治的、个人的、与编年的偶像。请参考 Peter Burke 著,《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89》,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14。

② 〔译注〕路易·布尔多(Louis Bourdeau, 1824—1900),法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以实证科学进行知识分类,以及对历史学家角色的传统概念和进步主张提出批判,其主张影响了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

国人将故事(story)与历史(history)区分开来。为了关切在它们之间的特殊性里,探索生存经验的厚度以及论述建构的条件,德国人则分成史学(Historie)和史事(Geschichte)。这些常见的指涉规则能够在其方法的展露里填补某些漏洞;但它们的作用也仅止于此。同名异义的猎人所作所为与其他人并无不同:他们将一连串的事件归因于各种主体。除此之外别无他事可做,至少写不成历史。且同名异义的猎人也普遍地成为那群同名异义的受害者,[f. 12]于年鉴学派(*Annales*)中认识到历史论述科学革命的父亲血脉。其原因基本上很简单,但却往往以自相矛盾的方式显现。语言的混淆事实上是必需的,为了在其严格性当中测量如下两难:新的历史科学将不再是历史,但依然必须要成为历史。在作为科学的历史与作为叙述的历史之间的差异,必然产生于叙述的核心,随着叙述的字词以及对字词的使用。

这场新历史的战斗一开始就是两面作战。在自恃尽其所能地赋予历史确定性之旧学派面前,出现了科学的好使徒和坏使徒,俯身向着新历史的摇篮。坏使徒鼓励新历史采取行动以投身于科学确定性的领域:[c. 4]抛弃

事件中不重要的连续性或任意的因果关系;以事实来代替:事实不再归属于任何特定主体,而是在重复中可被观察,让自己根据自己的特性加以分类,与其他同类甚或不同类的事实相互关联。[f. 13]他们也指出了所有用来找寻数据源与运用适合于研究这些新对象的方法的手段。借由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中介,新历史以追随统计学家的教诲为荣。它承认自己受到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①的挑衅去攻击旧历史的三个偶像:政治的、编年的、和个人的。但在西米昂之前,一个无名的哲学家路易·布尔多(Louis Bourdeau)②在他出版于1888年的重量级作品中,已然语带争议地描绘出此一新历史的代表性场景:一片几乎波澜不兴的汪洋,这片深广宁静对立着

---

① 〔译注〕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 1873—1935),法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为涂尔干的学生。在他于1903年发表的论文《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Méthode histor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6, 1—22)中,认为有三个史家族群的偶像必需推翻,即本文中提到的:政治的、个人的、与编年的偶像。请参考Peter Burke著,《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89》,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14。

② 〔译注〕路易·布尔多(Louis Bourdeau, 1824—1900),法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以实证科学进行知识分类,以及对历史学家角色的传统概念和进步主张提出批判,其主张影响了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

个人与事件的小小浪花。他问道，一个极震撼的事件，其真正的影响幅度究竟有多大？法国大革命对于四亿中国人来说并不存在，甚至在法国，“那些最热烈的议论与最响亮的胜利炮声”①并未能进入到全体人民的最深层。**“在一些偏远山区，许多祥和的村落里，根本对这些似乎是举世皆知的大事从未听闻。”**②我们甚至无须顾及那些偏远山区。[f. 14]就在据说是最动荡的中心地带，也不见事件发生的痕迹：

> 不管发生什么大事，每个人继续做他的活儿：播种、收成、制造、买进卖出，根据他的需要和习惯去消费……在恐怖统治(Terreur)这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巴黎还有二十三家戏院依旧蓬勃。其中一个剧团上演着“迷人的”歌剧珂莉桑德(*Corisandre*)③，另有一些感伤剧或搞笑剧；咖啡馆座无虚席，到处都是散步的人潮。①

① 〔英注 1—3〕Louis Bourdeau, *L'Histoire et les historiens* (Paris: Félix Alcan, 1888), 120.

② 〔英注 1—4〕Ibid.

③ 〔译注〕十八世纪法国三幕芭蕾舞剧，由 Honoré Langlé 作曲。描述两对法国贵族因故中了魔法师珂莉桑德所下的爱情魔咒，与学者 Lourdis 一同对抗代表旧政权或教会的邪恶法师 Agramant，拯救自己的伴侣。结局 Lourdis 赢得了珂莉桑德的芳心，两人与贵族和(**转下页注**)

结论是不证自明的：

> 不管谁去注视思索普遍规则与事实的整体关联，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看起来值得研究。在人类诸般事物的大海里，波浪此起彼伏。当渔夫的小船为之高举，[c. 5]他确信看到了环绕周遭的高山和峡谷；但当观察者从岸边看过去，只看到平滑的表面，几乎不起一丝波纹，终端处是一条永恒的地平线。②

考虑历史这条不动又移动的地平线，也就是研究这

(**接上页注**)人民一同赞颂爱情。此剧首演于 1791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就在路易十六逃离巴黎前三个月)，因而原著剧本中包含了许多没有人乐的革命文字，或以较温和的内容取代之。

① 〔法注 1—2〕Louis Bourdeau, *L'Histoire et les historiens*, Paris, 1888, p. 120—122.〔英注 1—5〕Ibid., 122.

② 〔法注 1—3〕Ibid, p. 122.〔英注 1—6〕

些“**函数现象**”(«phénomènes de fonction»)——后来称为“**物质文明**”(«civilisation matérielle»)的事实[f. 15]与“**心态**”(« mentalités»)的现象——附着到人类活动的重大常数:那些触及生存、制造、交换、传递、还有笑与爱、认识与创造的必然性。历史的任务在于跟随这些几乎不能感知的运动:把这些活动与惯常秩序抽离,投向发明的宇宙。因此,历史就像任何科学一样,运作(opérer)①出它的哥白尼革命。它必须转向“**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最必须尊崇的英雄……,一群无名众生**(la foule des inconnus)②”。这些真正的英雄与无名的发明者,其受埋没的劳动应当在他们能够说自己语言的地方得到承认,一种适合于这些无名众庶(multitudes)活动的语言、数字与函数的语言。

---

① [译注]此处法文强调作为科学的历史所具有的可运作性。请参考 Simondon 对于可运作性的定义:运作(opération)就是将一个结构转换成另一个结构。Simondon, Gilbert,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Paris: PUF, 1964), 44, 263. 此一概念在之后的段落中仍继续出现(见法文 20 页“... pour en opérer la suppression”[允许历史语言……以运作压制]与同页次段“Pourquoi s'est-elle opérée...”[何以它……持续性的运作]),而在英译中似乎忽略了关于运作的意涵。

② [法注 1—4]Louis Bourdeau, *op. cit.*, p. 29.[英注 1—7]

人类事实的科学,长久以来一直是描写的与文学的,注定会成为完全的计量。这些函数现象,这门科学基本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有两种决定大小的计量模式,计算的和几何的。一方面我们可将其转换为数字,另一方面,则是将其藉由图形(曲线图或统计图)再现成肉眼可见的形状,[f. 16]总结在一目了然的图像中,作为长序列之事实的普遍语言,这些事实的演变、关联、和定律,都明白地出现。提升至科学尊严的历史理想(l'idéal de l'histoire),必须要是用这种方式表达理解所有的观念,以及除了要解释和注释这些公式之外不再使用字词。①

历史科学之理想,摆脱了历史/故事字与句的不确定性,便能够将那些曾仅是“**人类生活的小说**”(« roman de la vie humaine»)转换为真实认知。这种科学一点也不会

---

① [法注 1—5]*Ibid.*, p. 291—292.[英注 1—8][译注]引文最后一句法文为“de n'employer plus les mots que pour expliquer...”英译为“no longer to employ words to explain...”,本书译者魏德骥认为可能是文法上的误解:“ne plus que”的意思相当于英文的“only”,本句的英译似应是“employ words only to explain”,而非“no longer”。

局限于仅仅是人口、制造或商业的数据。[c.6]相反地，它目睹了一个建立在更有意义基础上之智识史的开启，诸如证书、文库或图书馆的统计；或者一个从日常言谈中去研究感觉和道德的历史，例如在对于婚姻的统计或遗嘱的分析中。

难道这和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所声称——连结人口统计学的科学优先性与人民(*dêmos*)的新政治主权——不是相同的革命吗？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晚年在事件的模糊和善于欺瞒的朦胧知识中所掌握的不是相同的论述吗？[f.17]或者与肖努(Pierre Chaunu)在序列史(l'histoire sérielle)上的能力，即将所有人类事实包容在一个彼此相关的网络里，不是相同的论述吗？晦涩难解的布尔多是否为一个未被承认的先驱，对于在历史学上取得胜利的**年鉴学派**而言，他们是否显得忘恩负义？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年鉴**史家并非不知感激，而是心知肚明。他们知道科学时代的医生所提供的回春处方，其实是安乐死的手段。邀请历史科学将历史/故事虚假的语言替换为数学的共通语(la langue universelle)，等于邀请它不带痛苦地死去，却未先善尽告知。

长时段的统计学提供给未来的是比较社会学的元素。历史将只是在某些场合里用来解释残留社会现象时有用的历时性维度。晋升到科学尊严的历史，实际上却消失在伟大的社会科学里。后者不仅为前者提供了研究对象，并指定了认识方法。那些不仅是历史科学尖酸的敌人，[f.18]同时也是慈爱的指导者之涂尔干学派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内心深处便是这么想的。

这场历史革命的特性不单单在于知道如何定义长时段、物质文明，以及大众生活的新客体，也不单是知道如何运用数字语言的新工具。而是知道如何辨认，在科学时代的海妖歌声中，面对沦亡的威胁，即在科学化命题中所隐藏的两难：**不是历史就是科学**。为了响应，就得知道如何维持同名异义的游戏，因为只有它能够将分割(disjunction)转为结合(conjunction)：[c.7]既是科学也是历史，这意味着——非历史与历史，强调名字与事件的力量，这种力量勾连着叙述本体论的不确定性，然而它或许只适合保存一般历史科学的特殊性。此历史革命可说是为了结合这些矛盾对立所做的空间安排。就姑且对这项创举献上些许敬意，赞美一下费夫尔和布罗代尔作品的巧妙书名

吧，像是：《菲力普二世与孔德地区》（*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①、[f. 19]《地中海与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他们的想法是，同时也让别人这么认为，如此一来便将他们的科学新兴趣——由长时段形塑而成的大范围生活史——与对其研究伟人名字与外交历史的恩师们之敬意调和一致。但这项结合的技艺并非出于谨慎权衡或者学术敬意的简单规则。将新历史对于国王之专有名词的兴趣与研究连接起来的这个"与"字（*et*），不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是对于"不是……就是……"（*ou bien… ou bien…*）的特别回应。这不单单只是一个用字的问题。它属于一种对知识的客体与语言的诗学（poétique）阐述。费夫尔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直觉地了解到：历史只能靠玩弄自身之名的暧昧性去进行这场革命——在语言的

① 〔译注〕孔德地区（Franche-Comté）指勃艮地"自治领地"（Free County）。1384年，因法兰西国王Jean II de Valois的幼子，勃艮第公爵大胆菲力（Philippe le Hardi，即菲力普二世）与佛兰德女公爵Margaret III联姻，而归属于勃艮第王朝公爵们的长期统治下。在历史上，此地的统治权因欧洲的王室联姻时而变动，与邻近的法国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保持着微妙的政治关系。参考张淑勤，《低地国（荷比卢）史（台北：三民书局），33—34。

实践中，挑战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对立。这不单只是能够调合一者的精确与另一者的魅力。更深刻的是，唯有故事的语言适合标记历史科学特有的科学性：这不是一个修辞学问题[f. 20]——让年轻的科学与昔日大师的先见和建置规范得以一致，而是关于诗学的问题——在真理的语言中构成亦真亦假的历史语言。这场历史学家与历史这个古老名字的世纪之战，毋须像任何一门年轻的科学，不论多久，都得与其意识形态的前历史清算债务。这就是它特有的动力原则：对于命名用字，归属的文法、结合与从属关系的句型结构，进行无止境的修订与论战，允许历史语言玩弄其不确定性以运作压制、否定自身以促进叙述和科学间不可能的一致，让事件发生的时间相等于它被压抑的时间。

[c. 8]以下的篇章企图对此结构当中的一些特异的结（nœud singuliers）进行研究。何以它针对一些模板对象与人物施予持续性的运作？这些如何成为布局（intrigue）①的

① 〔译注〕根据法文字典对intrigue的解释，（在虚构作品中）用以结合事件与行动的构成脉络，此字为histoire的同义字，但更强调作为展开与导引故事的叙述。参考Gustave Vapereau,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s littératures*（Paris: Hachette, 1876），1070—1。呼应本章第二段提到历史的结构以及此处讨论的诗学问题，英译为plot（情节），此处翻译为布局以求表达其意。

一部分？在布局的逻辑与一定数量的句法使用——[f. 21]主词、补语与述词的部署，结合与从属的玩弄，动词的现在式和过去式、它们的有与无——之间有何关系？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历史学家的风格，而在于科学的署名。这些署名并非附加在论述之后的私人附录，而是其自我认同的记号，将专有名词与一般名词、词与物、言说存有(êtres parlants)的阶序与认识对象的阶序，加以统合的专有名词。我称这样的研究为**知识诗学**(*poétique de savoir*)的一种：一种对于整套书写程序的研究，借由这些程序，使论述脱离了文学，赋予自身科学的地位，并且指出此一地位的意义。知识的诗学所关注的在于知识是如何被读和写，如何被建构为一种特殊论述类型的规则。它企图定义知识所献身的真理之模式——而非提供规范，更不是为了让科学的妄称生效或失效。它无疑特别涉及到这些所谓的人文或社会科学，两个世纪以来，它们或有幸或不幸地尝试在真正的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① 尝试移除

① 〔译注〕法文"depuis deux siècles"(两个世纪以来)指十八世纪末以来发展迄今的人文社会科学，英译为"for centuries"意思并不明确。后半句"dans le concert des varies sciences"精确的意思应为(转下页注)

对于它们仍属于文学或政治作品甚至两者皆是的无尽怀疑(soupçon)。[f. 22]但是知识诗学并非要去证实这份怀疑，唤起历史学或社会学从它们科学的野心脱离，回到文学程序与政治前提。它更采取了由此三重强调构成特色的行动。① 人文和社会科学是科学时代的孩子——在基础科学中发生了许多决定性革命的时代；但同时也是科学信念的时代，根据特定的科学理性观念去构想任何行动的理性，这种科学理性其实和此处谈论的革命没有必然关联。但是——我们这么容易就忘了——这个科学时代同时也是文学的，在这个时代中，文学如此自我命名，并将它特有行动的严格性从虚构的单纯魔力中区分开来，如同自不同诗类和文艺传统程序的分类规则中区分开来。最后——我们越来越"**了解**"(« sait »)——民主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即便在那些对其反抗或恐惧的目光中，[c. 9]民主显现为现代政治的社会宿命，这是大众与

(接上页注)"在真正科学的谐和中"，le concert 指音乐或声音的和谐，英译 accord 一般指不同团体或意见的一致或协议。

① 〔译注〕"它更采取了……的行动"，原句"Elle prend... cette triple articulation."见法文本 22 页。英译本漏译此句，此句中的"三重强调"与下一段提到的"三重契约"相关。

大规模管制的时代,使其成为科学的计算成果,[f. 23]但也是一个扰乱了客观精确之崭新的无秩序与任意决断的时代。

新历史属于这个时代与这个构造。它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在这些科学的穷亲戚当中,起初它似乎扮演最贫穷的远亲,尽管有那套统计学装备,但它注定要承受自然语言的逼近、意见的混淆,以及文学的诱惑。如果它依然经常扮演启蒙者(porte-flambeau)的角色,绝不单只是因为其古老的建制所赋予它的社会分量。更因为它的贫困的基进性,使它更根本地去探索语言所支配的权力,让科学和文学得以显现,为了运作它特有的压抑。且因为它严格地将自己保持在科学与非科学同名异义的空间,因为它保留了说给孩子们听的故事,以及教育学生的共同体传奇之名字,历史足以进行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将三重契约(un triple contrat)置于一个论述下强调:第一是科学的契约,它必需透过一个复杂程序的精确关联和算计,[f. 24]替代政治上可见大小与加权的尺度,以揭露在表面阶序下的潜在阶序。第二是叙事(narratif)的契约,它命令这个隐藏空间之结构或这个复杂程序之法则

的铭刻,以一个可阅读的故事形式,有开始和结束,有人物和事件。第三是政治(politique)的契约,它将隐藏的科学与可读的叙事,连结到大众时代里矛盾的限制——习惯法(la loi commune)的大规模管制与民主的大规模混乱、革命与反革命;众庶的隐藏秘密与一个人人可读、人人可教之共同历史的叙事。

如何将这三个要求置于一处?前二者似乎完全矛盾,第三者则总结与再生了这个矛盾。为了要掌握在此历史革命核心中的强调,我们必需进入历史学家的工作坊。

第二章　死去的国王

[f. 25 | c. 10]且让我们考虑一段独特的叙事，取自新历史的经典作品，《地中海》。在书的最末章，就在结论之前，布罗代尔向我们描述(raconte)①一桩事件，菲力普二世之死。

他向我们描述，或者他对我们说(dire)何以他不用叙事的一般阶序来描述："**在此场所(lieu)与位**

① 〔译注〕英译者似未注意 raconte 与 dire 的差异，均翻译为 tell，第二段开头时才将 raconte 改译为 relate 和同段出现的 dire/tell 加以区分。根据法文字典的解释，raconte 指作出详细的关联，而 dire 着重在对某人说某事的行为。关于言说(parler)的问题在本章有更详细的展开。

置(place)①，我们不引述它为一件传遍大海与世界的重要事件：西班牙的菲力普二世，死于一五九八年九月十三日。"②

所以他向我们描述某事，这件事并没有在它的位置上，按照事件与叙事的阶序去描述：一个场景理当中止这段叙事却未达成。[f. 26]原因并不难了解。先前一千多页的篇章早已给了我们充分解释：中止从未发生过。这声噪响传遍了大海与世界，却未返回其历史中的任何事件：历史就这么轻轻摇动，将世界的中心从地中海移向了大西洋。

假使西班牙与葡萄牙国王之死算不上是一个被历史学家记录的历史事件，他似乎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就是只字不提(parler)，第二种则是提到这个事件，

① 〔译注〕英译将 lieu 与 place 均译为 place，在两字同时出现的状况下，有时也会以 location 与 place 区分(见英译本 11 页"outside the location and place that should have belonged to it")。似未明确呈现在本书中 lieu 和 place 作为两个不同的重要概念。

② 〔法注 2—1〕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p. 1085.〔英注 2—1〕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iân Reynolds(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2:1234。英译者按：翻译有些微修改。〔译注〕此处的中译为从法文本直译。

[e. 11]为了解释它在描述中不再具有一席之地(lieu),在历史的新领域里,不再具有作为重大事件的价值。

而布罗代尔做了第三种选择,一个最不合理的选择,不论就科学观点或叙事观点:他去描述了一个其实是非事件(non-événement)的事件,在它所应回到(revenir)[1]的场所与位置之外。毫无疑问地,这个不合逻辑的逻辑再清楚不过:移动这个事件,将它摆到结尾,在分隔了整本书与结论的空白边缘,这么做将它转换成自身的特有隐喻(métaphore)。我们可以将菲力普二世之死的移位理解为隐喻了一种历史的死亡,[f. 27]事件和国王的历史。此一用来结束全书的理论事件之意义在于:国王之死不再作为事件。国王之死意味着身为历史中心与力量的国王已死。

这个事件可以解释。历史学家选择描述它:把国王之死描述成历史中皇家形象之死亡。于是叙述的原理会

① [译注]此处的 revenir 英译为 belong to,中译为"回到"乃是呼应前文"这声噪响……却未返回(renvoyer)"(见法文本 26 页与英译本 10 页),强调历史叙事对事件的回复或回忆。英译在处理前文(refer to)与此处时均忽略了回复的意涵。

以一种叙述取代另一种,在菲力普二世的主体下归属了一个无关于他的系列事件。据新史家所描述,国王菲力普二世之死并非归为尘土,而是归于无声。

从一个段落换到下一段中,叙述的游移带着我们从国王晚年的典礼仪式来到他全盛时期的肖像。在叙述尾声的国王之死,并非国王躺在床上临终的样子。国王被安置在他的王座或书桌前。他被隐喻地放到死亡之中,确定他已闭口不言,无话可说。死亡如同文字,沉默犹如柏拉图《斐德若篇》(*Phèdre*)的图画,在一个依旧绵延的时段中,以愚昧的庄严对立于生动论述之德能。

[f. 28]国王的肖像是如此再现的:

> 我们历史学家冒昧地接近他:他像是对待使臣一般地接见我们,以最高雅的礼貌风度聆听我们,回复以晦涩难辨的低语,且绝不谈及自己。[1]

① [法注 2—2]*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p.1086.[英注 2—2]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2:1236.

因此他是个沉默的王，或说是文件中的国王（un roi de papier）。历史学家如今将他呈现给我们，透过他埋首伏案的工作、报告上潦草书写的批注——我们或可说，就像那些高尚的柏拉图主义者的沉默的书写。所以他所批注的无疑是旧历史的材料，宫廷事件与国王性情的外交信函。用这样的方式去勾勒出国王的肖像，[c. 12]那么，借由改变观看的角度，就像叠片上（lamelles）的画像会因观看者的位置不同而产生变形，如何不能同样辨识出某个老学者的肖像，像是著名的瑟诺博司（Seignobos）①，或者新史学中别的出气筒（tête de Turc）：

① 〔译注〕瑟诺博司（Charles Seinobos，1854—1942），法国历史学家，任教于巴黎索邦大学，研究政治史、文明史，也为第三共和时期撰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他与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合着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Paris：Hachette，1898）对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具有重要影响。根据 Peter Burke 在《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89》（*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Cambridge：Polity Pres，1990）认为，或许因为这个缘故，瑟诺博司便成为旧史学改革者所反对的象征。经济学家西米昂（Simiand）与年鉴学派的费夫尔（Febvre）都对瑟诺博司作出尖锐批判。参考 Peter Burke 著，《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89》，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13—15。

他不是有远见的人……他视他的任务为一连串无止境的小细节，每个批注都是一个精确的小点，无论是规则、评论、拼字的校正或地理的勘误。[f. 29]我们决不会在他的笔下找到普遍的观念或伟大的观点，我不相信当地中海这个字浮现在他脑海时曾经伴随着我们所给予的那些意义，这个字也绝不会让他联想到如我们所熟悉的阳光碧海之意象。①

国王之死因而可说是让人物（personnage），随我们高兴，把他当成国王或历史书写者：他是擅用文字或制造文件的人，一个沉默的人，他的无声特别展现在他对于海洋意指着什么一无所知。

我们可以将这一幕读作是对于历史的哥白尼革命的纯粹隐喻：从国王的历史移动到海洋的历史，改由一个区域的文明、一个长时段的大众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去了

① 〔法注 2—3〕*La Méditerranée*...，*op. cit.*，p. 1087.〔英注 2—3〕Braudel，*The Miditerranean*，2：1236.

解历史。然而,在我们去理解此隐喻的意义为何之前,我们必须先决定其组成为何,当中哪些部分是本来的意义(le propre),哪些部分是比喻(le figuré)。困难就从这里开始,文字的独特性让我们停步:在这些叙述中何者为实在(réel),何者为象征(symbolique)?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对象为谁? 我们知道这个特别的人物特征——国王低声诉说——[f. 30]象征着事实上国王的论述对于教导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并不重要。但是,菲力普二世真的低声诉说了吗? 是否这是我们从编年史家和外交官的证词当中归因于他的一项特点? 抑或得自于提香(Titien)画像[①]中的紧闭双唇? 还是出自威尔第(Verdi)所编写的男低音,借用了席勒(Schiller)笔下与墓穴相连的国王形象,[②]被活生生

① 〔译注〕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提香于1554年为菲力普二世绘制的肖像。现藏于佛罗伦萨碧提宫的帕拉汀那美术馆(Galleria Palatina)。

② 〔译注〕指威尔第1867年的歌剧唐·卡洛(Don Carlos),改编自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悲剧作品 Don Karlos, Infant von Spanien (1783—1787)。描述菲力普二世之子(Carlos, Prince of Asturias, 1545—1568),与嫁给菲力普二世的法国瓦卢瓦王朝伊丽莎白公主,以及其父的三角爱情故事。间接呈现了在哈布斯堡王室与瓦卢瓦王朝之间复杂的政治情境。

埋葬于他的埃斯科利尔(Escorial)[①]? 历史学家的文本绝对不会让我们知道。也不会明说如何去辨认君王所特有潦草书写的品质。更不会说明何以历史学家认为所召唤的地中海,[e. 13]对国王而言不是阳光或碧海。在这里,每一个带有象征价值的个别特点,也可以是新史家欲与旧历史告别的所刻意写成的譬喻(allégorie)。在这点上,文本是不可决定的。历史学家并未给我们论点定位的方法。当他标示出任何来源的引用,为历史学家与其笔下人物引入了距离,他就消解了要彻底压制这个距离的文本作用。事实上,学者的声音除了用以清算君主统治与皇家历史的学者声音,[f. 31]同时也就是君王的与谈者之声,在亲近中被令人晕眩的模棱两可所吸引:**“我们历史学家冒昧地接近(*abordons*)他,他像是对待使臣一般地**

① 〔译注〕El Escorial 全称为“埃斯科利尔圣罗伦佐王家修道院”(El Real Monasterio de San Lorenzo del Escorial),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北方,是西班牙的王居所在。由菲力普二世于1563年开始兴建,1584年完成,以教堂为中心,实为结合了修道院、宫殿、陵墓、教堂、图书馆、慈善堂、神学院、学校的庞大建筑群。此处葬有从十六世纪自二十世纪初期多数的西班牙国王遗骨,并保存了菲力普二世的房间与他的个人物品,历来王室所收藏的艺术珍品,以及图书馆内大量的卷宗手稿。在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指定为世界遗产。

接见……"当然我们了解历史学家是在玩弄接近(*aborder*)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和比喻。没有读者会认为所谓的接见是真的,布罗代尔与菲力普二世确实有过会面。反之要质疑的是,图像中历史学家的出现,站在与提供旧历史档案之使臣的同一层面上,有何意义。历史学家为何坚持要将自己也再现在这幕情景当中,与国王交谈,在他的书房里打转,当他书写时凑过去看他写字,甚或在其他段落,大大咧咧地坐在国王的沙发上或文件前?

我们或可视其为一种风格转喻(figure de style)?或历史学家的返祖现象(atavisme),促使他们当中最热衷的破坏偶像分子,每当一个国王通过他们的笔下,去构成那些圣西门(Saint-Simon)[1]式的肖像、场景,以及道德规范?不过问题是去了解风格(*style*)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而且对回忆录作者的参照精确地标示出差异。[f. 32]这些国王亲信的编年史是以过去式(passé)写成。

① 〔译注〕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法国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主张人类历史可依照客观原则来发展,借由科学和技术可望逐步解决社会的诸般问题。在他晚期的作品《新基督教》(*Nouveau Christianisme*, 1825)中提倡一种新的宗教规范,认为社会全体应该努力朝向在道德和现实上减少贫穷阶级的目标进行重组与改善。

国王书房中历史学家的突然在场,强调了在新历史叙述中现在式(présent)的主权。

历史的学术化革命要透过叙述时态的革命方才揭露。大致来说,这个方法少有评论。利科(Paul Ricoeur)曾经尝试指出《地中海》一书如何仍是一种叙事布局。不过他似乎把其论证与关于时态的文法问题切割开来。[1]然而,从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对于论述时态与叙述时态的分析来看,这种用法的特异性所带来的冲击要如何避免?[e. 14]我们知道本维尼斯特如何在他的经典中以两种基本的标准去对比论述系统和叙述系统:对于时态(temps)与人称(personnes)的使用。因为有着以说话者企图说服其说话对象之个人介入的特色,论述自由地运用动词的所有人称形式,相反地,在叙述中所偏好使用的人称——第三人称——事实上具有人称缺席的作用。论述同时也使用除了不定过去时(l'aoriste)之外的所有动

① 〔法注2—4〕Paul Ricœur, *Temps et récit*, Le Seuil, 1983. 书中并没有对这个分离多作解释,并非因为疏忽,而是取决于作者的现象学视角。〔英注2—4〕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trans.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词时态，[f. 33]但主要为关联到论述时刻的现在时、完成时与将来时。历史的表述(énonciation)相反地排列在不定过去时、未完成过去时和过去完成时，排除了现在时、完成时和将来时。时间的距离和人称的中立给予叙述未承担的客观性，相对于论述肯定的在场，其自我证实的力量。① 学术化的历史(l'histoire savante)，根据此一对立，可定义为两者的结合，或者以注释兼解释的论述为架构之叙事。

因此，新历史的一切任务即为破坏这个对立游戏的规则，在论述的系统下建立叙述。甚至在《地中海》当中属于"事件的"部分，论述的时态(现在时和将来时)和叙述的时态大都一起出现。在别处它们加强了支配，将确实性的力量赋予叙述的"**客观性**"，为叙述所缺乏，使它"**不只是故事**"(«plus qu'une histoire»)的确定性。突发的事件便同于长时段的事实以现在时来说，前后行动的关

① 〔法注 2—5〕Emile Benveniste, *Problèm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Gallimard, 1966, p. 231—250.〔英注 2—5〕Emil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ans. Mary Elizabeth Meek(Coral Gables, 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195—215.

联，则以后者的将来时来描述。

[f. 34]叙述的重组不能被简化为"**风格技巧**"(« artifice de style»)——以本维尼斯特的说法——文法的"**历史现在时**"(le «présent historique»)。它无关乎修辞的技术，而是涉及知识的诗学：对历史学家的用句而言，涉及一种真理的新政权(régime)之新组成(invention)①，由论述的确定性与叙述的客观性结合而产生。这不再只是将所描述的事件安插进论述的解释架构。被安置于现在时的叙述所具有的断言力量可与论述相比。事件与其解释，法则(la loi)与其阐示(illustration)，都出于同样一个现在时的系统，以这个取自《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的段落为例，[e. 15]它阐明了如何从一个局部的例子看出在长时段中流行病的规律发展："**另一条没有例外的规则：流行病总是从一群人跳**

① 〔译注〕invention(inventio)在修辞学中具有组成的意涵，源自拉丁文 invenire(寻求)，强调发现的过程，是在许多惯常的一般说法，包括了因果、比较、关系等称为"发现主题"(topics of invention)的材料中，寻求说话的新方式。且根据西赛罗在 De Inventione 的说法，是"找寻最有效的方法以提供最可能的原因"。很近似于亚里士多德对修辞的定义"找寻最佳的说服方式"。

(*sautent*)到另一群人。阿隆索·蒙特库奇(Alonso Montecucchi),被托斯卡纳大公爵遣往(*envoie*)英格兰,他将取道(*passera*)布隆……而不经过加莱,在那里英国瘟疫……刚发生(*vient*)了流行。"[①]规则的时态乃等同于事件的时态。且此同一性延伸至另一对,本义的和比喻的:渡海的这位使臣,[f. 35]和跳跃的流行病具有同样的存在模态。新历史欲确保事物的优先性高于字词并且标示出每个时态的可能。但要去区辨事物的分量和时态的特

① 〔法注 2—6〕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 (*XVe—XVIIIe siècle*), Armand Colin, 1967, t. 1, p. 60.〔英注 2—6〕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trans. Miriam Kochan(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45. 引文斜体处为朗西埃所强调。〔译注〕朗西埃所引用的是第一卷的初版,内文及法注中的书名均无"十五至十八世纪"等字样。这个初版本收录在《世界的命运》(*Destins du Monde*)丛书,是布罗代尔因其师费夫尔之嘱,将他对于欧洲工业革命前经济的研究成果先摘要出版。在 1979 年全三册出版时书名改为《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ᵉ—XVIIIᵉ*),第一卷也作了扩充改写,另名为《日常生活的结构》(*Les Structures du quotidien*)。英译所使用的版本同样翻译自法文第一卷初版。此书全三册已有中文译本,关于写作缘起请参考赖建诚的推荐导读: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卷一)》,施康强、顾良译(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7),VIII。在以后的章节中若出现此书名则概以《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简称之。

殊性,仅能够在不可区辨的诗性原则下操作。流行病散布的真正论述以及国王和历史学家会面的虚构叙述,源于相同的语法和相同的本体论。本义的与比喻的在此似乎不可区辨,国王接见历史学家的现在时,正呼应着使臣旅程的过去将来时(futur passé)[①]。

国王之死叙述的独特性,似乎能因此语言学重组的观点而得到解释。国王之死可用来比喻一项具有双重意义的运作。它标示了叙述系统,这个旧历史的特征,被论述系统所吸收,借由这种方式可能使它变成一门科学;反之将论述的范畴放入叙述,若不经过这样的运作,新科学也不再会是历史。叙述-譬喻(Le récit-allégorie),不可区辨者的叙述,运作着论述范畴和叙述范畴之间的交换,让新历史以皇家编年史之死的方式记述下来。[f. 36]在场的历史学家与死亡的国王之间独特的会面(face-à-face),能够充分比喻那响应了时态系统革命的代名词系统革

① 〔译注〕法文中以条件式现在时(le conditionnel présent),表达在过去里的将来时。例如:"Il m'a affirmé qu'il viendrait le lendemain."(我已确定他次日会来),若将主句动词改为现在式,后半句就成为真正的将来时:"Il m'affirme qu'il viendra demain."(我确定他明天将会来)。

命。环绕着历史学家的知识集体里向皇权借来的我们(*nous*),在与叙述产生距离的他(*il*),和支撑论述的现在时的我(*je*)之间,交换彼此的性质。

但是国王当然不只作为代名词的功能,也不只是一个属于过往叙述的第三人称。国王也特别奠立为第一人称来发言,[c. 16]当他在皇权的复数(le pluriel de majesté)中,将其言说的独特性与超出独特性的合法性机构等同起来。他特别是一个专有名词和署名,规范了言说存有以及言说与命名使用之合法规则两者的接合。国王与他的言说和书写的比喻,是叙述-知识诗学(la poétique du récit-savoir)与一种政治的连接点,在此,科学的合法化与政治合法性的比喻两相交会。

很显然的,这样的结合并未揭露以下问题:对于菲力普二世之死的伪叙述结合了两种意义[f. 37]——不再将君主作为历史客体,以及不再将使臣作为历史知识的来源。在他们的位置上被推立为王的,正是在国王的心思中缺席与公爵的使臣所回避的:那片孕育人类历史的蓝色大海,而人们将形塑其历史作为回报;流行病所传染的大众,与集体现象的大规则。借由空间、流通、人口和集

体事实等科学提供数据,结合了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和统计学,历史从这些新客体中提炼出知识。此一科学的置换呼应了一种政治的置换,不在君主的时代,而在大众的时代脉动。

但是,在这个图像中有件事抗拒着由国王的去合法到学术化历史的新合法性这种过度简化的结果,在旧与新的关系中,在国王、使臣、历史学家和大众所形成的四边形当中,有一个秘密的不对称:阳光普照的碧海,这个"好"对象的独特状态,出现在它对于国王精神上的缺席;大众以自己为代价,[f. 38]以证实使臣绕过的科学定律;和历史学家一起接受召见的使臣之固执,以及他的函件,再度指出内容的可笑;历史学家独特地自满于在图像中再现自己,流连于国王的书房,浏览他的文件,表现得像是爱伦坡笔下的侦探,仿佛在国王注记的文件里有什么秘密是既显露又隐藏的。这些信件被我们当成使臣对于宫廷景象与秘密的公函。但在此书的《序言》——不是一个譬喻的叙述,[c. 17]而是方法论的阐述(exposé),作者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切入,揭告事件历史的陷阱无效,且提供了一个对于国王的独特解读:

让我们不再相信这个依旧燃烧热情，被当时的人感受、描述、在与我们同样短暂的生命律动中所经历的历史。这是他们的愤怒、梦想或幻觉交织而成的维度。在十六世纪，真正的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穷人的文艺复兴(la Renaissance des pauvres)，这些卑微的人，渴望书写、描述自己以及言说他人。这批珍贵的故纸(paperasse)严重地扭曲，[f. 39]滥用侵入了这个被遗忘的时代，占据了一个真理之外的位置。当历史学家在菲力普二世的场所与位置阅读他的文件，便被转移到一个缺少向度的奇异世界；①无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界；如同任何一个世界(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一般盲目，毫无挂虑于深层的历史，使我们如小舟般颠扑其中的深层活水。②

从对于事件历史的方法论述开始，如同于以皇室终

① 〔译注〕此句的英译为"... into a strange one-dimensional world"(进入一个奇异的单向度世界)，法文原句为"C'est dans un monde bizarre, auquel manquerait une dimension"(一个缺少向度的奇异世界)。

② 〔法注 2—7〕*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p. xiii—xiv.〔英注 2—7〕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1:21.

结的叙述作为开始，一个滑动使得两个现在相遇，让历史学家通往国王的"位置"，在一个作为其专有隐喻的场所，四个角色在此展开新的交会：国王、历史学家、穷人——取代了使臣的地位——以及海洋，在此完全转入隐喻的层次。对方法的论述一叙述悬挂在事件的叙述一论述，本义和比喻的游戏在另一个主宰的模棱两可中规定自己，比较没有那么不恰当，但却更加成谜："穷人的文艺复兴"，就比喻上，它是个虚假的或讽刺漫画式的文艺复兴，对立于从本质上去掌握的真文艺复兴；[f. 40]但同时就本性而言，这样的文艺复兴是由这些"穷人"(« humbles »)所生活，由此下层和落后的位置去理解、表现和误解。但究竟谁是这些穷人呢？是谁将来突然被加以凸显而谁又在此景中随即消失？在十六世纪时他们的数量是否多到足以去书写下他们的愤怒和热情？他们是否寻常到足以让他们的书写被君主们所认识，在御书房中聚积成堆？在哪一点上这些故纸堆具有充分的侵略性特别去建构出诠释之体(le corps d'interprétation)，[c. 18]让历史学家在检视王家档案和历史书写时优先整理出来？对于这个庞大的故纸堆，我们只知道它无场所(non-lieu)。历史学家

在此似乎向我们提出，于任何确定的参考文献之外的一个虚构的寓言，统合了模棱两可中的本义与象征意义：犹如柏拉图式的**神话**（*muthos*），当中穷人并非比喻任何被定义的社会领域，毋宁比喻了与非真理（non-vérité）的基本关系。在事件的层次上，穷人的话语是盲目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够发言就是个事件。[f. 41]他们"**热切渴望**"（«s'acharnent»）书写，为他者发言，讲讲他们自己。此种渴望是这些做了没有场所去做之事的人们常有的缺陷。穷人说错话是因为他们没有说话的场所。在历史科学（la science historienne）①的譬喻当中，这些穷人比喻了知识的"**好**"对象之反面，也就是大众。大众扭曲（pervertissent）了自身，借由移出自己的场所之外，停止这些将他们客体化的大规则，使自己破碎化融入描述自己与描述他人的主体说话中。这些穷人是假扮成主体或历史学家的

① 〔译注〕historien(ne)英译为 of historical study 或 in historical study(历史研究的)。一般作为名词的意思是历史学家，此处罕见地作为形容词来使用，例如：历史特质(l'esprit historien)、历史活动(activités historiennes)等见于近代学术文章中对于"历史"的讨论。请参考 Centre National de Ressources Textuelles et Lexicales, s. v. "historien.", http://www.cnrtl.fr/definition/historien.

历史客体，是自我解体，分解到言说存有中的大众。在这个哥白尼革命的中心，似乎将历史学家科学的合法性，奠基在皇家言说的不合法化，而奠基在这个空洞（vide）上，"穷人的文艺复兴"导入了另一种空洞，此即"**他的**"（«sa»）革命之拟象（simulacre），让历史环绕着任何巧遇的言说。这种纸上革命（révolution de paperasse）①，同时入侵了王宫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坊，在两者间定义了一个负面的团结关系。

在穷人的故纸堆、死去国王的位置，以及窥伺历史方法（la méthode historienne）严格性的危险中，这个新历史的譬喻所描绘出的谜样关系该如何理解？[f. 42]或许对此我们要做一个很长的迂回，关系到另一个国王之死，在菲力普二世平和地死去后的半世纪，相较于后者的平静，由一位哲学家所构想出来，框架出英国查理一世暴力死亡的两本书中：现代的第一次大弑君，第一个在政治上建

① 〔译注〕paperasse 翻译为"故纸"，英译为 mass of paper，原意指无价值的废纸。另一相似词 papier 意思较广，可指纸张、文件、文稿等。因"故纸的革命"或"纸堆的革命"在中文并不通顺，因此翻译为纸上革命，英译为 revolution of paperwork。

立其合法性的弑君。我指的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论公民》(*De Cive*)和《利维坦》(*Leviathan*),特别是其中讨论导致叛乱原因的章节。这些章节能吸引我们注意,在传统叛乱思想框架下——[c. 19]政治体(corps politique)的动荡不安与疾病,霍布斯引入了一套演出法(dramaturgie)与范例,用以思考叛乱对政治和科学所再现的危险之间的关系。

两个基本特色定义了这个新演出法,使它对立于继承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自此以后,这不再是关于将一者转换到另一者之政权与原因的分类。它关系到如是政治体的生与死。[f. 43]这并非讨论各个独特政权延续的本有法则,以及其灭亡肇因的问题。而是让政治体如何存续的法则,不管那是什么,以及讨论刺激其崩解的法则。至于第二个特点,那些更加激进的效果是被显然更加薄弱的原因所制造出来的。古代思想将暴乱原因的多样性(multiplicité)归结为两条原则:阶层冲突与权力再分配的失衡。但是让现代政治体崩毁的原因要更为少。它们首先是一切不当用字与无根据的句子所组成的意见与事务。政治体为流窜四处、任何地方的字句所威胁;比

方说,“**你必须听从你的良知甚于权威**”(« il faut écouter la voix de sa conscience plutôt que celle de l'autorité »),或者“**废除暴君是正义的**”(« il est juste de supprimer les tyrans »),这些传道者自利的句子,却能满足许多听众的耳朵。政治的弊病首先是字词的毛病。太多的字词,不指向任何东西,除了精确指向它们武装了杀手所反对之标靶。

[f. 44]以**僭主**(*tyran*)或**暴君**(*despote*)这个字为例。事实上这样的名字并非任何一类、任何一种性质的名词。[①] 从两件事当中产生了一个名字:一个被认为该死的所谓暴君,不是合法君主就是篡位者。政治的契约载明应顺从前者。但却不存在反叛的**权利**(*droit*)以反抗后者。因为篡位者并非其臣民可以合法惩罚的坏君王。单纯只是与之没有任何契约的敌人。政治体的成员与他没有合法性冲突,而只有战争关系。在**暴君**或**僭主**这两个例子当中,它都是一个没有参照对象的字,一个不合法的名字,本身是篡权造成的结果。

---

① [译注]此句同时出现的“名字(name)”和“名词(noun)”都是法文的nom,英文都翻译成name,但法文本来所具有的同名异义却难以表现。为求中文语句上通顺故加以区分。

霍布斯认为，政治(la politique)[1]是这些没有参照对象的名字之病人，也是这些没有场所却为了两种理由、出于两种共谋而得到身体的句子之病人。[c. 20]首先是道成肉身式的共谋，传道者们抓住机会指称那些反对他们宗教推行的君主为僭主或暴君，那些“癫痫患者”(«épileptiques»)便在宗教书籍中找到适合于招募天真老百姓的道德故事或预言。[f. 45]再者是与书写的共谋，让暴君的比喻形象有了生命和一致性：在古代文本以及其模仿者所撰写的文本中充满了过往历史与暴君、暴政及其厄运的理论，以及赞颂刺杀暴君者的故事与诗歌。[2]政治体的第二种主要病症便是这么被助长的：文学与复古的**狂犬病**(*hydropho*ic)与宗教**癫痫症**(*épilepsie*)结合，透过这些字句摧毁了主权的身体。[3]

---

① [译注]朗西埃对于 la politique 一词有特别的使用，有别于另一词 le politique。后者广泛涉及了政治的概念或形塑条件等，而前者指向政治的行动或实践。

② [译注]此句同时出现两次 histoires，英文都翻译为 stories，为强调法文中 histoire 的同名异义，故将前者翻译作历史、后者为故事。应该都可以指向第一章所提到趣味化的历史或历史故事。

③ [法注 2—8]Hobbes, *Léviathanm*, Sirey, 1971, p.348—352, et *Le Citoyen*, Garnier-Flammarion, 1982, pp. 214—227.[英注(转下页注)

霍布斯将“**文艺复兴**”或穷人的“**故纸堆**”用激进的理论与戏剧状态加以概念化。构成它的是那些寄生的声音和书写，它们不只侵入了主权者的书房，并且用没有身体的字词所形成的幽灵——作为刺客的幽灵——使他的身体——人民(peuple)的真正身体——超载，以及赋予这些分散成任何人(*n'importe qui*)的众庶一些政治体的属性。

同样的幻象，实际上将一个空的名字(暴君)指派给国王的身体，且赋予众庶一个只能够符合主权身体的名字，也就是人民的名字。一个政治意涵虚构的荒诞场景便如此构成，[f. 46]这种政治虚构把巧遇的任何人放到人民论述的合法发送者或接收者的位置上，此论述缀合了圣经预言或先贤教训的演说，甚或两者的混合，对于两者的模仿与再模仿。霍布斯所见证诞生的现代革命可以定义如下：书籍之子的革命(la révolution des enfants du

---

(接上页注)2—8]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Richard Tu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5—28; *De Cive* or *The Citizen*, ed. Sterling P. Lumprecht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49), 128—40.

Livre)[1],那些“渴望书写、描述自身、言说他者”之穷人的革命,在场所之外与真理之外言说者的蔓延,聚集了在其范围中拖曳书写的两种巨大身体之性质——预言的癫痫症(l'épilepsie prophétique)与模仿的狂犬病(l'hydrophobie mimétique):它是一场纸上的革命,皇家的合法性与政治的合法性原理被它所击败,在欲实现另一个合法性的言说与言说者的增殖中碎裂,从古代史与圣经书写的字里行间所涌出的人民之奇幻的合法性。[c.21]此即,在菲力普二世与霍布斯的时代,那些反君王者(monarchomaques)、神的士兵(soldats de Dieu)、以及古代(l'Antiquité)之狂热者的故纸堆,由这些人所增加“合法的”言说的炉火,以及同时代的戏码(repertoires),使名字可以变换,使比喻和议论可以建立,[f.47]让专制或自由可以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样貌出现的议论。这些故纸的效果不仅在于扰乱心灵以图备下弑君的大斧。其更深刻

① [译注]小写的 livre 意思是书本、簿籍,大写时可指宗教的圣书、圣经,政策的(白皮)书等。在此处谈论书写之现代革命的脉络下,将大写的 Livre 翻译为书籍。在本书第五章谈论到宗教异端与心态史革命时则取其宗教上的意涵而翻译为“圣书”。

的意义是国王的初次死亡,纸上的死亡给予他一个奇幻的身体,以夺取他真正身体的属性。

以在两处都涉及国王之死作为薄弱的借口,是否真有需要将哲学-政治的场景与历史学家的科学场景连在一起?当然布罗代尔对此毫不在乎,也与去知道他在乎什么无关。此与民主时代学术化历史叙述的书写条件有关,与科学、叙事、政治三重契约的强调之条件有关。由此观点来看,这两个场景之间的关系并不表达近似的模拟,而是表达一个相当确定的理论结。在英国革命和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所打开的政治与理论空间中,国王之死成为双重事件,一个在政治与科学的共同危机中、缔结它们的事件。理论与政治之恶,对霍布斯和他所开启的传统而言,[f.48]或可以以下方式加以辨认:那些借来的名字,与任何现实不相似的名字,以及被不当使用——被不应使用它们的人所操弄,被将这些名字脱离本身脉络置于一个与原先状态完全无关的脉络下的人所使用——而引起杀戮的名字之蔓延。这个危机来自所有漂浮的名字,来自于同名异义与比喻的多样性,这些比喻不命名任何实在的性质,而是透过比喻去发现掺入任何地方的方

式。政治的失序严格地等同于知识的失序。现代革命实现在作品中的恶与形而上学实现在作品中的恶相似：它是任何确定观念都无法附属的字词之恶。霍布斯因而在科学观点与皇室观点之间建立同盟，一个我称之为皇家经验主义(royal-empirisme)的理论传统。这个传统将会滋养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c. 22]以及对于伯克(Burke)将捍卫之人类"形而上的"权利的批判。但也就是这个传统，将借由科学批评代换政治论战，滋养出一整套社会知识的传统：它将不眠不休地召唤字词，[f. 49]使它们招认与其所说的彼此一致或不一致，特别是为了举发字词中不适当与虚幻的同名异义，经由这些字词，国王与皇室接受审判，也是在这些字词中，民主时代的革命与伟大运动得以产生与发声。自查理一世死亡的事件以来，这个传统权衡了现代的政治与历史，而历史是一种政治与理论双面怀疑的后果。即便其罪名似乎在民主共识中得以抹除，非真理的根本怀疑却依然持续，并且被证实本当唤起原初场景中的鬼魂。

穷人故纸的论述与皇室之死的叙述间有种对称的怪异，它开启又封闭了《地中海》，让它铭刻在此理论与政治

空间的限制中。这个限制取消了曾经以国王为中心而如今以大众为中心的哥白尼革命之美好图像。这个限制禁止了单纯的重合发生在给予国王与大使的退场(le congé)，以及那隶属于对大众生命进行具体与严格加工之与料(données)的科学历史的提倡之间。[f. 50]为了从事件的历史过渡到结构的历史，必须将大众从他们的非真理中分离出来。从皇室编年史过渡到学术化历史，即为在国王的书桌上一种双重故纸堆的遭遇。有使臣的函件，国王臣仆微不足道的故纸。以及"穷人"的故纸，那些真理之外的说话者之故纸堆，侵入了历史失落的时间。霍布斯和那些开明的保王党在其中看出了这个死亡的武器。布罗代尔与那些思虑清明的现代社会知识建立者，则定其位为生命的"盲目"。在这两个判断当中丝毫没有矛盾。相反地，它是涂尔干(Durkheim)所特别强调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公设(axiome)之一：一种使得生命染病的生命过度——因盲目而病，对其病症盲目。生命的过度唤起了死亡。在社会中聚集的言说存有之生命过度，一开始就是言说的过度(l'excès des parole)。字与句的过度，[c. 23]使得大众时代的人民盲目于让社会体得

以维持与成为科学对象的庞大平衡与大规约。字的过度(l'excès des mots)不仅杀死了国王,[f. 51]也窃取了民主时代的人们对于维持其社会生存之法则的认知。

我们知道这个双重威胁如何决定知识政治的社会学计划。我们也看出它如何限制历史知识的诗学(la poétique du savoir historien)。新历史不能单纯地从国王之死中接收它的新对象。就像所有合法的社会科学,它必须将这个曾经杀死皇室合法性与威胁到知识合法性的言说存有之过度生命加以规范。然而,这种要求对它来说,比起其他社会科学,更加至关重大。以自己的名字,与言说存有之疾病共谋的新历史,借由它的对象以及它的新主张,与国王之死和合法言说之危机亲密相连,它有一个迫切的使命,去重写原初场景,给予国王另一个书写的死亡,与一个合法的科学继承者。在菲力普二世之死的叙述中所聚集之历史书写(l'écriture historienne)的种种比喻——本义和比喻的难以识别、现在时的暂时王权、论述和叙述的权力交换——最后呈现了一个确定的意义。它们远离任何"风格技巧",回应由皇室经验主义者分析国王之死为理论与政治灾难所抛出的挑战。[f. 52]

它们抹除了非真理这个落在大众时代特有知识的最初污名。对于承载于故纸上的国王之死,这个由它们所建构的譬喻——同质于学术化的叙述——反对另一种适用于为了大众时代的历史去定义一个真理场所的国王之死的典范[①]。历史知识的诗学是回答知识政治或天真或野蛮之提问:要如何给予国王一个好的、科学的死亡?

① 〔译注〕此处英译为"a site of nontruth"(非真理的场所),而原文为"un lieu de vérité"(真理的场所)。

第三章　字词过度[①]

[f.53|c.24]死亡国王的场景或者沉默国王的场景也就使另外一个场景透显出来，对于历史论述的状态来讲同样重

① 〔译注〕朗西埃本章标题使用"字词过度"（L'excès des mots），不免令人联想到福柯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谈论字词与事物的关联。在本章中也的确有些段落显示出这种迹象。然而本章更多篇幅在谈论言说的过度。言说过度与字词过度之差异，在于前者牵涉到言说主体活动中的过度，不仅仅是被书写出的字词过度，也说明了朗西埃的诗学批判，虽然经历对书写过度与字词过度的谈论，但这种书写过度的谈论问题并不局限在传统修辞学可能中，或者一般的记号学谈论中，而是加入了言说与政治主体的无场所问题。从诗学的角度反观之，朗西埃不使用言说过度为标题，局限了他在全书中诗学考察的范围，此范围以古典与大革命修辞中的字词过度为出发点，尝试引出两种言说过度的差异。此种大革命叙事的修辞差异，引导出下一章大革命奠基叙述新型态言说过度的语言场所。

要：这个场景是一个活人讲得太多或者扭曲：在场所或是真理之外。历史言说的严肃性受到盲目或者令人盲目的言说方式丧失它的可信度。这种言说或者会是编年史或历史，根据它处理一种事件/非事件的方式，或是文学的或知识的，而这个言说它的主体并不具有一种导正它所谈论指涉的性质。

对这个场景就好像对前一个场景一样，历史学家的选择很清楚地迂回写作，历史学家无法言说一堆科学上不重要的故纸。他言说解释为什么不将这堆故纸考虑进去。[f.54]最后，他能够重做一个叙述，叙述这个场景所说出的事。

这个选择相当清楚。然而答案可能非常复杂。我们可以衡量复杂性，借由比较两种域外言谈的方式，其中一种借用编年史和文学的传统，另外一种用现代科学史笔。那么请在两个作品中比较历史言说的形式，这两个作品在时代上，在主旨上，在书写上，彼此之间都有无限的距离，但是两者都涉及过度言说的欺骗性事件：[c.25]一个是塔西佗的《编年史》（*Annales*）[①]，另一个是阿弗瑞德·

① 〔译注〕塔西佗（Tacite, 58—120），古罗马帝国时期历史学家。其《编年史》记录公元14年奥古斯都死亡、提比略继位，到公元68年尼禄（Nero）死亡的罗马历史。此罗马史重要著作之手抄本于（转下页注）

科班(Alfred Cobban)的作品《法国大革命的意义》(*Le Sens de la Révolutino française*)①。

在《编年史》第一卷十六章②塔西佗告诉我们一个反叛事件:潘诺尼亚(Panonnie)的罗马军团叛变,在奥古斯都(Augustus)死后一天,③被一位叫做伯森尼亚斯(Percennius)的奇怪煽动者所激发的叛变。如果这个段落吸引我们的注意,很明显是因为他已经是一位大批注家的对

(接上页注)公元 1508 年于德国富尔达(Fulda)修道院被发现。塔西佗亦是修辞学家,其修辞学受到西塞罗(Cicero, 106—43 B. C.)与昆体良(Quintilian)影响。朗西埃引用奥尔巴哈的《模仿论》来谈论塔西佗的历史修辞与共和政治,从西塞罗的修辞传统来看,有其历史内在发展,西塞罗的修辞理想与共和理想,即在伦理与政治上的紧密连结。和大革命修辞关系更紧密的,是塔西佗作品对大革命思想家修辞的直接影响。参考 Ronald Mellor, Tacitu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Tacitus' Annals*(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8—225. 朗西埃在此引用塔西佗,巧妙地在自认为继承罗马史学的法国大革命共和传统中,区分了两者的差异。

① 〔译注〕阿弗瑞德·科班(Alfred Cobban, 1901—1968),伦敦大学学院(ULC)的法国史教授,和福雷(François Furet)并列为法国大革命修正主义史学的代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的意义》(*Le Sens de la Révolutino française*)法文本于 1984 年出版,由 F. Lessay 翻译,勒华杜拉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作序。

② 〔译注〕《编年史》第一卷十六章说明在奥古斯都死后,执政官的选举权转移到元老院后,外省爆发叛变。于第十七章中模拟了伯森尼亚斯的演讲。此叛变为提比略派其子透过和谈解决,以处决首谋告终。

③ 奥古斯都死于公元 14 年 8 月 19 日。

象,这位大批注家艾立克·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在他《模仿论》(*Mimesis*)①的第二章里,评注塔西佗所提供的言说再现以及大众运动的再现,且把这个再现对比到《马可福音》中的彼得拒绝耶稣的叙述所揭露的再现。

[f. 55]塔西佗叙述的特异性如奥尔巴哈已经很清楚地注明了,这种特异性如下:他精细的重建了罗马军团的伯森尼亚斯的论证,带着具体的细节以及带着他说服性的力量,然而就在提供给伯森尼亚斯这个令人信服的言说之前,他就宣称这个言说是空洞的,而且没有任何结果。塔西佗严格地呈现了这个言说的无场所,而且他严格地将这无场所转写出他的场所,这个场所是一个空档(vacance),一个在军事训练中的悬置空闲,奥古斯都死了,而提比略(Tibère)②还没有继位。一个客观的空洞存在,这个空洞在军营之中,定位了将领的决断点,是要表达悲伤或是喜悦的喜好我们不知道,它终止了平常的军事训练,从没有

① 〔译注〕艾立克·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 1892—1957),德国重要的语言学与文学批评家。其代表作《模仿论》于 1946 年初版。

② 〔译注〕提比略(Tibère),奥古斯都的女婿与义子,潘诺尼亚(Panonnie)的征服者。公元 14 年 9 月 18 日即位,至公元 37 年 3 月 14 日去世。

任何真实原因或者深刻的理由而只是从空洞纯粹的产物里，有事情发生出来。罗马军团无所事事于是滋生了因为闲散而为人所熟知的后果，产生了种种罪恶，“**不满、滋扰不和，倾向于听从不良的意见，最后产生了对于快乐跟休息过度的爱好，以及对于纪律跟工作的厌恶。**”①这种强制的休闲就会因为休闲专家，一位剧场人，“**某位伯森尼亚斯所利用，因为伯森尼亚斯之前是剧团的头头，却成为一位一般的小兵，他是一位大胆的演说者而且以他在剧场的经验，**[f. 56]**他能够鼓动人形成这个计谋。**”②

在说明叛变的理由前，塔西佗已经指出没必要去找这个理由。正好是演习的空档，树立了场所中的无场所，提供那些不该说话者以言说。恰好是这个空档，容许在

① 〔法注 3—1〕Tacite, *Annales*, I, XVI, trad. L. Wuilleumier, Les Belles Lettres, p. 20, commenté par Erich Auerbach, *Mimesis*, Gallimard, 1968, p. 45 *sq*.〔译注〕此句拉丁引文为“eo principio lascivire miles, discordare, pessimi cuiusque sermonibus praebere auris, denique luxum et otium cupere, disciplinam et laborem aspernari.”

② 〔英注 3—1〕Tacitus, Annals, bk. 1, chap. 16, in *The Works of Tacitus*, the Oxford Translation (London: Bell, 1888); quote in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35.〔译注〕此句拉丁引文为“erat in castris Percennius quidam, dux olim theatralium operarum, dein gregarius miles, procax lingua et miscere coetus histrionali studio doctus.”

军事训练的沉默之中，树立起完全相反的东西：这种世故剧场统治者的喧嚣。

伯森尼亚斯不该说话，然而塔西佗让他说话，[c. 26]而他的话是安排过的、精确的、有说服力的，他描绘出军旅生活的艰辛以及每天要付十块钱的悲惨，十块钱是对他们身体与灵魂的估价，此外他们还要去准备自己的武器、自己的器具，以及自己的营帐，更别提要算入送给百夫长们的礼物，要送给百夫长礼物是为了避免任务或者因为百夫长的残暴。他唤起退休生活的剥削，退伍军人们慷慨地被配给在沼泽里的湿地或在山上的贫瘠土地。而他对这些艰苦的揭露，结束在对于薪水以及服役时间的精确要求：“**兵役每天给一个第纳尔（denier）①，第十六年时回归平民、超过这时限，就没有留在军旗与帐下服务的义务，而他所在的军营里面就要付现金，作为他们的补偿。**”②

[f. 57]这个叙事仿佛被极端分割的方式组织起来。

① 〔译注〕第纳尔（denier），古罗马银币单位。

② 〔英注 3—2〕Tacitus, quoted in Auerbach, 36.〔译注〕此句拉丁引文为“quae binos denarios *acceperint*, quae post sedecim annos penatibus suis reddantur.”

叛变以两方面解释：一方面以他缺乏理由来解释，一方面以他所提供的理由来解释。且只有第一种有解释的价值。并非伯森尼亚斯的理由被宣告为错误。史家[①]并没有评论他也没有拒绝他。这些理由并没有被说成是真的或假的。最基本的来说这些理由和真理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的不合法性并不在于内容而只是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上，这个事实也就是伯森尼亚斯并不在合法说话的位子上。像他这种位阶的人与思想或是表达他的思想无关。且他的话只平庸地复制讽刺诗或喜剧的"低级"文类。从他的口中表达出基本冲突这件事是被排除的，在他之中用一种现代的方式，看到一个在社会的深处中作用着的历史运动之症候性代表被排除。人民中人的言说从定义上就不具有任何的深度。既没有任何的场所可以解释伯森尼亚斯的理由，也没有什么场所可以拒绝它们。只有在其专属的融贯，在宣称它们主体的惯例中，才有场所去加以重述。

然而重述伯森尼亚斯的理由并不是重复他。谁还知道伯森尼亚斯会说了什么？[f. 58]塔西佗毫无疑问地对

① 〔译注〕此位史家(historien)指塔西佗。

这一点没有任何讯息。而且这也不重要。重做这个论述，不是一个档案纪录而是一个发明之事[①]。这牵涉到去知道一个这一类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说什么话。且在荷马发明了特尔西特斯(Thersite)[②]这个角色之后，这些贴切的范例已被模仿了上百遍。毕竟，[c. 27]不幸与要求的表达在他的说理中过度完美，在他的意见表达中过度精巧，以至于没有人会相信任何一个伯森尼亚斯有能力去做出一个类似的表达。说话的不是伯森尼亚斯而是塔西佗，塔西佗提供以他的语言，就好像他在别处借用了卡尔加库士(Galgacus)[③]或者阿古利可拉(Agricola)的语言。这些是修辞学的一小块，按照惯例与相似的规则，

① 〔译注〕发明(invention, inventio)除了发明的意思之外，在修辞学传统中的意义是文章的组合，或者谋篇布局的意思。朗西埃在此主要使用该词的修辞学意义，但常常在修辞学意义中也蕴含了发明了新的叙述方式。

② 〔译注〕特尔西特斯(Thersite)，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第二书212—277中典型的恶棍，行为容貌与德行都同样丑恶。

③ 〔译注〕卡尔加库士(Galgacus)，公元83—84年在苏格兰与阿古利可拉对抗的塞尔特酋长。阿古利可拉(Gnaeus Julius Agricola, 40—93)为塔西佗的岳父，塔西佗对岳父丰功伟业的家族书写，定位了元老贵族阶层在皇帝与平民之间的突出地位，即使在帝国中元老式共和已不再可能。

写来模仿范例与充当范例，在修学的学校里，提供其他的模仿者当作范例。在此唯一的特异性，牵涉到它所模仿之人的位阶。然而模仿的修辞学传统为了要达到叙述生动的目的以及道德示范的目的，他会让不同尊严的人讲话，在使他们回到正常的位置前，把他们先提升到文学的尊严上。

对奥尔巴哈而言这种叙事的分割等同于一种双重的剥夺：[f. 59]塔西佗剥除了伯森尼亚斯的理由和声音，剥除了他与共同历史的关联与他专属的言说。奥尔巴哈以彼得在《马可福音》中拒绝场景之写实主义对比到修辞学的撤销上：小人物的在场、仆役的角色以及提到彼得的加利利口音，在此戏剧化了伟大与脆弱的混合，形成一个人民中人被圣言道成肉身的奥秘所攫取的特征。塔西佗所禁止的文类混合，被福音作者容许，再现了一种古代文学不可能比喻出来的事物，这个事物落在文学与风格的配享之外，也落在文学所预设的条件之外：一个精神运动在人民的深度中诞生了。于是奥尔巴哈以他的方式标示出一种涉及再现他者问题的知识政治与叙述诗学之间的关系。因为塔西佗无法认真采用这种位阶之人的言说，也

因为他在高尚与低级文类的区分范畴下思考，所以他依旧在文学写实主义的可能性条件之外，相反地福音书的叙述开展了这种文学写实主义。奥尔巴哈的证明，[f. 60]特别关系到诗学范畴方面，在表现人之尊严高低的功能上，涉及文类的区分。他让另一面撤退，这一面触及柏拉图称之为**词**(*lexis*)[①]者：是诗之宣义的模态，介于主体与他所再现者之间的关系，从叙事者描述历史的**涵叙**(*diegesis*)[②]的客观化，变换到诗人隐藏到他的角色后之**模仿**(*mimesis*)谎言的模态。而古代诗学范畴的重要性在于跨越现代语言学论述与叙述的范畴时，[c. 28]授权了另外一种质问叙述与一般历史叙述的问题类型。论述与叙述之间的哪些关系使得各种形式的一般历史成为可能？不合法过度言说的铭刻如何与这些关系的系统相应？相应于使叙事者关联到其使之言说者的角色系统？

---

① 〔译注〕词(lexis)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修辞学概念。柏拉图认为，lexis可以区分为mimesis与diegesis，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主要言说模态。

② 〔译注〕涵叙(diegesis)着重在书写中叙述的进行，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谈到的模仿不同，模仿着重对于真实的描绘。涵叙在当代语言学中得到更大的发展，被分成三种层级：涵叙外层级；涵叙内层级；涵叙后层级。朗西埃的用法更接近奥尔巴哈与亚里士多德的谈论方式。

相应于他写作的模态与时态，相应于肯定与客观化的效果，相应于在论述与叙述上的距离与怀疑，相应于它们结合与分割的各种形式吗？

[f. 61]从这个视野来看，在塔西佗的论述中，令我们感到有趣的不是那被奥尔巴哈强调的排除效果，反而是他包含的力量：他自己将场所给予了一个他宣称没有场所的人。对于塔西佗而言伯森尼亚斯并不算在那些说话有用的人，并不算在那些他的同类会说话的对象。然而塔西佗还是使伯森尼亚斯用和别人说话一样的模态说话，他使他用"间接的风格"(« Style indilect »)说话，这种间接的风格是一种特别的模态，按照这种模态，他实现了叙事与论述之间的平衡，而同时也采取了保持中立的力量与保留态度的力量。伯森尼亚斯说了话却没有说，他以一种不定式动词的模态而这种不定式动词的模态是动词的零度，他用来表达信息的价值，但是不决定信息的价值，不把他定位在现在或过去的阶层里，不把他定位在客观或主观的阶层里。间接引述的风格，实质上透过分离的意义与真理，在现实上，解消了合法的说话者与不合法的说话者之间的对立。两者有同样理由可被保留或怀

疑。如此建构起来的论述-叙述的同构型就会与他呈现的主题的异质性互相矛盾，他呈现的主题的异质性是在说话者之间不平等的性质会由他们的地位保证对他们的谈话指涉。[1] 尽管柏森尼亚斯是一位极端的他者，[f. 62]被排除在合法的言说者之外，然而他的论述却被包含在里面，被包含在一种在意义与真理之间关系的特殊悬置里，同样的关系也就是罗马的领袖阿古利可拉与喀里多尼亚的领袖卡尔加库士之间的关系。这种说话者的平等反映了另外一点，这一点定义了塔西佗所书写的历史之文脉(texture)本身。它反映了在历史的**说话**(*dire*)以及历史描述者的说话之间的同构型。历史书写也就是使得一定数量的论述情境平等。[c. 29]描述伯利克利(Périclès)[2]或阿古利可拉的行动(acte)，这是一种论

① ［译注］以使用动词不定式所表达出的间接风格，使得论述-叙述没有区别的状况会跟那些说话者他们身份的差异互相矛盾。合法的说话者与不合法的说话者照说他们身份上的或是性质上的差异，就保证了说他们所说的话必定是不一样的，会有可信跟不可信的差别，但是因为不定式间接引述风格使这两者的差别消失了，这二者是互相矛盾的。

② ［译注］伯利克利(Périclès，c. 495—429 BC)，雅典民主巅峰时期的领袖。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贤主，修昔底德笔下伯利克利的葬礼演说成为后世修辞学的基本教材。

述活动(action),具有和伯利克利或阿古利可拉高谈阔论同样的地位。在以我们可以假设他们会如何言说的方式去从事他们的论述时,历史学家事实上也形成了一系列有论述功能的材料:他提供了文学的娱乐,提供了君主与国家领导人政治课程,提供了学校学生们修辞学与道德教育的课程。伯利克利对雅典人说的话,修辞学的老师对学校学生说的话,历史学家按照老师的范例来重复书写伯利克利的言说,所有这些都具有同样的地位,都把自己放在一个同质论述的宇宙里。这种同构型并不会避免偶尔拒绝言词的谎言,[f. 63]比如修昔底德(Thucydide)[1]这么做了,塔西佗也借由卡尔加库士这么做了。然而这种对他者言说的怀疑本身把自己规约到一种意义与真理分割的修辞形式上,也就是指涉的悬置上。它并没有创造任何一种双重的基础,任何使论述面对立真理的后设语言。修昔底德揭告城邦演说家的论述和这些演说家们彼此互相揭告的论述具有相同的本性。对柏森尼亚斯先行判定

① 〔译注〕修昔底德(Thucydide, c. 460—395 BC),知名希腊历史学者,着有《伯罗奔尼撒战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师承辩士安提丰(Antiphon)。

失格就和对所有其他人一样解放了其主张之力量。卡尔加库士,当他称呼罗马人名之以和平的骗局为荒漠,他本身的夸大就被构成在同一个包含他的语言游戏中,他这个外邦人包括在柏森尼亚斯的角色中,一个不能够玩弄任何语言游戏的人。这个语言是他没有权利的语言,给予他这个权利使他言说时,把他包含到社群里。对他的失格判定被语言中——言说存有不显著的能力中——的信心所赎回。卡尔加库士并不说拉丁文,伯森尼亚斯除了这被保存的著名段落外也没说什么。然而语言与它所授权的游戏的聚合性能力仍然留存,[f. 64]这是一种永远容许使它划圈排除的人能够进入它的社群里的论述能力。

对他者言说的挪用也就可能被倒转。在撤销伯森尼亚斯的声音,而用自己的言说来取代伯森尼亚斯的言说时,塔西佗不仅给了他一种历史的身份。他也为未来的演说家与单纯的士兵们提供了一种叛逆的雄辩范例。后来这些人不需要再重复柏森尼亚斯已遗失的声音,[c. 30]而是重复塔西佗的话,他说的理由比柏森尼亚斯的所有理由还要好。而后塔西佗所采用的拉丁文作为一

种死亡的语言获得了一个新生命，它成为了他者的语言，对这种语言的挪用取得了一种新身份，大学与课堂上的极有天赋的学生们会以他的语言或以他的功能将之剪裁成一种新的雄辩，这种新的雄辩是自学者反过来会采取为范例的新雄辩，用来与福音书的叙述以及先知们的诅咒相互竞争。所有这些没有言说场所的人采用了这些字、这些词、这些论证以及这些谚语，用以建构一种颠覆性书写新身体。弑君的**恐水症**（*hydrophobie*）以及人类权利的**形上学**（*métaphysique*），[f. 65]在霍布斯与柏克的绝望下提供它营养，以创造出一种现代革命的场景，一场书籍之子的革命。

这种绝望可以说并不贫乏。它本身创造出一种现代社会知识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与革命事件不幸的基本关系上被创造：此关系把政治的不幸等同于所用字词在其脉络外的不幸——**不幸福**（*infelicity*），等同于这种政治也就是等同于一种不幸福。如果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对社会知识与历史，特别是对于社会学——扮演了奠基事件双重面貌的角色，这是因为他的暴力自我等同于这个事件普遍的理论性丑闻。事件的丑闻也就是论

述之火的丑闻以及时间混淆的丑闻。任何事件在言说存有中都关联到言说过度，以一种说话移位的特殊形式：一种对他者言说"**在真理外**"的挪用（以一种主权的公式或者以一种古代的文本或者以一种神圣的言说方式），使言说做了不同的意指；他使古代的声音在现在回响，使先知的语言或者文学文艺的语言在通俗生活中回响。[f. 66]事件从被重述的事情中，从在脉络之外被说出来的事情中，从主体之外的事情中，从被说出来的事情中，撷取它吊诡的新奇性。表达的不适当性也同样是时间上的不恰当的叠合。这个事件具有时间错乱的新奇性。而革命作为事件本身是社会知识在对于字词不适当性与对事件时间错乱的否定性中自我建构的场所。并非出于情境的争议而是因为深层理论的必然性，使得对法国大革命的诠释在其核心提出了时间倒错的问题，[c. 31]且把这个问题追溯到它的极限：这是对于事件无场所的肯定，它具有修正主义这个名字。

社会知识的原始幽灵，就是时间倒错的革命，用古代习惯与论述方式来革命。革命从时间倒错中、从本身的时间差异——言说存有的专属特性——形成事件与共同

的紊乱。它抛给政治学与思想的挑战，被社会知识重建在一种特殊形式下：在一种时间的非事件性思考精炼下，在一种免除了言说与事件的时间倒错之时间下。

[f.67]在这些占据了革命时代的时间重新精炼中，有二者在社会知识的构想与社会知识批判的志业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把从未来到过去的关系当作基轴。未来力量的迟滞，它的不成熟，每次都被当作回到过往的理由，从过去的时间倒错与啰嗦重复，到对现在任务的执行上。对于历史行动者的忽视以及对于历史理论家的对称性知识，都连接到此种未来的优越性上，只有未来适合解释过去，但在行动的当下永远缺乏，永远要在一个不曾（*pas encore*）的不可到达性之中重新切分，以决定一种再次（*une fois encore*）的重复。造成马克思吊诡式荣耀的阶级斗争分析不如说是对于角色（figures）的剧场式分配，它能够采取一种在不曾与再次（*une fois de plus*）之间的结合。①

① 〔法注3—2〕Je me permets de renvoyer là-dessus à mon livre, *Le Philosophe e ses pauvres*, Fayard, 1983, p. 135—155.〔英注3—3〕

今日被马克思主义模型的错综复杂性所活化的皇家经验主义分析，在时间轴上，透过过去与未来的范畴之结合性失格，从相反的方向出发。引导它们诠释的是一种科学的乌托邦，[f.68]其范畴对它的对象来讲会是恰当的，因为这些范畴与它完全同时代。现在时是它的时态。然而现在时的专属特性——就如实在（réel）的专属特性一样——是不停地对采取它立场的东西隐藏自已。它也永远必须在过去跟未来上被重提，被过期重复的过去与不当预期的未来，不断地批评所建立。皇家经验主义对于革命事件的无穷计算，[c.32]也就借由马克思主义-未来主义对其时间倒错的诠释之无穷再诠释而过渡。

科班书名为《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诠释》（*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作品所例证的再诠释，成为法国大革命修正主义史笔的灯塔之书。书名对此有明显的标示意义。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再是描述革命，而是诠释革命，把事件与论述结合到基础与解释上。而且，很明确地，事件的基础一定属于非事件；字词的解释一定不属于字词。总之，历史学家投身于奥尔巴哈指斥塔西佗所不能做的事情。[f.69]他要看到字词之后的

东西。他把诱惑性的论述与在此表达和在此变装的非论述性真实关联在一起。历史学家的论述是一种衡量的论述，将历史的字词关联到其真理的衡量论述。这明显地就是所谓的**诠释**（*interprétation*）。[①] 然而，以比较不明显的方式来看这也是所谓**社会的**（*sociale*），社会的，实际上既指涉知识的对象也指涉这种知识的模态。在第一种意义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诠释，就是一种对革命过程的分析，以社会关联与社会冲突的方式来分析。它以在这个领域的重要性与效果的程度来衡量这些过程：财产状态的转变，社会阶级的重分配与冲突，不同社会阶级的上升、下降或流变。但是这第一种意义马上被另外一种意义所重复：社会变成了事件和字词的这种**底层**（*des-*

① 〔译注〕与诠释学的对立：并不在于朗西埃使用了诠释这个字，而在于在诠释活动中字词与真理的关联。一个诠释学者会主张字词与真理的关联可以向其存有开放，在这种开放中所建立的意义之本体链接，具有积极的价值。对朗西埃而言，其诗学批判却要指出这些连结，甚至于契约，其实并非一种稳定的连结，而是一种提供断裂中无场所的可能。诗学批评的活动，恰好可以打破这些诠释的存有在场，揭露出一种在意义言说活动中的缺席。有趣的是，朗西埃曾经就学于诠释学家里克尔，向他学习希腊哲学。朗西埃对于诠释的谈论，不仅仅局限于历史诠释或社会诠释的领域，同样地，他的希腊诠释也非出于偶然，或者来自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

sous）或背景-基础，永远必须透过其表象的欺骗来撷取。**社会**指定字词与事件和他们的非事件式真理与非字词性真理的裂隙。社会的诠释从头开始预设了一种场所的地理学：有一种不属于论述阶序但需要诠释之论述活动的事实。[f. 70]然而在事实与诠释间有一个要克服的障碍，要消散的字词乌云。大革命在法国社会产出的转变被大革命的大量言说所暧昧化：有革命要角们的言说，圣徒史史学家式的言说，共和传统的言说，用布尔乔亚革命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诠释言说，以及在马迪厄（Mathiez）[①]与索布尔（Soboul）[②]史笔中这些不同传统的组合。诠释涉及革命与对革命的言说过度。**社会**诠释涉及第一种社会诠释：这种诠释已经想要以事物代替字词，但是在这种运作同时，它让自己为字词所陷。

让自己深陷在言词之中，意味着用了不恰当的字，因为这些字和所指称的东西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对于科

① 〔译注〕马迪厄（Albert Mathiez，1874—1932），法国史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三册等。

② 〔译注〕索布尔（Albert Marius Soboul，1914—1982），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期史学家，费夫尔的学生。

班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在过去的事件上黏合了属于后代的字词与观念。但如果它能这么做是因为它认真计算大革命要角、同时代人与编年史家的字词。[f. 71]然而这些字词本身是时间倒错的。这些字词回溯到一个事实上在它们的时代里不再存在的情境。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诠释相信大革命是布尔乔亚式的，因为革命的要角们相信封建制度还存在且摧毁了它。如果这些错误的诠释——将来时与过去时——能够积聚而成，是因为他们安立在科学建立阶序前之一般性人类语言的同一个专属过度里：同一个字可以指定许多存有或性质的事实，是同一个字可以指定不存在的性质，也可以指定不再存在或不再出现的性质。社会诠释必需无休止地面对同名异义之恶。①

同名异义的批评就像社会的概念一样，在双重登录上操弄。在第一个层次上它单纯地要求给予指定社会身份的字词在其时代所具有的意义。为了不误解阶级和革

① 〔译注〕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1a1 中定义同名异义为同一个名字以不同的意义指涉不同的事物。指涉不存在事物的这一点是朗西埃的特色。

命时代的关联，必须要知道，例如以下这点：工匠在当时不是工业家而是一个手工制造产品的人；[f. 72]劳工不是农业劳动者，而是有财产的乡下人(paysan)，通常颇为宽裕。佃农(fermier)基本上是付租金来耕种土地的人，但是他也执行一些功能。依此整件事不过是个渺小的校正工作。整体而言，只要有一本好的历史辞典就足以分梳这些字词到它们精确的意义上。那么只要给予所有社会关系它们正确的名字，只保存它们真正特别区分的特色。然而这种术语校正会看到其结果反而遭受一定数量包含一切与适用一切的字词之威胁。[c. 34]这些字词占据了场地而不指定任何有区分的社会现实。这些最欺骗性的字词很明显就是最常用的：例如贵族、布尔乔亚、乡下人。这些字词在一种怪物般的结合里统一了一些不同时代的性质，统一了一些不再存在与另一些不再出现的社会关系。让我们考虑一个最欺骗性的字词，就是贵族。如果我们对 1789 年的社会定位做解析，会发现贵族存在于在社会的各个阶层，[f. 73]各种非常分散的定位里。这个真实不幸地被宫廷城堡的印象所复现，更有甚者，把贵族同化为封建，把领主的权利同化为封建的权利以复

现。再者，如果进入到关系的细节中，名字指定的对象就会解体。所谓的“**领主权利**”(« droits seigneuriaux »)其实是一些不同起源权利的凑合，并没有指定任何平民对领主的个人依赖关系，任何专属的封建关系。它常常是单纯的财产权利，通常反而是由布尔乔亚所购买。在封建权利的名下“不放弃封建这个字的所有意义”(« sans enlever tout sens au mot féodal »)而重新统一它们是不可能的。[①] 对于 1789 年春天在凡尔赛集会的三个等级中任何一者也一样不幸。没有任何等级命名了给予它名字社会意义的财产集合。贵族、教士与第三等级的分类，远在 1789 年之前就已经不再和相应的社会事实有“**半点关联**”(« le moindre rapport »)。[②]

社会这个词的双重范围也就精确为：社会指定一种关联的集合。[f. 74]然而它也指定一种正确指定的字词

① [英注 3—4] Alfred 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33.[译注]此句引文的法文本与英文本在行文上略有不同，法文引文中并没有延伸字意到丧失字意这种意涵。但原出处为英文本。

② [法注 3—3] Alfred Cobban, *Le Sen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 Julliard, 1984, p. 42.[英注 3—5] Ibid., 21.

缺乏。社会指定了无关联是主要的。它指定了字词到事物的裂隙，或者更精确地说，**命名**(*nominations*)到**分类**(*classifications*)的裂隙。它命名与被命名的分类，从科学上理解，绝不是它所应是的分类：一组可以严格赋予一定数量共同性质的个体集合。这种时间倒错与同名异义的混淆把历史的字词当作是名字的字词。名字可以认同，但是不分类。这个罪恶很轻微，只要缔造历史之国王们的名字保障他们的认同，除了一些篡位者以外。罪恶有变成不可挽救的风险，如果阶级取代了国王的位置。因为这些阶级精确地说不是阶级。[①] 这种建构性缺陷，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诠释者的单纯错误。[e. 35]它正是事件角色的罪恶，借此事件产生了事件，简单地说，有了历史。有历史是因为言说存有被名字所统一与区分，因为他们以与性质的集合“**毫无关联**”(« pas le moindre rapport »)的名字来命名自己与他者。[f. 75]对他们产生意义与构成事件的名字，就皇家经验主义史学家而言，正就是“没

① [法注 3—4] Cf. Jean-Claude Milner, *Les noms indistinct*, Le Seuil, 1983, et particulièrement le chapitre 11, « Les classes paradoxales ». [英注 3—6]

关联"(« sans rapport »),这就是他要我们分辨的错综复杂:司法的与非司法的,个人的与真实的,过去的与现在的,封建的特权与布尔乔亚的财产。且对那些不由性质集合所定义的社会身份代表者,而是身为贵族或奴隶,布尔乔亚或无产阶级,也就是言说存有,产生意义。一个阶级或阶序,正就是这些分离与不同时代特征的结合。在阶序或阶级的这些字中,有一种言说存有与社会位阶的定位关联,以任何区别特征所不保障的方式操弄。有历史正是因为任何原初立法者不曾使字词与事物和谐。推到极限,要清算不正确名字的意志回到一般事件借以达到主体的不正确性与时间倒错之清算。宣称历史字词对其现实的"无关联"(« non-rapport »),在极限上,就是历史科学的自杀。

[f. 76]这种自杀冲动在科班的文本中采取特定的形态。他告诉我们必须放弃大革命的术语——角色与诠释者的术语——以便像当时研究大革命的社会学家一样检查社会事实。此命题在基础上,主张过去和现在的唯一关联本身带有错误的印记:非同时性(non-contemporanéité),把握性质列表以使字词正确对应到其

所指定的东西之不可能性。为了使历史学家可以在真实中,他必须用这些容许他知道历史字词既指定又隐藏之社会现实的当时社会学家的与料来工作。[1] 但谁是事件当时的社会学家,我们不幸欠缺他的科学?他不是社会学家而是社会知识的乌托邦人物:一位原初立法者,使名字与指涉物一致,使结合了两种意指,社会的两种面向之**现在于现在**(*présent au présent*)一致,使我们免除言说存有的慢性时间倒错?[c. 36]在此的不幸是没有法国大革命当时的社会学家。且这种不幸绝非偶然。[f. 77]这是因为已经有一个法国大革命,社会学诞生其中,一开始就诞生为对于字词与事件欺骗的揭告,对其本身社会正确的乌托邦。

在这种回归到时间倒错的当时社会学家之乌托邦式回归中,皇家经验主义者的批评到达了一个极限,这个极限是科学信念把历史知识推到的极限:挑战其对象。在剔除了象征语言或后设语言的回归后,批判的历史必需

[1] [法注 3—5]Alfred Cobban, *op. cit.*, p. 43.[英注 3—7]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22.

滋长永远怀疑字词的科学欲望。以好的名字取代坏的之不可能性，迫使历史在显示每个不相应于其所指定之现实的名字时以此著称。这个现实迫使它否定有事件的可能性，除非透过不正确性。在极限上学术化历史也就把自己书写成历史的无场所。此极限有一个既是理论也是政治的名字：叫做**修正主义**（*révisionnisme*）。历史中的修正主义，不是政治党派或者对于吊诡的智性品味之情境后果。它是这种怀疑的政治终点，借此社会科学必需展示它从属于科学，[f. 78]越多挑战就以更多的力量来展示。历史特殊的脆弱性把它暴露在这种怀疑的极限上：宣称它的对象不存在。修正主义说法的核心，一般来说，有个简单的公式：**事情并不如所说的那样发生**（*il ne s'est rien passé de tel que ce qui a été dit*）。结果会以不同的方式模块化，根据它分裂或拉近不一样（non-tel）与招致不一样的无物（rien）之间的方式。[1] 虚无主义版本的公式推

① 〔译注〕non-tel 不是 nonrelation，英译加入了一个朗西埃在此没有谈论的概念。non-tel 翻译成"不一样"主要指的并不是差异，而是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重点在，事情并不如所说的那样发生，而不在字词与事物之间的无关系。因为根本没有事情发生过。回到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里，在 Duns Scotus 的区分中，comme tel 指（转下页注）

导出，事情并不如所说的那样发生，这就回到说，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对于政治挑衅有利，但是结论对历史而言是自杀，历史命运不论如何，悬置在事物曾经发生的最低要求上。毕竟怀疑的政治，很有权利延伸到这个极端上。因为这个历史让事件的欺骗性言说所指向的无物具有，比它们更多的，身为不指定任何性质的字词之缺陷（le tort）。修正主义的实证式实践，和它的虚无主义式实践相反，[e. 37]满足于把不一样倾斜到其效果的**几乎无物**（*presque rien*）上，或者其原因的无场所上。

科班的证明自然朝向**几乎无物**的方向。[f. 79]它并没有说大革命没有场所或没有存在的场所，而是说它持续的社会效果化约成非常少的事物：土地财产重分配的一些变化，在布尔乔亚内部组成的一些修正，以及比以前更稳定的社会。总之，把法国大革命作为字词与事物无限距离之令人信服的例子，是合情合理的。

（接上页注）的是 being qua being 或是 being as such，事物的普遍性质，经院哲学所谓的 Quidditas。相对于这个概念的是 Haecceites，指的是独特的事物（singular）之个体性，无法化约到一般事物的普遍性上。换言之，它无法和别的事物一样。这种独特性的概念曾经被 Simondon 与 Deleuze 发展，朗西埃在此却强调其字词非在场、非本质的特性。

弗朗索瓦·福雷(François Furet)在他的《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①]这本书的证明里所遵循的是朝向无场所的方向。这本书借由环绕事件问题之令人注意的反转而展开。他对马克思主义史笔的原创性批驳,实际上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史笔在其假设的社会原因宣称上消失。革命事件,不应该在其原因的假设效果中解消,正就是一个崭新政治空间的开端,言说过度是其特色。**"革命作为事件之特色是历史行动的模态,可以称之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动力(dynamique),以说明[f. 80]其动员人与行动到借由意义过度投资所发生的事物上之多元能力。"**[②]这种对大革命意义的决定,一开始也就定位在与科班的唯名主义和社会学主义的相反之处。然而所召唤的**"意义的过度投资"**(«surinvestissement de sens»)同样也是一个严重贬值的

① [译注]弗朗索瓦·福雷(François Furet, 1927—1997),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曾为年鉴学派一员,勒华杜拉里的老师。

② [法注 3—6]Franç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Gallimard, 1978, p. 39.[英注 3—8]Franç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2. [Translation slightly modified.]

对象。革命事件的"动力"实际上就可以完全以两个概念来总结,犹如直接从塔西佗的文中引出,也就是空档与替代。激起革命性极端创新的,就和历史人物伯森尼亚斯的漂亮论述一样,正确地说,是空洞。身为新出现事件的革命,被**"权力的空档"**(« vacance du pouvoir »)[①]激起,从初始的消失出发,**"将自己放在空洞的空间中"**:**"从1787年起法兰西王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②]这种权力的空档迫使放置的力量以幻想的方式**"一片一片地重构社会集合"**。[③] 这种占领空洞空间的要求,结果建立了**"民主言说的替代政权,以'人民'为名的社会统治。"**[④]

[c. 38]大革命的批判性史笔之叙事计策,在此似乎准确地复制了[f. 81]塔西佗叙述的计策:权威的空档激起过度言说的增殖。然而这种古代文学与现代历史科学的叙事序列之显著相似性,揭发一种其元素本性中的深层差异。无场所在两个例子中都是原因,但是方式不同。

① [英註 3—9]Ibid., 22.

② [法注 3—7]*Ibid.*, p. 39, 41, 42.[英注 3—10]Ibid., 24.

③ [英注 3—11]Ibid., 25.

④ [法注 3—8]*Ibid.*, p. 47.[英注 3—12]Ibid., 28.

在塔西佗中它仍然是纯粹的空洞。批判历史科学则以一种无场所的理论取代此空洞，以一种想象理论的词汇合格化这种替代，并且给予空档一个非常特殊的现实地位。科学首先命名替代并且把替代等同于科学的他者概念：幻象、想象、意识形态。“**意义的过度投资**”不仅仅是对于过度的言说，它是对其原因的特定错误认识。“**自 1789 年以来的革命意识是征服一个已经不再存在国家的幻象。一开始它就永远把理念高举到现实历史之上……**”①此回溯的幻象建构了革命极端性的想象，且容许它把许多事件异质序列的交错转化成“**人类恶质政府的必然产物**”。

[f.82]这是两种叙述的第一个基本差异。塔西佗把空档的偶然关联到言说的无场所。伯森尼亚斯言说的不合法性，使他免除所有其主张中虚幻或真实特征的判断。学术化历史合格化它的他者来证明自己。诞生在空档中的言说，没有存在场所的言说必然是幻象的言说。然而科学的这种可见记号隐藏了另一种更秘密更基本的记

① ［法注 3—9］*Ibid.*, p. 42.［英注 3—13］Ibid., 25.

号。无场所效果中的差异，退还到在其原因中的差异，在无场所本身的本体论地位上。在塔西佗中，空档指涉一种可经验指定的事件：奥古斯都死了，军事演训实际上停止了。相对地，弗朗索瓦·福雷所谈到的空档并不偶然地而是结构性地具有不可呈现者的性质：“**从 1789 年起法兰西王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革命意识是征服一个已经不再存在国家的幻象。**”给予幻象力量的，确定是：其所看不到的事物，也就是不让自己被看到的事物。[c.39]比雷埃夫斯港（Pirée）至少和人有区别，而罩子①至少和灯笼有区别。[f.83]然而不存在是一个在世上极难以看见的事物。而国家的不存在是，国家在存在的情形下，以遮掩为务。这不只是说“**传统的侧面**”（« façade de tradition »）仍然遮掩俗世观点中“**门墙内的散乱**”（« la débandade dans les murs »）。② 这是说象征性的墙在那里隐藏着它们特有的裂缝。我们所根据的这个宣称，1787

① ［译注］vessi 也指膀胱，用动物的膀胱做成灯罩。此处英译者改以英文成语表现（“... and the moon from green cheese”）。两者都指出比喻的字词并不等于所比喻的事物。

② ［法注 3—10］François Furet, *op. cit.*, p. 42.［英注 3—14］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4.

年以后“**法兰西王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这个宣称是一个无法检证/无法否证的宣称，对其指涉产生悬置效果的宣称：不是一种分离过度言说与其真理的塔西佗式修辞学悬置，而是一种使得事件叙述和科学隐喻不可分辨的科学悬置。产生言说事件过度的是看到空洞的不可能性，造成言说与只有科学看得到的空洞。只有科学知道的是，国王在死之前就死了，以另外一种死法。对这种只在知识视角可见的死亡之忽略，激起一种和已死国王战斗的幻象，以弑君和恐怖为其逻辑结论。

[f.84]革命事件的解释，也就重新加入皇家经验主义者范例的范畴中：激起了言说晕眩与造成事件之幻象的无场所，总是具有同一个原因。它是在场中的非在场。历史角色活在一种与事实上已过去的事情战斗，以及创造未来的幻象中。而大革命是这种幻象的通名，是事件错误在场的通名，是结合误解与乌托邦的事件错误在场之通名：对我们以为还在场却已然过去的特征之误解，使未来在场的乌托邦。大革命是制造诞生在忽视大革命已经诞生的大革命之幻象。

此循环论证使两种知名且明显互相矛盾的大革命诠释交错：自由主义的诠释，在现代社会演进的必然性中铭刻它，且指出它早在遥远的王国时代就已成形；反革命的诠释，相反地陈述大革命为一种向有机构成社会施加以[c.40]哲学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之人造阶序的用力一击。[f.85]第一种传统是以托克维尔(Tocqueville)描绘的，他指出在现代的平等性长征与统一的工作及君主中央集权一起进行。根据这种诠释，事实上国王铸成了共和国。大革命在1789年早就已经有了它的场所。托克维尔也可以把他的研究停止在在1789年以前，让其他人烦恼如何知道为什么革命党要进行一个已经不需要进行的革命。反革命的解释正好安住在这个空泛里。它以解释何以不曾具有拥有场所之场所已经有了场所为特定对象。而解释的原理很简单。他把一种无场所专家团体的存在指成原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社会学**”(« Sociologie des intellectuels»)，福雷用来合格化奥古斯丁·柯尚(Augustin Cochin)[1]对于“思想社会”(« sociétés de

① 〔译注〕奥古斯丁·柯尚(Augustin Cochin, 1876—1916)，受到涂尔干影响的法国大革命社会史学家。

pensée»)决定性角色之诠释的说法。然而在此"社会学家"(«sociologue»)只不过是那些揭告[①]字词与事物之间裂隙的人。事实上柯尚不过是在社会学中重新采纳了反革命已经给予他的诞生场所当作原初场景:一出有机社会关联被哲学的人造主义与个人主义所拆解的戏剧。[f.86]"知识分子"是取代政治名字"哲学家"(« philosophes»)之学术名字。而且不可解消的,它是一种叙事功能的名字:使无场所降临的主体之名字。两种诠释因此彼此交织:未来的想象革命延伸了必要的间隔,使社会能够意识到革命已经属于过去。**"在使社会的事物独立于意识形态时,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之死使我们从柯尚过渡到托克维尔"[②],"在两个时代的同一时间里,热月九日[③]划分了大革命的两种概念。它使柯尚的革命结束。但是相反的,它让托克维尔的革命出现。"[④]**

这种说法值得我们停留。我们确定知道,柯尚或托

---

① [译注]dénonce(揭告)有终止与否定的意思。

② [英注 3—15]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72.

③ [译注]热月(七月)九日即为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那一天。

④ [法注 3—11]François Furet, *op. cit.*, p. 101—102.[英注 3—16]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73.

克维尔都没有造成革命,同样地菲力普二世也不曾接待过布罗代尔。所以我们在玩弄叙述与论述的模棱两可与等价比喻时没有欺骗自己。但是在此保持在皇室之死的叙述中之等价,完全落入了吸纳叙述的论述,[f.87]落入代替事件的诠释。[c.41]对于补充的玩弄运作到主体的替代上,以史笔的场景替代历史的场景,在史笔场景中,大革命是我们以为造成大革命的角色之外的角色之事,在此大革命只存在诠释上的纠结。免于诠释以了解事件的初始意志也就正好回来了。热月九日的表征事件也就是事件的幻象统治之完成,纯粹极限划分了两种诠释,两种政治科学论述:一种幻象的诠释与一种现实的诠释。在历史向史笔消逝中,历史的学术矫饰,推到了取消其对象的极限,把他的手伸到政治的学术矫饰上。历史,变成了史笔,变成政治科学的一支,一种灾祸学或魔鬼研究(démonologie),献身于对脱轨的研究,在政治合法性的缺陷中使言说事件增殖的脱轨。学术化历史信念的终结就是历史的禁绝,变成了社会学或政治科学。革命的学术修正成就,[f.88]或许就是历史时代结束的信号。

借此,这种成就容许回溯到先前它终结的时代:历史

作为可理解性叙述的征服时代，在古老的政治艺术与新的事务操作科学的间隔之间，明白强调叙事的、科学的与政治的三重契约。历史的时代已经是历史学家发明了一种中和过度言说与主控内在于历史学术信念中死亡冲动之概念部署(dispositif)与叙事部署的时代。历史的时代，从米什莱(Jules Michelet)到布罗代尔，已经是历史学家在叙述与科学的平衡中能够重写国王之死场景的时代。

第四章　奠基叙述

[f.89|e.42]民主时代的学术化历史有个有问题的系谱。费夫尔敬米什莱为**年鉴学派**的奠基之父。但是这种强制的致敬使得父亲的意义晦暗不明。而祖先在真理上令人感觉沉重。好学校训练出来的历史学家，难以在必需于浪漫历史学家的语言激情、幻象、效果中，看到方法的严格与谨慎。于是他们就自愿地让记号学家去研究这种结合。[①] 我们尝试指出，相反地，米什莱风格的幻象

① 〔法注 4—1〕人们可以看到，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的《米榭雷》(*Michelet par lui-même*, Le Seuil, 1954)书中完成了这点，提供研究者知识诗学的反省，不论有何视角(**转下页注**)

与效果，正好定义了**年鉴学派科学言说的条件**，它们是近来称之为知识论突破的主要运作因素，[f. 90]对此我比较愿意称之为知识的诗学结构革命。

为了大众时代的历史，米什莱事实上发明了一种讨论字词过度的艺术，讨论国王“**在故纸堆中的死亡**”(la « mort paperassière »)。面对皇家经验主义者的范例，他发明了一种历史的共和-浪漫主义式的典范，历史必需借此自我规范，只要它依然是历史而不是一种比较社会学或者一种经济或政治科学的附件。这个典范的建构预设了革命事件的叙述，[c. 43]预设了对于言说的革命过度之规约，这种规约能够在言说事件的地位中，压抑过度并且保留言说。

在《法国大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中这种规约可以被读成“联盟节”(la fête de la Fédération)①的

(接上页注)差异，研究者受惠于这本书就如同受惠于同一作者的其他文本。[英注 4—1]Roland Barthes, *Michelet*, trans. Richard Howar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译注]直接说明朗西埃的知识诗学受到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深远的影响。[编注]此处书名的“米榭雷”即“米什莱”，由于是书名，故保留原版的译法。

① [译注]1790年7月14日，八十三省代表与巴黎市民聚集在战神广场庆祝巴士底监狱攻克周年，史上称这个聚会为“联盟节”，路易十六也到此宣誓效忠新宪法与新国家。1880年，Benjamin Raspail提议立法纪念1790年“联盟节”，并订立7月14日为国庆节。

范例叙述，奠基叙述。对米什莱而言其实是基础和平事件，大革命的意义在此彰显：并非是巴士底监狱摧毁或是皇室砍头，而是一种新政治实体的出现，同时也是敬爱的新对象，祖国。“**最后阴影消失了，迷雾散去，法国看清楚了他所爱好的，他所追求的，但是没有能掌握的：**[f. 91]**祖国的统一……伟大的祖国在圣坛上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敞开胸怀。**”①

如果要奠基新历史，脱离旧的编年史，也免除皇家经验主义者对欺骗与谋杀之字词的不满，就应该言说此类事件。费夫尔至少完全了解一种事物的新历史可能，唯一条件是好好地把握名字的现实，尤其是继承了国王之名的名字：法国、祖国、国家，揭告编年史家经验主义常规的“**拟人化抽象**”(« abstractions personnifiées »)。② 若要使大众时代的非事件性历史成为可能，首先应该言说群众

① [法注 4—2] Michelet,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obert Laffont, 1979, p. 324.[英注 4—2]Jules 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Charles Cock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440—41.英译者注说明所引用之英译版本不完整。参考 Keith Botsford 的翻译。

② [法注 4—3] Lucien Febvre, « Parole, matière première de l'histoire »,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s*, 1943, p. 91.[英注 4—3]

聚集起来庆祝一个肉身化抽象出现的事件。也应该用以下方式言说，不把这个字词的在场解消到群众中，借出将群众分解到已经给予的现实中(皇室铸成的统一)与解消到其意识形态的翻译中(思想社会①在酒醉的喋喋不休中铸成的共识)。

那么如何描述这个事件，使它不仅仅比喻了替代皇权空洞的意识形态空洞？[f. 92]使它给予民主政治和学术化历史共同的原初场所？米什莱给了这样的问题一个答案。他为此发明的，是我们已经在布罗代尔论菲力普二世之死作品章节中见到的原理，新叙述的原理，并非单一叙述，也因此适用于非事件性事件。为此他遵循了一种非常特异的步骤。乍看之下，为了事件的叙述，[c. 44]他似乎提供给我们自己似乎充分言说的存在证词。"他告诉我们，联盟中的大多数亲自讲出了他们的历史"②，而他遵循这种文学的例外特征，一个同时是新时代纪念碑之事件档案的例外特征："新诞生博爱的可敬纪念

① 〔译注〕此处英文自加斜体。sociétés pensée 当代又可译为知识社群。

② 〔英注 4—4〕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42—43.

碑……永远不息地见证我们父辈的心灵，见证他们的悸动(transports)，当他们第一次看到祖国受爱戴的面容时。"①

一种新类型的档案使这个事件在场：无名人民进入到言说者的宇宙中。一种意义下，档案等同于事件本身。书写本身就是祖国出现的事件，[f. 93]可纪念性与新历史性的建构。而且一开始它似乎足以让他们言说：引述式的开端或者三段戏剧式的惊奇②，宣告了新历史角色的声音，历史学家尊为革命真正角色的人民之声。然而叙述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相反地历史学家让自己上台，向我们展示自己手上握着联盟的叙述，告诉我们，它们远非只是叙述，是对新生祖国的情书："当我最近打开少有人读过的这些文件时，发现这一切经过六十年之后闪耀如昨日。"③

① 〔法注 4—3〕〔英注 4—5〕Ibid., 443.〔译注〕此处法注 4—3 重复标示。引文出处应同法注 4—4。

② 〔译注〕英译标示 coups de théâtre 法文斜体。似乎将其视为专有名词。至少此非朗西埃论述中的专有名词。

③ 〔法注 4—4〕Michelet, *op. cit.*, p. 325.〔英注 4—6〕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43.

历史学家似乎一开始抹除自己好让新角色言说。相反地他自己走上了台前。他证实自己做了一个特异的行动:他打开了宝盒并且阅读了这些沉睡遗忘的证词。他告诉我们这些证词是情书。"这颗心显然在说。"然而这种言说的可见性只有他看得到。他向我们展示的是,那让他把它们看成是情书的东西:不是内容[f. 94]而是呈现:**"材料的细节最引人入胜;没有书写够优美,没有文件够伟大,更不用说用来绑档案的昂贵三色小缎带。"**①

指定这些叙述为情书的并非他们说的话。众所周知情书并不说爱。村里的爱国者就像恋爱中青涩少年一样。[c. 45]他们复制小说里的陈腔滥词,借来的甜言蜜语。新爱情的历史学家也没有任何场所去引述它们。然而他不再重写,像塔西佗重写伯森尼亚斯的滔滔雄辩一样。在贵族的修辞学和皇家经验主义之间,他要定义第三种途径,另一种对待他者言说的方式。这第三种途径,专属于民主历史知识,历史学家要从对"**情书**"的卑微出现进行两种运作开始,打开它。

① 〔法注 4—5〕*Ibid.*, p. 325.〔英注 4—7〕Ibid.

首先,他让我们看见它们,也就是说他让我们看见他如何拿着它们或者已经拿到它们,他能够用缎带的颜色证实这件事,这种真理的颜色是菲力普二世无法想象的,[f. 95]于是他承认自己比传递他的意义更低微。第二点,他告诉我们它们说的话:并非内容而是书写它们的力量,在它们之中表达自己。情书不能够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力量,也就是它们的真实内容。历史学家在叙述中,把它搬上台向我们展示。把情书打入冷宫而宣扬它们的缎带,他以节庆的叙述替代了它们:并非任何一种、任何地方的庆典,而是在再现本质中的节庆:收获季节的田野,齐聚在生命象征下的人民,生长与死亡的象征:新生儿,收成麦穗之间的鲜活花朵,它不能言说,但是透过母亲的口做了公民的宣教;老人坐在中间主持,被小孩围绕,以全体人民为小孩,少女们,戴上花冠或"**身着白袍**",其中有位少女宣扬"**高贵迷人的言说**",她们除了说要造就明日的英雄以外,没有对我们说什么。①

① 〔法注 4—6〕*Ibid.*, p. 327.〔英注 4—8〕Ibid., 446.

沉默的老人，妈妈使他言说的婴孩，[1]无声雄辩的少女，这些在场者"带着梦"回去：一群声音和西班牙国王一样低沉的人民。[f. 96]"**人民前进，他们不行动，米什莱告诉我们，人民不需要行动；人民前进，就够了。**"[2]我们可以说：人民不说话，人民不需要言说；人民自己代表自己，这就够了。以沉默人民图像替代乡村学者的冗长书写，米什莱发明了对于字词过度、故纸堆中革命的新解答。他发明了使穷人言说的艺术，借由使他们沉默，让他们像无声的人一样言说。[c. 46]卑微者虚荣地"**渴望书写，描述自己，言说他人**"，在此被放到一种精确运作下：历史学家使他们可见而让他们沉默。历史学家的叙述拿起正式纪录(process-verbaux)，并且向我们描绘缎带，与避免了言说骚乱的乡村之核心中，家族大节庆的图像。他们转化说话，永远已经说了话，永远是时间倒错之效果与错误，成为可见的。这种可见者展示了言说不足以表达的意义。叙述的真理奠基在被展示排列的文字意义储

① 〔译注〕英译为："a child whose mother speaks for him"，但是在法文中没有这种代言关系。

② 〔英注 4—9〕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41.

备中。然而这种意义储备本身向我们提供真实的说话者：不是公共作家，负责编辑不识字者文字的乡村学者或学究，[f. 97]而是生命的力量——诞生、生长与死亡的力量——在历史学家重构的图像中比在穷人非常有心的情书中更直接言说着的意义力量。

"**穷人**"的言说并非是空泛的，并非要清理字词的不准确性到空白页的极限。米什莱用另一种主张来反对皇家经验主义者：言说者绝不空泛地言说。他们的言说永远充满意义。简而言之，他们忽视了让他们言说，在他们之中言说的意义。历史学家的角色就是传递这种声音。为此他必需解消穷人言说运用其盲目口音的场景以引导它到其可见性场景上。他必须将言说引导到沉默上，使在它当中表达的沉默之声言说，并且让这个声音，使它从属的真实身体可以被感受。对乡下作家真实的事情也对大城市里的演说家更为真实。里昂烈士沙利耶(Chalier)[1]这位

① 〔译注〕沙利耶(Marie Joseph Chalier, 1747—1793)，里昂律师，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现今意大利的皮耶蒙地方出身。1793 年 7 月 17 日被反革命派处死。在里昂对雅各宾派的反扑，比在巴黎对罗伯斯庇尔的反扑更早。

伟大演说家的肖像提供了极佳的图示。对这位演说家，就好像对其他的雄辩革命英雄一样，米什莱没有给予我们其论述的只言片语。[f. 98]在革命演说家模仿塔西佗模拟伯森尼亚斯的模仿逻辑里，这使他的言说落到真理之外。他只为我们引用了一段文本：他的遗嘱，他的言说如同已死。如同已死是革命角色的唯一言说，让在其中表达的生命之声消失。① 如果没有任何场所能使沙利耶言说，是因为没有任何个人由他口中言说。[c. 47]在我们保留的一点点他预言式论述的“**非常**”口音中，实际上启示了：“**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位预言家，这位丑角不是一个人。② 他是个城镇，是个受苦的世界，是里昂愤怒的哭诉。黑色道路上的深层泥土，刚刚还是无声的，在他之中得到了声音。在他之中古老的阴影开始说话，潮湿**

① 〔译注〕此处英译“...lets go the voice of life...”英文文法难以理解。

② 〔译注〕在法文中“...n'est pas un homme”沙利耶似作为里昂拟人化的代表人物，在英译中“...not a man like other man”意义偏向将其作为超越其他人的代表人物。译者倾向认为沙利耶的例子在于说明米榭雷史笔无声之声抽离了现实的特性。当法文中说沙利耶“不是一个人”时，意味着拟人化活动取代了沙利耶这个真实个体的言说。参见本章注 4 之“拟人化抽象”(abstractions personnifiées)。

腐朽羞于见光的房舍开始说话；在他之中饥饿与警醒，在他之中被遗弃的婴孩，被玷污的女子，如此被贱踏的、被羞辱、被牺牲的世代现在觉醒了，坐上了他们的位子，在他们的墓上唱着威胁与死亡之歌……这些声音，这首歌，这些威胁，都叫做沙利耶。”①

名字与字词的差异，造成同名异义的猎人其十字架与愉悦的差异，在此得到答案。[f. 99]米什莱奠基的共和历史典范属于一种普遍化的异名同义(synonymic)②。沙利耶的名字与经过他的声音异名同义，与在其言说中取得声音的所有场所和世代异名同义。这既和演说者的名字有关，也和其论述的字词有关。陆上的泥土，潮湿腐朽的房舍真实地在里昂的以西结(l'Ezéchiel)③的预言中

① 〔法注 4—7〕Michelet, *op. cit.*, t. II, p. 532—533.〔英注 4—10〕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rans. Keith Botsford(Wynnewood, Pa.: Livingston, 1973), 6:156.〔译注〕中译修辞与英译不同，特别是歌唱这一句。

② 〔译注〕异名同义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与同名异义对反，指的是以不同的名字指涉了同一个事物。然而朗西埃在使用异名同义时，却指出米什莱用许多个名字之间的转喻，指涉一个被他普遍化的对象。

③ 〔译注〕以西结(l'Ezéchiel)，《旧约》中流亡巴比伦的犹太预言家。

言说。同样地，收获、花朵与田野的气味在联盟的文字中说出自己：叙述在使正式纪录本身与其真理相似、将正式纪录转化成收获的花朵时所彰显的正式纪录之真理："**这些乡下社群的正式纪录就好像从收获中绽放出来的茂密野花。在丰盛的良辰吉时，我们呼吸到田野的强烈鲜活力香气。我们漫步在成熟的麦子中。**"①

我们可以说这种田园追忆，就如同里昂泥土地的追忆，属于历史科学的文学前历史吗？这即是便宜忽略了文学所想要说的事，以更为忽略文学为科学算计在此所做的事。[f. 100]花朵的隐喻实际上完全不是叙述的装饰。它使正式纪录的意义可被感觉。用一种非常确定的方式。他借由组织视觉、嗅觉与触觉所操弄的感觉游戏[c. 48]刻意排除了一种感觉，听觉，那种会落入言说的声

① 〔法注 4—8〕Michelet, *op. cit.*, t. I, p. 329.〔英注 4—11〕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ocks translation), 448.〔译注〕在米什莱的引文中，英译者于"茂密野花。在丰盛的良辰吉时"之间加入了"In reading them..."，跳脱了法文直接的转喻修辞，掺入了读者的间接位置。朗西埃在引用米什莱时，在涵叙中异名同义的指涉方式，朗西埃所批评的米什莱，似乎难以产生出一位读者的位置。米什莱在此，透过异名同义，其实提供了一种在转喻间内在的神话式叙述，而非一种后设式的叙述。

音空泛之感觉。文学的隐喻把无经验的情书之内容等同于历史学乌托邦的梦想：现在在场，在现在中在场(la présence du présent, la présence au présent)。它使构成布罗代尔叙述重点的历史论述之诗学比喻取得位置。它构成了叙述与论述的记号与特权之间的互换性。米什莱实际上运作了这种革命，事件的叙述借此变成了其意义的叙述。在历史学家的展示中他以示范的方式革命，拿着这些文字，不向我们描述其内容而是其内容的意义；在把意义生产成叙述内容之解释的场所中，向我们描述这个意义。学者的论述形成叙述("**我发现这一切闪耀如昨日……**")，以至于叙述能够成为论述，以至于它自律地展开——在这种自动展开里，本维尼斯特说，"**没有人言说**"[f. 101]——能够将过去事件的追忆("**老人坐在中间主持……一群身着白袍的可爱团体走来……**")①与其意义的解释("**所有老的标志都褪色……真正的象征在别的地方……人的象征，就是人**")②登录为一，使他能够将它们

① 〔英注 4—12〕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ocks translation), 445—46.

② 〔英注 4—13〕Ibid., 445.〔译注〕米什莱以人的象征代替了人，就如同以沙利耶的名字代替了沙利耶。

放在事件在场意义的同一个在场下（“今日的一切或者褪色或者消失”）。①

作者对其作品的在场和叙事展开的自律性中他的缺席之间，互换性在这个奠基论述-叙述中，封印自己于现在式。米什莱是新历史书写特征的时态系统革命之创始者。并非他自己放弃了简单过去式的使用和叙事优势。② 而是打破了使简单过去式对立于宣告、批注或格言的现在式之对立系统。他悄悄抹灭了它，以利于现在式标记事件意义的内在性。联盟节的叙述为自己在场呈现了一个值得标记的时态交错。历史学家似乎首先对时代交错采取过去式的标记（“我发现这一切……”）③，为

① 〔法注 4—9〕Michelet, *op. cit.*, t. I, p. 324—331.〔英注 4—14〕Ibid., 444；“今日”加点表示强调。

② 〔译注〕此段开始朗西埃细致谈论了时态与在场问题，特别是简单过去时的问题。简单过去时在法文中使用于历史书写与新闻报道，而不常使用于日常用语中。它和完成时及过去时不完全相同，表达了过去发生、过去完成的事情。而完成时表达的是现在才完成的事情，过去时表达的是过去发生现在未完成的事情。简单过去时的另一个名字就是 prétérit，在翻译中，这种字形变化的微细差异，难以被直接译出，但却是整个论述的核心。以下译者会把时态标示出来，以供参考。

③ 〔译注〕“J'ai retrouvé...”（我发现……）文法为复合过去时（Passé Composé）。

了使[f. 102]节庆本质上更现在式化（“所有老的标志都褪色……老人坐在中间主持……”）①。[c. 49]于是叙述滑入了简单过去式以给其予指涉（“在圣安德奥尔，宣誓的荣誉……被交给两位长老”）②。他回到现在式以施加事件的力量（“一群身着白袍的可爱团体走来……”）③，让角色们被熟悉（“因为他们明天必需工作……”）④或者从历史中提取教训（“人们让妇女远离公共生活；人们忘记其实她们比任何人更有权利参与公共生活”）⑤。他固定在未完成过去时（l'imparfait）上，以本质化场景（“而这是在原野里发生的”）⑥。最后他废止了所有的时态记号，以在名词词组中绝对化事件的意义（“超越了传统象

① 〔译注〕“pâlissent”（褪色），现在时。主词为 préside，现在时。

② 〔英注 4—15〕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ocks translation), 445.〔译注〕“fut déféré”（被交给），简单过去时。圣安德奥尔（Saint-Andéol）在法国东南部隆河河谷，法国大革命时方成立市政府，国有化教会财产，以扩大城市的范围。

③ 〔译注〕“marche”（走来）。为现在时。

④ 〔英注 4—16〕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ocks translation), 447.〔译注〕“C'est qu'il faut”（他们明天必需）。现在时。

⑤ 〔英注 4—17〕Ibid., 448.〔译注〕“éloigne”（让妇女远离）；“oublie”（忘记）；“ont”（更有权利）。现在时。

⑥ 〔英注 4—18〕Ibid., 448.〔译注〕“c'était”（这是）；“se faisait”（发生）。未完成过去时。

征。全然自然，全然精神，全然真理”)[①]。

全然真理，实际上，就是时态、语气与人称区分消失之处，这些区分相对化事件或叙事者的定位使真理成为问题。米什莱从传统用法中抽离了名词词组——格言的无时间性——，为了以名词词组将历史的时态定点，并非他个人风格的单纯效果。如果费夫尔虔诚地[f. 103]保存它并且将它传入年鉴学派中，这是因为它定义了一种历史新知识的本质性诗学结构。它不仅仅是论述时态与叙述时态的方便连结者。更深刻地说，它是**过去显现**(*l'apparence du passé*)的中和。这种显现是历史学家的十字架，趋使他绝望地向“**当时的社会学家**”求援。过去显现冲击到非真理的谈论：不确定性、死亡，非本质。名词词组抹除了这种非真理。它是没有过去的叙事与没有主词的肯定。每个距离的指针，每个怀疑的标记，使事件形成距离或将叙事者放入视点中，自我崩解。米什莱发明来避免言说事件的骚乱并且给予历史可被接受的真理模态之历史风格因此有了标志性。

① 〔英注4—19〕Ibid.，451.

这和真理有关，只要真理意指超越事实与记号的精确性，超越来源的可信度和归纳的严格性，只要它涉及论述所献身的本体论模态。取代团体演说家或村庄作家言说的村庄泥土或者田野花朵，[f. 104 | c. 50]已经充分提醒我们。它们把我们放在真理的场地上，这种真理已经被柏拉图的命题与问题替西方思想定义：以鲜活的言说之名谴责死亡的文字；批评诗人说谎；是否有泥土理型的知识问题。[①] 对这些谴责和问题而言，米什莱的诗学提供正确答案，不仅仅给予新历史科学方法——可敬之处——也给予新历史真理的地位。他不给予泥土理型，理型没有用，而是声音，这个声音给予它身体并且将书写的死亡记号转换成其鲜活真理。而且他运用诗的媒介达成这一点，以使诗学的非真理失效。

实际上要了解论述形式与叙述形式的语言学交换意指什么，就必须认识哲学对诗的古老算计规则，真理思想对模仿艺术的算计。在《理想国》(*République*)第三书，柏

① 〔译注〕前为《斐德若篇》(*Phèdre*)与《理想国》中的说法，后为《巴门尼德篇》(*Parménide*)中所谈论之问题。在《巴门尼德篇》中，价值卑微如泥土的东西，是否有理型，是个哲学问题。

拉图按照虚假的程度来分类诗的不同形式。对他而言，这种虚假在诗人越把自己的介入[f.105]隐藏在对人物的模仿后面时越严重。越不欺骗的诗是那些诗人与其人物保持距离的诗，让自己被看成是他诗中的言说主体。这是叙述模态主导的诗，涵叙的诗。相对地，最欺骗的诗是诗人之我和叙述的要求缺席之处。那么，以悲剧的场景为例，战胜的是模仿的幻象。诗人作得仿佛他篇章中的字词就是俄瑞忒特斯（Oreste）与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字词，就是在专有名字中表达了人物之字词。对于悲剧模仿的谴责在柏拉图那里和对民主的谴责一起出现。悲剧幻象让自己属于表象与谄媚的民主领域，在其中演说家与人民（*dêmos*）的独断彼此无穷反映之处。

如果对诗人与民主的共同谴责已被充分评论，或许它模态化自己的方式还没有受到充分注意，在**模仿**与**涵叙**、在模仿与叙述的对立中。这种模态化的重要性是，空心地描绘了诗的可能赎回之条件。当运用反模仿的能力，叙述[f.106]不就正确地给予了诗一个真理体制（régime de vérité）？那么为何不给予民主（一个真理体制）？而米什莱发明的就是这样的用法，他这位民主人士

关心[c.51]将民主转换成真理，使民主从修辞学的声望与悲剧的暴力中抽离。他用叙述的能力摧毁模仿系统，塔西佗模仿伯森尼亚斯反而被所有的伯森尼亚斯模仿之处，这种文艺与政治的镜像游戏。模仿不仅定义了文艺的古老准则。它也是拉丁学者与人民演说家廉价借用的武器，让国王们不得好死的所有剧场人民的原理：弑君而非共和的死亡，修辞学而非科学的死亡。摧毁模仿的优先性是使民主能够免除于过度言说的统治，使大众的深层生命历史能够继承皇家编年史之共同要求。是它运作了奠基叙述。它使“**穷人的言说**”从一个意义体制过渡到另一个，人民的声音不再是演说家的声音之处。在给予剧场人民言说的引号之处，复制祖国之爱的陈腔滥词，[f.107]米什莱以叙述替代，任何情书没有说出的爱之叙述：反模仿的叙述。叙述从模仿之声中抽离言说以给予它们另一种声音。叙述把言说的意义放入裂隙，放入储备，放入免于新模仿和语言新措辞的庇护中。在使泥土或收获代替演说家与人民作家言说时，它让人民的政治统治与其学术历史在他们的场所中共同生根。它给予这个场所身体，使这个身体的声音平靖它们的哗变。它同

时使民主的主体和科学的客体取得位置。

历史科学并不因为反对叙述与文学的诱惑而有所斩获，而是借由对叙述中的模仿加以拘束而有所斩获。它并非不顾浪漫主义的过度夸大而有所斩获，而是在这个称为浪漫主义的运动核心中有所斩获，这种运动首先意指模仿统治的终结，与在文学无条件者中文艺规则的转型。① 在其绝对性中肯定它，在脱离模仿与文类的区分时，文学使历史可能成为真理论述。它发明一种新叙述来达成这一点。借由确保意义的现在时中时态跟人称的滑动，[f. 108]叙述奠基的远超过了风格的优雅。[c. 52]它固定了共同适用于人民与科学的存在方式。文学给予穷人故纸堆真理地位。它同时压抑与维持，借其专属途径中和了使历史可能与使历史科学不可能的这个条件：这是人类存有身为文学动物所具有的不幸性质。

历史角色的文学性被双重叙述中和，这种叙述展示

① 〔法注 4—10〕以下我回到 Lacoue-Labarthe et Jean-Luc Nancy, *L'Absolu littéraire*, Le Seuil, 1978.〔英注 4—20〕Lacoue-Labarthe and Jean-Luc Nancy, *The Literary Absolute*, trans. Philip Bernard and Cheryl Lester(Albany, N. Y.: SUNY Press, 1988).

了文字，并且使文字消失在它所表达的图像中。替代的文学部署提供了问题答案：如何在书籍之子革命的真理上言说，标记穷人故纸堆的裂隙到其真理上，而这个裂隙不应是字词对立于事物的单纯无场所？答案在双重叙述中，叙述撤销了文字，将文字转形成意义储备并使意义可见。两种叙述中的任一种，实际上定义了面对无知的一种知识定位：知识，面对教师或学生，是打开书柜的研究者之知识；知识，面对非专家的言说者，是学者排列书柜中的文字[f. 109]以它们的散文说出，他们所不知道的文字表达。隐藏者与可见者的游戏，如是自我显露的科学，借此建立在这种双重忽视裂隙中。

我们已经知道，只有隐藏者的科学，而这种隐藏者的生产是历史知识建构本质上的诗学运作。这一点必需好好理解，而不该向民粹主义的想象①让步，这种想象向我们揭露历史学家为剥夺了苦难的、创造性的人民其知识与声音，以隐藏文字并且关闭书柜来确保他知识上的特权。整理永远说出比意指更少的情书，并不是抽离人民

① 〔译注〕朗西埃在此批评苏联式的史笔。

鲜活的肉体，相反地是抽离其肉体的缺席。抽离缺席或者背叛就在最诚恳的情书核心中：背叛单纯在此构成，在字词之后，除了字词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文学在运用字词能力时暴露或掩饰的缺席。

要了解这一点更好的方式，是比较米什莱的叙述与展示不识字的人献给祖国的另一种情书之另一种文学实践。[f. 110]在形成《红骑兵》(*Cavalier rouge*)框架的短篇叙述的系列里，伊扎克·巴别尔(Isaac Babel)①插入了[c. 53]——假设被书写的——在波兰前线转向革命的库班哥撒克(Cosaques du Kouban)②骑兵之书信。加入红

① 〔译注〕伊扎克·巴别尔(Isaac Babel, 1894—1940)，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Odessa)，犹太裔小说家与记者。《红骑兵》为其成名作，记录了他在1920年参加布琼尼红军第一骑兵军，在波俄战争前线的纪录。波俄战争结果波兰获胜，俄军惨败，决定了苏维埃与波兰的疆界。巴别尔死于斯大林的大肃清。

② 〔译注〕哥撒克人分布在乌克兰与俄国南部，曾经是独立的附庸国，后被俄国所控制。俄国革命时倒戈支持革命，加入红军与白军。内战结束后，俄罗斯境内曾经进行去哥撒克化。库班的哥撒克人住在黑海边，在1917年俄国革命时成立库班苏维埃共和国与库班议会。在十月革命之后成立库班共和国，反抗苏维埃政权，后被白军将领邓尼金(Denikin)击败。企图复国的哥撒克人，在红军击退邓尼金占领库班后，反抗红军。红军占领库班后进行去哥撒克化，库班的哥撒克人随即流亡。

骑兵的知识分子模仿了真正的哥撒克骑兵为苏维埃的祖国所写的情书。然而库班的哥撒克骑兵确定没有能力写这些信来说出他们的爱。而且他们的散文只不过能把苏维埃抒情的陈腔与规律的公式串在一起。小说家模仿夸张言说的真正哥撒克骑兵们自己模仿了他们报纸的社论，他们刊登书信的报纸，《红骑兵》。但是谁能编辑这些社论，除了连队里的知识分子、犹太作家巴贝尔或者另外一个他的同类？模仿的完美循环，在此滋长了双重的怀疑，文学的——谁言说？——与政治的：谁不是在字词上而是真正地爱苏维埃祖国？这种爱情绝不会以哥撒克母语言说的方式说话。巴贝尔绝不会让库班草原的气味被闻到。在爱的字词后面没有任何黑泥土也没有任何花朵盛开的乡村。只有背叛与死亡，[f. 111]即将降临在布琼尼(Boudienny)①的哥撒克骑兵身上的死亡，即将降临在叛徒巴贝尔的死亡，不能发现用来描写与颂扬新生活的

① 〔译注〕布琼尼(Semion Boudienny, 1883—1973)，俄国元帅，第一骑兵军指挥官，当时斯大林为第一骑兵军书记，同为好友。第一骑兵军是布琼尼在顿河流域召集哥撒克人所组成，于俄国内战时击败白军，在波俄战争时为波兰所败。

字词。

这种背叛与缺席闭锁了米什莱式的叙述。沙利耶大可以是一位假里昂人，生于皮耶蒙（Piémont）皇室[①]的外地人，在他的名字与字词后面，有一个苏维埃的军事作家和英雄所缺乏的东西。那儿有萨瓦（Savoie）的雪和朝圣者的小径，那儿有道路与世代的声音。在排列文字的时候，米什莱放回了缺席。为了民主和科学他给予人民身体。他的文学运作关闭了通往一般人所认为的文学大门：字词的空虚就只是字词的空虚。隐匿文字的游戏保证了字词不“**仅仅只是字词**”（« rien que des mots »）。没有无身体的字词，无物或者无人的名字。人们可以用异名同义的普遍统治来对抗反对同名异义欺骗的无限不满，只要我们给予字词的不是它们永远任意的指涉，而是它们借以拥有身体的声音。双重叙述透过使双重权威登场，保障历史的对象反对字词的一切背叛：[f. 112]学者

① 〔译注〕皮耶蒙（Piémont）是意大利西北邻接法国的省份，首府是杜林。此处所说的是萨丁尼亚皮耶蒙王国的皇室，前身为萨瓦公国。1796年皮耶蒙成为亲法之共和国，1801年被法国并吞。为沙利耶的出生地。

的权威，忠于科学起源之档案研究者的权威，[c. 54]把永远欺骗性的文字转形成知识的精确储备；然而也是学者使它缄默以令它说话的新伙伴关系之权威，**无声的见证**（*témoin muet*）。

以叙述替代模仿实际上发明了这种无声见证者的角色，对历史的科学定位有其本质性。这种发明可以用《法国法律的起源》（*Origines du droit français*）[①]中有着“**修辞学**”（« rhétorique »）的外表的几行字总结。从浪漫主义认定的法律真正起源——并非财产而是亲属——出发来阐述法律时，米什莱遭遇了古代的弃婴行为：弃婴的历史不仅仅唤起古代风俗的残酷，也唤起了我们思想奠基的宏大叙事，摩西（Moïse）与俄狄浦斯（Œdipe）的故事。而米什莱直接移除了这种物质性或象征性的残酷。他告诉我们绝对没有真正被抛弃的婴儿。每个婴儿都被自然的母性所收养：“**被人抛弃，送给自然，他通常活得很好。犷野的母亲领养了他，为他冰冷的床铺上树叶，为他遮蔽了北风，用狼奶喂他，**[f. 113]**用狮子的骨髓喂他。**”所以没有

① 〔译注〕Michelet, *Origines du droit français*, 1837.

弃婴。然而对我们而言，本质被以下给予这个命题在意义阶序里对等物的句子说出：没有找不到其声音的哀伤。所有遗失的言说都被一个彰显其意义的声音所取代："母亲的悲泣是什么？只有她们能够说出。石头为她们哭泣。海洋自己在听到西莫尼德斯(Simonide)的达那厄(Danaé)的时候，为之感动。"①

在两个句子里总结了两种定义历史论述之革命的运作：言说储备与身体易位：只有她们——失去声音的母亲们——能够说出。条件句在此引入了一种反对无言强调的比喻。② 它是修辞学传统里无言强调③的精确反面：一种不可明言的模仿。无言强调透过造假，再现了不宜再现的东西：

① 〔法注 4—11〕Michelet, *Œuvres completes*, Flammarion, 1973, t. III, p. 607.〔英注 4—21〕〔译注〕西莫尼德斯(Simonide de Céos, 556—468 BC)，希腊抒情诗人。达那厄是希腊神话人物，与宙斯生下了珀耳修斯(Persée)。

② 〔译注〕pourraient 作为条件句的动词。

③ 〔译注〕无言强调(prétérition)又称 apophasis，其修辞手段为故意说他不要说。以西塞罗为例：他说，我更不用说，帮助反贼就是背叛罗马。

我可以要求它被放到您眼前

这个胜利之手上稀有而伟大的功绩……①

和被拒绝的呈现相反，条件句在此形成了抽离的效果：[f. 114]反修辞反模仿的效果。条件句把[c. 55]母亲的悲泣放置——诗歌事实上不曾停止模仿的悲泣——在不可模仿的阶序中。唯一能说出哀伤的女人缺席、无声，和所有的模仿保持相同的距离，就像天上的天狼星对所有会吠动物的距离一样。放置在不可模仿的记号上，叙事的内容接受了真理的标记。我们所不能模仿的主体变成了真理的保障，言说拥有场所的见证，一种一直无声，却再次在与模仿极端不同的论述中言说所表达出的意

① 〔译注〕此句引文中引用并模仿了拉辛(Jean Racine)的作品《亚历山大》(*Alexandre le grand*)(1665)，以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十二音步亚历山大体写成的悲剧诗歌，第一幕第二景的句子"Il se vit terrassé d'un bras victorieux, Et la foudre en tombant lui fit ouvrir les yeux."(他看到自己被胜利的手臂压垮，闪电落下使他睁开眼睛。)。拉辛此诗意在说明亚历山大战胜大流士，透过其武力，使胜利可见。不清楚米什莱在此模仿拉辛的企图为何。但其模仿一方面将这两个句子顺序颠倒，其次使用了条件句而非陈述句。米什莱的修辞手段，使可见的胜利从武力的直接结果，转变为在条件句限制下的现前。朗西埃并未告诉我们米什莱作了讽拟的倒转，而是强调条件句。再现不再是一种事实而是假设。即使要求，也只是假设。

义。模仿的不可能性产生了无声的见证，它拘押了科学的真理，而自己不能释放真理。女人言说的比喻——叙事的合法要求——变成无声见证的女人——知识的合法要求。

必须单纯地有一种声音身体的易位：它使太子村或里昂的泥土言说，但是于此在零度上表达：“**石头为她们哭泣。海洋自己在听到西莫尼德斯的达那厄的时候，为之感动。**”对不习惯言说者、场所与事物的论述，回响了唯一能够说话的母亲、[f. 115]不可模仿的母亲。回响了，也就是替代了。石头哭泣，海洋感动。言说的母性场所，为了无声的母亲言说。有一个接受并且使达那厄、她的儿子与她的声音经过的海洋。①

使纸上的石头哭泣与诗的海洋的这两行是纯文学吗？如何不被严肃历史学家的严肃宣称之亲子关系所打

① 〔法注4—12〕如果米什莱说到海洋(océan)而不是海(mer)，并不是因为他敬重赫西俄德的(hésiodique)古老神祇，海洋在其专属的神话中得到特定的意指(signification)，海洋是有声音的海。“海洋是一种声音……海洋是一个创造在其活力中，开始与持续的大熔炉，它有生动的口才；它是向生命言说的生命。” *La Mer*, Paris, 1861, p. 400—401. 〔英注4—22〕*The Sea*, trans. W. H. Davenport Adams(London: T. Nelson and Sons, 1875), 300.

动：“**我们历史学家冒昧地接近他；他像是对待使臣一般地接见我们，以最高雅的礼貌风度……**”或者“**罗伯斯庇尔之死使我们从柯尚过渡到托克维尔**”？如果我们立即在其描述者的不相似性与在其意指者的清晰性上了解这些句子，不就是为了米什莱借以创造它们指意所特有体制的初始过度之理由吗？① 而米什莱借由这种初始的过度创造了他们意义的特殊领域吗？初始过度是借由叙述——或神话——为历史创造真理场所的句子之过度，句子本身无法以真或假指定。

实际上有三种处理神话的方式。有一种是诗人西莫尼德斯的方式。他接受了传统的故事，[f. 116]达那厄被父亲关在一个箱子里，[c. 56]和儿子珀耳修斯(Persée)一起丢入浪中。他在这个框架上致力模仿达那厄的悲泣。一种是神话学者的方式，他们诠释这些神话故事，并且尝试抽离出其实体核心。也可以是，以譬喻家的方式，一种

① 〔英注4—23〕英译者在说明指意(signifiance)时，把它解释成语言的元素在不同组合中产生意义的能力。我们不太了解英译者此注的根据为何。因为对朗西埃而言，是过度造成意义的领域，而不是指意造成意义的过度。朗西埃处理的是指意关联中外在性的消除，无意义的排除。

在寓言故事外衣下隐藏的深层真理。这可以是,以批评的方式,一种原始情感的表达:在寓言的原创语言中所比喻人性的各种原始惊讶或恐惧。例如:米什莱的师傅维柯(Vico),向我们解释希腊想象中宙斯的诞生时,就是这么进行。他向我们指出上古希腊人,被雷电的现象震慑惊吓得呆若木鸡,把原因归给他们假设借由这些记号向他们说话的神。①

米什莱采取了第三种途径。他不像诗人一样重复达那厄的悲泣。他也不像神话学者一样去问宙斯爱情的希腊寓言能够意指什么。使新历史可能的浪漫主义的书写,立即把自己放在模仿的天真与诠释的科学之古典选项外。这些选择[f. 117]永远假设了外在性:模仿的范例或寓言中隐藏意义的外在性。米什莱将自己建立在排除两种外在性比喻——模仿与诠释——的叙事连续性中。质问米什莱是否相信达那厄的故事没有任何意义。质问

① 〔法注 4—13〕Vico, *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Armand Colin, 1963, p. 110—111.〔英注 4—24〕Giam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trans.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150.

他为何在证明中包含了一个他不相信的故事,也没什么好处。叙事是消融这些问题的行动。它在其悬置所有信念问题的连续性中,自己公正地证明,没有关联到意义的外在性,没有无意义。叙事确立了无意义不能够存在。它说出了意义的内在性——和所有说出的事物的同一种意义。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模态言说:从发声的言说易位到无声见证的声音。石头或哭泣海洋的叙述给予历史奠基的神话学。**神话学**应该被理解成在所有泛神论的指涉与原型的魔幻之外。**神话学**在此要非常精确地说成是**叙述-论述**、叙述与论述的对等:**神话**(*muthos*)是一种**言理**(*logos*),提供理由的叙述,在叙述形式下给出的科学。伴随达那厄和珀耳修斯旅程的原初**神话**[f. 118|c. 57]也同样是**言理**的叙述。根据希腊字 *legein* 的浪漫主义字源学,**言理**的特性,是收养①:给每个小孩母亲,给每个哀伤声音,给每个声音身体;就像每个母亲一样,在意义寓居与不提供无意义位置的叙事之安全性中,将字词带进避风港。这种言理的特性,文学必须将之显示成反对自己。

① 〔译注〕recueillir 在法文中也有汇集的意思。

诗人、骗子西莫尼德斯的达那厄是虚构。但是从诗学的肌理中可以淬取出西莫尼德斯没有说的事：海洋与石头的哭泣。人们可以使它们成真，使它们过渡到真理那一边。真理那一边，就是言说不再被写在纸上或风中，而是镌刻在事物的脉络中。这是对立于永远被模仿的欺骗污染的喋喋不休的言说之表现性与指意的场所。米什莱告诉我们真理在哭泣中比在言说中更容易读出，在事物的部署中比在论述的规秩中更容易读出。它在没有人尝试言说、尝试欺骗之处更易读出。无声见证的理论扭结了两种乍看之下互相矛盾的宣称。首先，人人言说，[f. 119]没有缄默症(mutisme)，没有失落的言说。其次，只有无声的人真正言说。

"大地的守护者，人类的纪念碑，这座墓穴包含了一个有需要就会言说的无声见证。"[1]在哂笑米什莱的招魂术幻影之前，必须认识他所想象的逻辑结构的形态：唯有要言说(*parlerait*)[2]的人言说。而非尤其不是，已经言说

① 〔法注 4—14〕Michelet, *Œuvres complètes*, Flammarion, 1973, t. III, p. 610.〔英注 4—25〕

② 〔译注〕parlerait，条件式。

(*parlait*)的人言说。只有储备言说、墓穴言说的条件式——反过去时——能够奠立现在时而没有历史叙述的错误。**只有能够说话**(*seule pourrait dire*)的人才言说。条件式的无声之声只能借由墓石或岩石的哭泣回归我们：没有纸张的声音，被铭刻在事物中的意义，人们可阅读的，人们可能[1]在日常生活的质料性中无穷阅读的：**"可能必须[2]能够在此清点所有无声的记号，人借由这些记号，可以说出和重复这个迷人的奥秘：衣服的象征以贞洁的肉欲唤起了两种存在的混淆；家庭庶务的象征表达了劳动的和谐分歧；房舍的象征[c. 58]应许了一生的美好伙伴。"**[3]在此，在婚姻上，[f. 120]如同之前在亲子或死亡上一样，有一点点比我们积极的耳朵所能承受更多的感伤(pathos)。然而这就是开启劳动与日子象征、开启亲子与房舍、石头与死亡故事的我们的历史工地。新历史书写的条件，开启了使它们在场的条件式：无声见证贞洁地

① 〔译注〕pourrait，条件式。

② 〔译注〕faudrait，条件式。

③ 〔法注 4—15〕Michelet, *Œuvres complètes*, Flammarion, 1973, t. III, p. 607.〔英注 4—26〕

或死亡地护卫着的象征阶序。

历史学家所带入无欺骗指意的无声见证世界，实际上是我们世纪的历史追还为其领域的世界：取代大使们的书信或者穷人故纸堆的，是不言说的言说、铭刻在事物中的讯息之多样性。米什莱的“浪漫主义”过度就是奠基过度，让此严肃历史解读可能的象征阶序过度：对于这些人们读到其所生产与将其转化之特征、行动与限制的领土之解读；所有纪念碑与物质文明痕迹之解读：对象（objects）与工具的世界，日常的实践，身体的使用［f. 121］与象征的行为；简而言之，这整个物质生活宏大规律性与心态史缓慢变异的领域，被米什莱，我们学术式历史受到尊崇又令人沉重的奠基之父，为历史开启。如果我们的世纪已经能够以这个宇宙的坚实反对文字的空虚与《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作者的浪漫主义词汇，是因为他开始把历史标记成**一切言说**（*tout parle*）的空间，因为他把领土的层叠（plis）或石头的侵蚀、家用对象或日常生活的举动，标记为不中断论述的场景，因为他把它们建置到无声见证——铭文和讯息的信差——当中。他将它们形成为黏合而成的意义构造（configuration）之松解部分，一种

象征（*sumbolon*）①原初意义下之象征构造：破成两片的对象，它的两个碎片重新合一，见证结盟。

一切的第一种结盟，是身体与声音结盟，也就是说，在最终的要求下，母亲与婴孩的结盟，意义的母性要求与论述的雄性子女要求结盟。［f. 122｜c. 59］正是这种意义的逻辑描述了达那厄与她的小孩相伴的旅程。这个海洋将他与母亲送进避风港的婴孩，在神话学中有个响亮的名字。他是珀耳修斯，把人变成石头面容的美杜莎（Méduse）之征服者，安德罗墨达（Andromède）及其母亲的解放英雄，女性普遍的解放英雄，一开始带着他而后他必须把她从束缚她的石头上解放出来之意义母性的解放英雄。在弃养、领养、与弑父的婴孩之书上，米什莱实际上添增了特异的一页。他让伊里帕斯与摩西的弟弟上场。如果珀耳修斯与母亲一起被关在箱子里，那是因为神谕向他的祖父阿克里西俄斯（Acrisias）②预言他女儿的

---

① ［译注］参考第五章注 15。

② ［译注］阿克里西俄斯（Acrisias），珀耳修斯的祖父，在珀耳修斯打败美杜莎娶得安德罗墨达凯旋回国之后，并没有遇到他的祖父。双方是在另一个城邦的葬礼比赛中相遇，珀耳修斯掷出的飞盘意外砸中祖父。

小孩会杀了他。出于阿克里西俄斯的小心提防,有了以下的后果:达那厄被监禁,被黄金雨临幸,被惩罚与她的小孩被抛入浪中。但珀耳修斯是一位幸运的俄狄浦斯。不但没有娶他母亲,还将她从一位不匹配的丈夫手中救出。而且他只是在运动场的偶然意外中杀了他祖父。所以珀耳修斯的神话提供了言说主体之伤害的最乐观版本:一个遗弃在自然与意义母性中的婴孩被收养,并且解放了养育他的母亲与自然母亲以还清债务:大地的子宫——借由她[f. 123]而有言说与意义——即使这个意义自己被他所养育的婴孩释放自由。

这个历史的诗学神话,我们知道对米什莱是不可解消的政治神话。象征的理论将历史学家的三种契约,叙事的、科学的与政治的,严格地统合为一。必需继承皇室系谱学与徽章的,是对意义传递与合法后裔的新思想,身体亲子关系与论述阶序的新关联。为了民主政治与学术化历史叙述,米什莱发明了这种介于自然的母性诗学阶序,以及严肃科学与法治共和国的雄性阶序之间亲子关系的思想。他发明了一种象征阶序,在其中既前进且回归的运动必需派上用场。人是他特有的普罗米修斯

(Prométhée)。他是自己从大理石中抽脱出来的雕像,从自然与恩典的原初女性宇宙中挣脱的子女。[c. 60]然而这种恩典朝向正义的运动,从原初象征体系朝向理性阶序的运动,只有借由回归的运动才可能,它重建了永远受到失去威胁的亲子关系。[f. 124]儿子必须承认他的原初连结,对于共同意义(sens commun)①的母性大地起源之债务,使他在理性和正义的严峻平衡中更好地变形(transfigurer)。现代共和国中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清偿这个债务,重建法治共和国及其原初大地之间的连结,为此他必须从回归起源开始,从重新变成不-言说(*en-fance*)②状态意义下的婴孩开始,铭刻在事物脉络中不喋喋不休的意义。以此代价他才能统一共和国到其土地与其过去上,统一学者与政治人物到其人民上。

确定的是,我们离这些母性传奇与亲子义务很遥远。可是严肃历史学家对这种童稚状态的合法不耐烦,可以

① [译注]一般翻译为共识。

② [译注]朗西埃和拉康一样玩弄 en-fance 此字的拉丁文字源。拉康所指的是能够言说前的婴儿期。朗西埃指的却是借用珀耳修斯神话所谈论的亲子关系,在这种亲子关系中,婴孩是母性大地所收养的意义;在过去时中,不真正在场被说出的意义。

反过来读。社会科学的实证命运，留给我们一个失落的政治乌托邦。米什莱之梦，就像孔德(Comte)、涂尔干、牟斯(Mauss)或费夫尔之梦，已经可以消失了。剩下的是达那厄与珀耳修斯的寓言，更合法地比喻了意义的新体制，象征的新阶序，在其中，学术化历史在君王的死亡记事和穷人侵略性的喋喋不休之间找到其语言与句法。

第五章　言说的场所

[f. 125|c. 61]为了要使这些穷人故纸堆的骚乱平静下来，这个骚乱入侵了失落的时间，将历史置于真理之外，因而需要一个对于论述与身体阶序关系的确定理论；一个对于言说主体，关于主体、知识、言说和死亡之间关系的确定理论。简而言之，如此便假设了一个无意识的理念与精神分析的医疗行为。

这个理念可以珀耳修斯的神话来呈现，俄狄浦斯幸运的弟弟。然而米什莱所知道的俄狄浦斯自己就是个幸运的英雄，他并未造成任何乱伦或弑父的威胁。与索福克勒斯(Sophocle)笔下的英雄相反，他唯一犯的错就是没

有尽责找寻他不再关心的双亲。[f.126]这将导致他无法完成任务,释放被禁锢的母体意义,从石化状态下救出。解读的尽头没有死亡。相反地,只能够是他必需带入生命中的死亡之谜。历史学家就像是俄狄浦斯。而俄狄浦斯本身是个精神分析师,就字面的意义而言:一个灵魂的解放者。我们必须用古代的意义去了解**灵魂**(*âmes*):那些要被解救的灵魂是地狱的居民,哀悼着他们暗无天日的处境,渴望着人间生命的活血。比起尤利西斯(Ulysse)或埃涅阿斯(Enée)的旅程要来得幸运的地方在于,历史学家有权力将灵魂复活。[c.62]因为他知道他们已死的秘密,并将这个秘密总结为一个微小且具决定性的意义转变:这些地狱亡者的灵魂其实是那些死得**太早而不知道**(*trop tôt pour savoir*)他们曾经活过的人,那些**未及早知道**(*pour n'avoir pas su assez tôt*)活着所意味的,不知道该如何诉说的人。米什莱将笔借给他们,让他们坦白他们死亡的秘密,其实他们不曾了解生命之谜:"**我们死了仍结结巴巴。我们可悲的编年史已证实得够了。但我们仍未获得人类至高的属性,**[f.127]**那个可辨的、清晰的声音,唯有他解释,透过解释给予抚慰。如果我们也有一个声**

音,我们能说出生命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①

"**我们死了,仍结结巴巴**"(« Nous sommes morts, bégayant encore »):此分词所带来的悬置,使得时间与因果关系难以辨别。生命死于生命的结结巴巴,死于生命在了解和表述自己上的延迟。制造出政治和知识的骚动之时代错误的哗变,导致言说存有命运中本质性的时间错置,活着的事实意味着不知道生命是什么,说话的事实意味着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无意识不过是对于被言说所把持的生存者之生命知识的缺乏。而死亡不过是非知识(non-savoir)的另一个名字。无意识和死亡是两个对等且可互相替代的观念。死亡并非知识,而是等待解放自身的知识。平息声音的骚动等于平息死亡,安抚那些死于无知与不知如何诉说生命意味着什么的群众。要将这些灵魂——死者——从无知中解放,就需要一位能够告诉他们自身秘密的精神分析师俄狄浦斯:

---

① [法注5—1]Michelet, *Journal*, édité par P. Viallaneix, Gallimard, 1959, t.1, p.378.[英注5—1]Jules Michelet, *Mother Death*: *The Journal of Jules Michelet*, 1815—1850, trans. and ed. Edward K. Kapla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4), 121—22.

[f. 128]他们需要一个俄狄浦斯来解释他们自己所不知道意义的谜，教导他们自己所不了解的话语、行动意味着什么。他们需要一个普罗米修斯，在他偷来的火旁，那冰冷浮荡在空气中的声音便会聚拢过来，开口说话。我们需要更多。我们需要了解更多从未被说出的话……我们必需促使那些历史的沉默开口说话，即历史不再说话的、可怖的延长符号，而这些正是它最具悲剧性的声调。[c. 63]于是唯有死者退居于他们的墓穴。开始去了解他们的命运，将不和谐化为非常轻柔的和声，彼此以低沉的声音互相告知俄狄浦斯剧的落幕之言：*πάντως γὰρ ἔχει τάδε κῦρος*〔因为主宰已完全这么做了〕。阴影互相致意，互相抚慰。他们同意让自己的骨灰坛再度尘封。①

① 〔法注 5—2〕*Ibid.*. 此为《科罗诺斯的俄狄浦斯》(*l'Œdipe à Colonne*)最后一行："因为这个故事已得到其完全的后果"(Car cette histoire a reçu sa pleine sanction.)。〔英注 5—2〕Ibid., 122—23.〔译注〕此句英译为"Everything has been fulfilled.(一切都已实现了。)"此处的希腊文由魏德骥直译，他所建议的另一文言式翻译为"天命俱成"。因这个句子本身的意思复杂难解，故一并列出以供读者参酌。另请参考 Sophocles, *The Oedipus at Colonus of Sophocle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Sir Richard Jebb(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9), line 1779.

米什莱这段日记有两种解读方式。我们可视其为一个人对于时代与其迷恋的标记。我们从中辨认出那雀跃于墓地的孩童，将妻子尸体掘出端详的鳏夫，专注于医学院同僚解剖的学者。[f. 129]我们因而追随着这条途径，由此恋尸癖直至历史学家所号称自己死亡的特权，一而再"**无数次**"(« tant de fois »)地横渡死者之河，以偿还历史向其召唤者所欠下的债："**我们接受死亡为你笔下的一行**。"(« Nous avons accepté la mort pour une ligne de toi. »)①但我们可以倒过来掌握事物，从悬置于一再渡河之必然性的这行书写出发。此"**恋尸癖幻象**"(« fantasme nécrophilique »)将作为严谨理论部署的要素而显现。等同死亡与无意识，即包含在科学中的死亡，不是作为剩余而是一种可能性的条件。真理论述中的历史建构取决于正面结合在历史情感(l'affect historique)②核心的双重缺

① 〔法注 5—3〕Michelet, Préface de 1869 à l'*Histoire de France*, in *Le Moyen Age*, Robert Laffont, 1981.〔英注 5—3〕

② 〔译注〕Affect(情感)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名词，指涉到一整套影响行为的心理机制。这里应该是指涉历史学家的"恋尸癖"，即对于过去的特殊热情。参考尚·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尚-柏腾·彭大历斯(J.-B. Pontalis)着，《精神分析词汇》，沈志中、王文基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0)，12。

席之可能性。之所以有历史是基于曾经发生的过去与对过去的特殊热情。且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这些事物在话语当中缺席,被命名的事物在名字中的缺席。历史的地位有赖于对那些**已然不在**(*qui n'est plus là*)的“**事物本身**”双重缺席之处理——已然过去的事物——与从未发生的事物——因为它从来不是**它被说的那个样子**(*été telle que ce qui a été dit*)。历史情感即系于那些命名者的个人缺席。

[f. 130]透过对应于这种缺席,历史论述自我定位。修正主义同化了历史的可能与不可能条件。它戏剧化了这种双重缺席,借此缺席产生了在杀手字词与弑君之比喻中的历史,而此比喻截断了字物间的比例关系。米什莱使得此对等往与修正主义相反的方向作用:[c. 64]历史之不可能性的条件就是其可能性的条件。每一种缺席的形式都不外乎是另一者。死亡不过是生者的非知。字词的欺骗不过是死亡的无常必然性。此双重缺席即对于在场(une présence)的双重保存:让生命得以复振,以及透过导致自我缺乏的死亡让知识证实自己。一切政治的与知识的灾难在无知的与死亡的等同中被废除,历史学

家——作为其子与幸存者——所欲平息的死亡:在对自己无知的过去生命上添加知识——对生命的补充——却无法清偿它的债务;但反过来也可说是提供了历史论述缺席与隐藏的面向,唯此面向可以将历史从编年史的陈腔中救出。[f. 131]对此缺席的赎回,是历史为了与小说的背叛划清界限。但与此缺席的契约——将死亡包含进来——则是为了挥别编年史的旧传统之所必需。

实际上,编年式历史的主要缺陷即在于此。并非科学或数字使它可畏,而是死亡。借由拒绝“**抽象具体化**”(«abstraction incarnée»),借由掌握那些可由不容争议的档案去证明的主体与事件,假装进行实证方法与科学的工作。但是这些假严谨的秘密,是对于死亡的恐惧。编年式历史于对国王与使臣的行为和姿态并没有拜物似的依恋。其支持者都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它更依附于生命与建制的连续性,使国王继承死去的国王,以及使臣的任命更替。实证主义式历史则拒绝面对其客体的缺席,而若无此“**隐藏**”(«caché»)便不是科学的,而它也不能埋没为尘封箱底的档案。而米什莱带给历史科学的“**隐藏**”是死亡的隐藏生命。但是编年式历史依然固守着结结巴

巴的生命。生命所能做的，就是继续结巴地和历史说话，[f. 132]或者填满这些坑洞，让它的口吃合理化。在瑟诺博司的"**历史方法**"(«méthod historique»)中，这种合理化有个意味深长(significatif)的名字。它叫做心理学(psychologie)。"**心理学**"让历史学家得以拉紧档案之间的细丝。① 但这种心理学又是什么呢？精确地说，这是一门对畏惧死亡与拒绝下地狱的人而言的"**灵魂科学**"(«science de l'âme»)，将灵魂等同于死亡。

[c. 65]在修正主义者的魔鬼研究当中，却以非常精确的比喻，将死亡置于其主张的中心。它将自己悬置于弑君者的丑闻，即可归咎于字的虚假所导致的合法性之死。它用美杜莎的头颅冻结了死亡，且从那一点开始，以对于意识形态无穷无尽的揭发来建构自己。但是对意识形态的揭发并非科学。它不过是对于科学的朦胧渴望，在对欺骗性力量的不满中消耗自己。历史叙述的科学形

① [法注 5—4]"了解社会事实的条件，就是自我再现身为社会事实作者之人或人群的条件，以及能够关联到心理状态的条件，或许定义得非常模糊但却为人所知地足以让我们了解它，就是行为的动机。" Charles, Seignobos, *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1901, p. 215. [英注 5—4]

成超越了在遗忘死亡和冻结死亡之间的二选一。它穿过了"**神话的**"对抗，这个对抗同时纳入与镇压死亡。纳入死亡是对于已过去与无意识——不再意识——的等同，它将字词与过去的"**虚假**"(« fausseté »)转换成对于在场与知识的保存。[f. 133]墓穴中的无声见证被严格等同于科学所需要的"**隐藏**"。墓中的"**声音**"恰如其分地比喻着一个新历史科学的精确理性，超越了所有的恋尸幻象。喋喋不休者的声音没有场所，他们死于不知道自己曾经说过什么，被作为无声见证的声音而赎回，成为合法的声音，经由场所给予它场所与通行。墓穴即死亡，从它的虚假中赎回，具有场所且给予场所之死亡。墓穴的"**热情**"被简化为逻辑游戏的冷静，借此言说存有的生产由缺席的侵噬中痊愈。一切都在说话，一切都有意义，在每个言说生产都可指派到一个场所之合法表达的尺度上：形塑人们的大地，让他们玩演交换(échanges)的海洋，可以解读他们关系的日常物品，保留了他们印记的石头。纳入死亡与无声见证的理论是同一个：一个言说场所的理论。

在这种言说场所定义下，对于死亡墓穴的思考方式以及对于土地的思考方式彼此结合在一起；作为声音历程的

死亡理论以及作为意义铭刻的空间理论。[f. 134]没有这番强调,我们将很难了解此双重关注从不停止指引新历史的研究方向往明显有距离之地理的与宗教的领域。[c. 66]我们要如何构想此必要性,其要求吕西安·费夫尔从《大地与人的演化》(*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到《拉伯雷与不信神的问题》(*Rabelais et le problèm de l'incroyance*),要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①从《法国农村历史的原初特色》(*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到《奇迹的国王》(*Rois thaumaturges*),或要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②从《一千年以来气候的历史》(*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到对蒙塔尤(Montaillou)的纯洁派信仰研究?我们知道费夫尔强调新历史对于人文地

① [译注]马克·布洛赫(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 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创始者之一,专长为法国中世纪史。代表作品除了此处列出的两部,尚有:《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史家的技艺》(*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等。

② [译注]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29—),法国年鉴学派史家,专长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史,以及环境、气候与历史的关系。他是1970年代新历史(Nouvelle histoire)的倡导者及微观历史(micro-historique)的代表者之一。其代表著作除了此处列出的《一千年以来气候的历史》,还有《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理所负的债。且他以一部作品以免除地理学家及其竞争的历史学家于涂尔干社会学派所声称对"**地理决定论**"(«déterminisme géographique»)的不满,来承诺兑现了这个债务。《大地与人的演化》试着去勾勒出一条在社会学家的反地理主义与拉采尔(Ratzel)①的人类地理学的过度之间的中道。然而这场在原因与法则前线的战斗,承继自科学时代,将那更深刻连结新历史计划至地理学典范的留在阴影中。[f. 135]历史的"**地理学化**"(«géographisation»)事实上可回溯至米什莱,且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将历史用原因的理论加以武装。它的效果反而是,让历史逃离法则与原因的科学大战。米什莱给予历史的地理学"**基础**"(«base»),即便是一个对种族理论的回应,并不让历史事实屈从于地理资料。更深刻地说,这是一种地理学化或领域化(territorialisation)。它跟土地或环境的影响无关。精确地说,土地不能没有墓穴。土地是意义的铭刻,声音的历程墓穴。新历史所诉求

① [译注]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德国地理学家,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倡导者。在其著作《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 *J. Engelhorn Stuttgart*, 1882—1891)中,强调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类分布、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进程。

的“**地理学**”首先是一个给予国王好的死亡以及建立历史科学之首要条件的象征空间：任何留存的言说都不能没有场所。透过发明某种心理分析，历史可以既是共和的也是学术的：一种将自己安置在无意识中的灵魂解放——象征的地理学。借由意义领域化之“**浪漫的**”运作，它既是共和的也是学术的。[f. 136]后者在地与海之间，在平原与高山之间，岛屿和半岛之间，分摊字词过度与声音的配享(partage)。国王的共和式死亡实现了，在米什莱的笔下，为了一个没有穷人故纸的人民之利益，那些在《法国群像》(*Tableau de la France*)中生动描绘的领域化人民：一幅山区出身人们的镶嵌画，他们从树丛中走出，在平原上工作，辉映着天光，或被雾色浸透。米什莱式的场所理论，[c. 67]移除了任何言说或将成空的可能性。借由每一个都确实表达出原因的言说生产，它禁止了无意义。如此一来书籍之子将再也不会迷失。因为每本书中的那些句子，终究，就是被领域化同时入土了①的

① 〔译注〕此句英文漏译了“en même temps qu'enterrés”(同时入土了)，enterré意思是被埋葬的，也可衍伸为被遗忘的。

身体之音，被大地的特质所形塑而成的身体之声音。此与地理决定论无关。泰纳(Taine)①门徒的奇想**对反地**(*a contrario*)证明了：任何场所都可以让自己引发任何特性。它更关系到将普遍化表现性原理加以实现，以及将从书写到声音、从声音到身体、从身体到场所的传递性加以实现。在极限上，它关系到唯一一个意义含混的游戏：**场所就是给予场所者**(*le lieu est ce qui donne lieu*)。任何言说的生产也就能够把自己再现成提供场所者的准确表现，[f. 137]它特有合法性的准确表现。所以，书籍的论述，就算它显现为乌托邦式或异议式(heterodoxe)，总是可以被诠释为一种**意见**(*doxa*)，一种**场所**(*topos*)②的表现。

① 〔译注〕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法国文艺评论家与历史学家，倡导社会实证主义，且对于自然主义有很深的影响。他最广为人知的名言“race, milieu et moment”(种族、环境与时间)，race指一种普遍影响个人的集体文化倾向，milieu指可以改变个人之文化倾向的环境因素，moment指对于该人而言的累积经验，说明时代环境对于分析文艺作品的重要性，将美学客体视为社会的产物，而非自发的天才创造。

② 〔译注〕topos(τόπος)希腊文的意思是场所(place)，来自于tópos koinós(公共场所)一词，复数形是topoi。在古典修辞学中，论点(argument)得自于topoi，是为帮助解释不同观念之间关系的领域，亚里士多德区分为普遍和特殊的。在现代则称为topics(论题)。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里没有可能的异端（*hérésie*）。且由此可掌握到一个将新历史的领域式思考连结到宗教异见（dissidence）问题的必要性。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年鉴时代史学家们的主要关切中比喻成形：拉伯雷之有问题的不信仰，蒙塔尤的农民与牧羊人之纯洁派信仰，磨坊主曼诺齐欧（Menocchio）之异端，[①]诸如此类。且我们首先会惊讶于宗教和其越轨行为（écarts）是如此吸引历史学家。我们要如何理解有个费夫尔花了十年从被遗忘的旧文件中挑出教会圣职人员的琐碎争执，总结出，拉伯雷只有也只能够拥有他所在年代的信仰？在这些热情投入与历史的新数量级（échelle des grandeurs）之间的不成比例，似乎指出以下此点：异端并非心态史的特别对象。它所提出的毋宁是像这样一个历史是否可能的问题。[f. 138]心态史是可能成立的，只要异端被放回它的位置上，被指派到它的时间与场所。因为异端是穷人故纸与书籍之子革命所显露事物的真正本质。它是言说的过

① 〔译注〕此为意大利史家 Carlo Ginzburg 所著《奶酪与虫》（*Il formaggio e i vermi*）的研究主题。此书亦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度，来自书籍与关于书籍的暴力。如果异端为了字词问题而撕裂了社会体，那是因为它首先就是言说存有的骚乱：由书写所掌控的对生命的骚乱，从其自身解离出来的生命的骚乱，因为书写而转而对抗它自己。异端是意义的生命，[c. 68]只要它抵抗自然和其象征化的任何游戏，只要它总是沦为这种过度或阙如的牺牲品，此即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神秘寓言》（*La Fable mystique*）中所示范分析的：一方面，言说过度找不到它的场所，这阐释了教士拉巴迪（Labadie）的流浪命运，从耶稣会士到加尔文教徒到虔信派教徒到千禧年主义者，最终是——在同名异义的致命阶段——一个拉巴迪派（labadiste）；[①]另一方面，透过遵守《圣经》（l'Ecriture）使生命沉默的极端缺乏，以底比斯（Tabennesi）修道院的"疯女人"为例，这个无名之人才刚被认识就随即消逝了。

这个疯女人，因为她从来不在我们可以谈论她的地

① 〔英注 5—5〕Michel de Certeau, *The Mystic Fable*, trans. Michael B. Smith(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I :271.

方，她伪造了份由此机构保证的合约〔……〕[f. 139]最后，任何合约，无论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语言的合约，她都不兑现。当她重复我们的用字及故事，她将它们的欺骗渗入其中。或许当“*sym-bolos*”作为一种产生联合的虚构，那她就是“*dia-bolos*”，透过该事物的不可命名对于象征的劝阻。①

对历史而言，这等于是异端的赌注。根据它的词源，异端即是分离（*séparation*），但是在一个精确的意义下：严格地说，它是“*dia-bolique*”②——一个破碎的、不能被修

① 〔法注 5—5〕Michel de Certeau, *La Fable mystique*, Gallimard, 1982, p.58.〔英注 5—6〕Ibid., 39.〔译注〕引文中疯女人的故事记载于 *Lausiac History*：在公元四世纪，隐士 Piteroum 受天使指示拜访底比斯修道院的疯女人，向她跪下并要求她祝福，而她则回道：“你祝福我，大人。”经隐士开示，众人纷纷向隐士忏悔自己曾经对疯女人的羞辱愚行。德塞都认为，疯女人作了一个对隐士话语的重复以及对于交谈双方称谓上不对称的模糊响应，可以说她“拒绝”了隐士所赋予她的象征地位。

② 〔译注〕diabolique 是前段引文中 diabolos（διάβολος）的形容词，在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ies*）中，diabolos 的意思是错误指控或毁谤，在修昔底德斯的使用里有敌对或争吵的意思。在此字的动词形态 diaballein（διαβάλλω）中才有抛掷或穿越的意思，延伸为彼此的敌对不和、人身攻击与欺骗误导等等，特别是言语上的错误所导致的分离。dia（διά）有穿过或在两者之间的意思，可以是在场所或时间之间的移动，也可指导致的原因，因而διά作为前缀，可以表明方向性，也可以（转下页注）

补的象征（*sumbolon*）①，一小片不能够与任何其他毗连的金属或语言，一个没有母亲的小孩，一个与身体分离的声音，一个与场所分离的身体。喋喋不休者没有一个收容他的场所，无声见证者闭上了口。来自魔鬼的（diabolique）之要求禁止了身体间的交换，使真理的场所代替无意识的喋喋不休者说话的身体交换。可以说它禁止了心态史。假使心态史是可能的，它便必须与魔鬼结清关系。它必需给他一个场所，使他隶属于他的场所。为此它必需激进地重新诠释异端的差异，将自己等同于无意义的域外（hors-lieu）加以镇压。重新解释的原则很简单。它将魔鬼的转为被误解之象征的（symbolique）。

（接上页注）指不同方向。βάλλω则是指对着人做投掷的动作。朗西埃在此应比较强调διά的意思。参考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s. v. “διάβολος,” “διαβάλλω,” “διά,” “βάλλω,”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① 〔译注〕sumbolon（συμβολον）的意思是符木（tally），裂成两半可以结合成一片的东西，每个裂开的既各成一部分，又可用以对应彼此。例如作为象征的符记（token）、通关文书、收据或契约等等。此字的动词形态 sumballein（συμβάλλω）有着与βάλλω相同的意思，在近身搏击中向彼此投掷或互冲；或者作为集合、加入、缔约的使用。这个集合可以是基于敌意或比较，也可以作为彼此同意的安排，成为统一体。参考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s. v. “συμβολον,” “συμβάλλω,”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f. 140]它将出自异端的分离，作成在两个场所之间的简单差异。

于此再度地，米什莱成为建立心态史革命严格意义下的创始者。他"**最无懈可击**"的一本书，在他撰写《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的二十年间，思考《女巫》(*La Sorcière*)，给予其最精确的公式。这涉及了将魔鬼，一个"**空洞的实体**"(«creuse entité»)，转化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意义的现实，[c. 69]涉及了给予它有血有肉的真实之名。为此，根据象征阶序的"**亲子**"(«filiale»)逻辑，必需给它一个母亲。魔鬼的真名是撒旦，"**温暖且活生生的现实**"(«réalité chaude et vivante»)之子，被圣书(Livre)[1]的子民污名化为女巫。"**魔鬼**"(«diable»)是一个纸上的生物，被言语(verbe)的贫乏仆人与模仿者所发明，为了使撒旦脱离肉身，恶魔化撒旦——女巫的忠诚与梦想之子。且女巫本身就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在身体与场所之间象征的结盟之主要守护者，大地精神与家的神祇之忠实仆人。"**女巫**"(«sorcière»)就只是"**教会的罪恶**"(«le crime de

① 〔译注〕请参考第49页注1。

l'Eglise»)[1]，不被承认的女人，她的家庭与大地象征主义之守护者功能，不被男人——死亡之书的崇拜者——的政府所承认的女人。[f. 141]她是场所与家庭的神灵(génie)，被蔑视世界者所否定之俗世崇拜的神灵。撒旦是为其子，她所想象的生动现实，为教会所禁绝之场所神祇的替代品，他们不灭地活在"**家庭寓所的最私密处**"(«au plus intime des habitudes domestiques»)[2]，在家的中心，床，以及摇篮上。他是被禁止逗留的灵魂，被禁绝了传递的场所，禁绝了身体与意义之亲缘的场所。魔鬼的，是自然母亲——提供场所的场所——被拒绝、禁止的象征性。这里没有魔鬼的，没有阻碍，没有意义的崩溃，除非透过此唯一圣书之子民——忘了自己母亲的孩子——的运作。

米什莱以此方式设定了心态史的条件：所有的女巫或异端，一切想象或沉默都可以回到它的场所，被当作

① 〔法注5—6〕Michelet, *La Sorcière*, Julliard, 1964, p. 27.〔英注5—7〕Jules Michelet, *Satanism and Witchcraft: A Study in Medieval Superstition*, trans. A. R. Allinson(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39), xiv.

② 〔法注5—7〕*Ibid.*, p. 139.

同一个表现力量的产物而被分析。他者的偏差只不过是同一的不被承认之力量。时序错误与无意义没有场所。严格来说，魔鬼遭到了驯养(domestiqué)：被指派到*domus*(家)，转化成历史学家亲密的共谋者。多亏了米什莱式的过度，在我们时代的学院史学家得以趣味回顾其被控制的长途旅行：[f. 142]**"当十六世纪结束时，魔鬼一定走遍了欧洲所有国家，甚至在下个世纪的前几十年；通过比利牛斯山的高山隘口，在我看来，就像是打开了通往西班牙的大门。"**魔鬼从米什莱的火焰中炼聚平息，变成了文化的产物，其进程与移动都是可以从场所与时间之差异去指涉的：[c. 70]**"但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大主题，此刻我们只关心一种不对等，山区世界劣势的落后问题。"**①

一个场所与另一个场所不对等。一个时期比另一

① 〔法注 5—8〕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2e éd., Paris, 1966, t. I, p. 33—34.〔英注 5—8〕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1:38.〔译注〕此段所使用的两个引句皆出自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于1966年出版的第二版。英译者使用 Siân Reynolds 的英译(请参考第26页注2)即翻译自该版本。此处法文引句与英译版本有些不同：前一个引句的英译版省略了"il me semble"(在我看来)，后一个引句的英译将"immense"(庞大的)翻译为"fascinating"(迷人的)。

个时期落后，①这就是**"这个大主题"**(« l'immense sujet »)始终能够回来的地方，被言说所掌握生命的骚乱。这就是宗教差异的血债把自己简化成：**"这都是宗教的事务，信仰、习惯、不同的传统、甚至烹饪习惯丛集的结果。"**②以布罗代尔坚实的冷淡主义(indifférentisme)③，发生在西班牙高度天主教王权与犹太人之间的抵触，毋须任何对于圣书或圣书子民的指涉。它可以被充分比喻在以猪油或以橄榄油为主的料理大战中，[f. 143]其中对于犹太人的排挤，被对于他们食物的吸纳所抵偿，在每个

① 〔译注〕此句英译为"One time period moving more slowly than another"将法文原句的 retard 翻译为迟缓(moving more slowly)，并未清楚地表达出这里的 retard 重复自于前段引文最后一句 "d'un retard au détriment des univers montagneux"(山区世界劣势的落后)。

② 〔法注 5—9〕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2e éd., Paris, 1966, t. II, p. 139.〔英注 5—9〕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2:807.〔译注〕该引句的英译为"isolation was the consequence of..."(孤立是……的结果)与法文所引稍有不同，法句中并无 isolation。可能来自于该引文英译的前一句中提到"the isola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ies"，对于犹太人的排挤。

③ 〔译注〕冷淡主义(indifférentisme)指一种认为所有的宗教同等地有其价值的理论。反过来也可说是贬低了宗教的根本价值。和单纯对宗教的漠不关心(religious indifference)略有不同。参考 *Catholic Encyclopedia*, s. v. "Religious Indifferentism,"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7759a.htm(accessed June 4, 2012).

文明建构性的吸引与排斥运动中。且这个“**自己配享**”(« se partag-er d’elle-même »)的必要性，即文明的特色，终究将按照地质压力的范例而被理解：“**基督教化的西班牙正在自我完成的过程中，冰河推挤它的重量摧毁了它所遇到的树木和房屋。**”①这个地质学指派的粗暴，就在有着许多速度的历史②之精炼核心，让此问题的赌注显示出来：在这些书页明确的计划背后，是要缓和对于西班牙君主反闪族这种过度轻松的指控，有一种清理宗教战争中不规则性之历史领域的考虑。世界经济史学家毫不细致地玩弄地质决定论的本义与比喻，就像之前他玩弄“**加权数字**”(« poids du nombre »)达到恶性循环的极致——人口学的压力解释了对犹太人的排挤，犹太人的

① ［法注 5—10］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2e éd., Paris, 1966, t. II, p. 154.［英注 5—10］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2:825.

② ［译注］此为朗西埃引用自布罗代尔于《在 1950 年历史的处境》中的一段话：“没有独一且简单流动的社会时间，而是有许多种快慢速度的社会时间，其与传统历史与编年史逐日的节奏毫不相干。”(“... il n’y a pas un temps social d’une seule et simple coulée, mais un temps social à mille vitesses, à mille lenteurs qui n’ont presque rien à voir avec le temps journalistique de la chronique et de l’histoire traditionnelle. ”)请参考 Fernand Braudel, «*Positions de l’histoire en 1950*», *Écrits sur l’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1969, p. 24.

排挤被用来证明这个压力。① 但它总是，在最终的分析当中，一个场所神灵的理论，让极为注意心态的历史学家非要去付诸作品，[f. 144]以了解这场蹂躏了言说存有社会的书写之战。

以这个发生在 1318 年阿列日高地的独特神学争辩为例：

就在那年，帕米埃出生的贝特朗·科迪埃说，我在桥那边的基耶堂区一带，[c. 71]碰见四个塔拉斯孔人，他们其中之一叫萨维南的阿尔诺。他们问我：

——帕米埃有没有什么新闻啊？

——有人说(特别是)……敌基督诞生了，我回答。所以每个人都得看紧他的灵魂；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萨维南的阿尔诺突然插嘴：

① ［法注 5—11］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1e éd., p. 357.［英注 5—11］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1:415—16.

——我才不信这些！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开始或结束……去睡觉吧。①

一个言说事件，假使有这样一回事：在欲报复对圣经不信仰之法官的法庭上，一个证人出来，以过去的时态告发了这个在1318年帕米埃谈论新闻的人——敌基督即将到来以及一个在上床睡觉之前，反对有那样一天的塔拉斯孔石匠。要如何了解这个言说事件？要如何了解这个漫不经心地确认了世界永恒的石匠其荒诞之言？[f. 145]历史学家的回应是很简单地去追踪这个漫不经心的倾向，这个熟稔的倾向将所有言说过度带回它自然的场所，回到那个提供其声音身体的场所。这个塔拉斯孔石匠的异端并非精微的神学，而只是一个山区居民表达他

① 〔法注5—12〕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Gallimard, 1975, p.524—525.〔英注5—12〕英译者按：此书有英译版，由Barbara Bray翻译，*Montaillou: Catharssion and Cathol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294—1324(London: Scolar Press, 1978)，但英译版内容较为简略，并不包含朗西埃所摘录的这段引文。〔译注〕此处引文从法文直译。读者可另行参考此书中译版之该段引文。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下)，许明龙译(台北：麦田出版，2001)，640。

对于那些相信千禧年事件而沸沸扬扬的城市其千禧年说法之怀疑论。他自己不是引述了，为了支持他在神学上的大胆，一个在他家乡的玩笑话：**"一个男人跟邻居的老婆搞上床，是天经地义的事"**？世界永恒并非一个神学问题。它以一个和通奸之恒久相同的民间智能模式来加以肯定。它属于在萨巴特山区的那些闲谈。它表达了那些山区之民的自发观点，他们生活在严格教条与城市多变的理念之间的裂隙①："萨巴特，蜷缩在拟古主义……前卫的，显示它几乎不容许天主教见解的新(甚至脱轨的)潮流。"②这些山区出于自然的③必要而接近它们的天堂，比起城市的与教条的天堂，要来得更古老也更年轻。[f. 146]且在这种怀疑论与纯洁派的成功之间没有矛盾。让萨巴特山区的居民抱持怀疑论的理由也滋养了蒙塔尤的纯洁派信仰。这是一种农民的信仰，他们只能想象一

① 〔译注〕此句的英译为"who live at great remove from the rigorous dogmas of the changing ideas of the cities"，似乎把法文的et误译为英文的of。

② 〔法注5—13〕Emmanuel le Roy Ladurie, *op. cit.*, p.526.〔英注5—13〕〔译注〕此处朗西埃刻意以删节号串连前后的引文应理解为"前卫的拟古主义"，意思上较为通顺。另可参考《蒙塔尤》中译本641页。

③ 〔译注〕英译中漏了"自然的"(naturelle)。

个与他自己的很相似的世界，拒绝了神学家的天堂与肉体复活的精妙，[c. 72]为了一个构造成**农夫家舍**(*domus paysanne*)的天堂之利益，由**家**(*ostal*)的热度所驱动。且再度是这种实际的看法(sens)让蒙塔尤乡民追随**纯洁者**(*purs*)的教理，那些纯洁者要求他们严格遵守净化宗教的戒命，且允许他们继续宽松的生活模式直到**慰藉礼**(*consolamentum*)[①]的日子。所以异端应根据意义(sens)与场所的严格符应来思考。它是一个分离领域的同一(identité)：一个自发的异教徒农民世界(*paganus* 这个字，如我们所知，同时意味两者)的同一，就像米什莱的女巫，忠实于家庭中古老而永远年轻的神祇，大地与丰饶的神祇；山区居民世界的**分离**，对于城市的教条漠不关心，直到有一天后者前来关心他。

由于在我们名之为的历史事实中，当然，在正统与异议之间的疏离对立采取了一个宗教法庭与异端无情

① [译注]纯洁派的教徒分为全徒(Perfecti)与信徒(Credentes)，前者数量少，形成该宗教运动的核心。个人要成为全徒需经过的仪式称为慰藉礼(consolamentum)，意思是圣灵的洗礼，将浸礼重生、赦罪与授秩礼合而为一的仪式。许多信徒在临终时才举行慰藉礼。

的对立形式。[f. 147]且黄十字[①]的阴影降临在乡村社会的生动描述里。这些对于慰藉礼优点的恶意解释，在历史学家的民族学看法中以现在时态同情这些古老的农民的实际看法，因而在向死者致意的庄严仪式中僵化了自己。**“一个人可能被诱惑去说蒙塔尤找到了对此经典问题的解决方法：如何不用累死自己就能够进入天国？然而黄十字下的村庄在这个看法上所做的选择，充满了宗教裁判审讯压迫的沉重，为牺牲者勇敢地承担，因而用这种玩笑话去呈现这个问题是下流的。”**[②]

一个人可能被诱惑……那是下流的……于此这个假省笔法(prétérition)[③]仍不仅仅是个修辞问题。它所操作的是一个在言说的两种状态之间，以及书写对于言说存有的两个扣押之间的短路。这里有个宗教裁判官的档案

① [译注]十二世纪时，罗马天主教会宣告纯洁派为异端，并下令悔改者需佩戴黄十字作为明显标志。

② [法注 5—14]Emmanuel le Roy Ladurie, *op. cit.*, p. 541.[英注 5—14]

③ [译注]假省笔法(prétérition)为修辞技巧，作者或说话者借由否定的方式去凸显其所欲谈论的主题。

传递给历史学家洞察力的东西，装备以民族学和乡村社会学的方法：允许了重建一个社会关系网以及它可感知的有机土壤之证言——[f. 148]一个同时寄寓着一种语言和一种大地的方式，一种用字的品味，一个场所的声音。且档案仅止于此，这里更有个档案没有说出的东西：宗教裁判的事件，以死亡作为摆脱圣经的代价，同时打破了村庄习俗的宁静与他们解释的宁静。[c. 73]当然，历史学家以他自己的方式衡量说与不说的关系。勒华杜拉里知道这是村民的"**不幸**"而给予他"**机运**"去探索这个特别的材料，复原蒙塔尤"**有血有肉的农民**"生活。[1] 他因此知道关于宗教裁判者"**给予**"村民的这个言说能或不能够说什么。且他悬置了纯洁派村民的"**便宜天国**"(« ciel à bon marché»)这种恶意的解释，当这个解释看起来像是在与死亡玩下流游戏。但我们必需理解此悬置的功能。我们可先认为这只是一个不礼貌的句子，只要死亡得到致意，确实，这个解释便重拾同一种逻辑与同一种玩笑语

[1] [法注 5—15]Emmanuel le Roy Ladurie, *op. cit.*, p. 9.[英注 5—15]

气的理络(fil)("**一个人可以因而保持古老、迷人与散漫的萨巴特生活方式**"[1])。然而它不只是向历程中的死亡致意。[f. 149]它所作的，以米什莱式的说法，将他们带回到他们的墓穴，将他们与生者分离：埋葬受到死亡打击的异端，以复活蒙塔尤的农民们。

对于解释的悬置使得乡村社会学与被宗教裁判所带来的死亡命运分开。就在乡村正常的脱轨生活与宗教裁判审讯的死亡之间确定的分割中，有的事情就这样消失了，落出场外：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就是异端本身。说历史学家不想要了解宗教裁判可能是错的。他不想要了解的是异端：言语的迂回生命，被言语所迂回。要责备他化约了异端解释只是徒劳。精确地说，他的意图并不在于解释异端，"**给出一份阿尔比派(albigeoises)神学的详尽关系**"，而是"**在过程中指出，这种神学如何在村庄核心的社会厚度中取得肉身。**"[2]他的对象不是异端，而是给予它场所的村庄。但是给异端位置就是对它的镇压本

[1] [法注 5—16]*Ibid.*, p. 541.[英注 5—16]
[2] [法注 5—17]*Ibid.*, p. 344.[英注 5—17]

身，也就是透过将它领域化去埋葬它。宗教裁判官以根除的方式来镇压异端：将它标记，将它放到暗处，[f. 150]将它杀死。历史学家则相反，以使它根深蒂固的方式来加以镇压。透过给予它大地与石头的颜色，使它无法从场所中被辨认出来，仿佛是回顾地将其从审判定罪中抽离。

于是，心态史与异端的基本关系变精确了。[c. 74]心态史学家并未把异端作为其领域中一个特别的部分去邂逅它。而是把它作为此领域可能性条件与不可能性条件之等同去邂逅。为了让没有任何存在理由的东西被写出来，必须要有异端：十四世纪阿列日村庄的生活。而异端的消失也是必需的，如此生活才能在心态史的现在时中重写。**只要有异端**，一种奉献给死亡、没有场所的言说生产，就有心态史的材料。**只要没有异端**，没有不是场所的生命所表达的言说，没有不是大地所再现的天国，就有心态史。借由引领死亡回到墓穴的操作，可能性条件与不可能性条件之等同积极地作用。[f. 151]为了使1318年阿列日的村庄，就像1790年七月的多菲内村庄，开始说话，为了历史学家成为此言说的"**当时人**"，一个过去的民族学家，总

是必须重新开始这个操作。历史的叙述-论述命运因两个事件，言说存有与死亡的两个极端关系之解释而悬置：弑君与宗教裁判。弑君是不可赎回的死亡，崩解在声音骚动中的合法性，在那里沉默者不被听见，唯有喋喋不休者才会被听见。无法赎回的死亡将皇家经验主义者对于用字的不满定着到与历史契约(le contrat historien)决裂之"**修正主义的**"极限。宗教裁判的死亡，则刚好相反，是可赎回的死亡，它产生了历史中缄默者与沉默的言说。这是为何女巫的"**心理分析**"是对于共和历史奠基的必要迂回，一个从国王的美杜莎断头中被解放出来的历史。

俄狄浦斯式的历史学家永远不会停止做一个"**恋尸癖患者**"，如果他想要把生命之血给予死去的灵魂。历史透过对死者的心理分析，让科学的罗盘失控旋转，达到了科学的尊严而仍是个故事。[f. 152]平静下来的死亡给予它一个领域，在那里历史可以成为过去的民族学家。但也是这个死者契约更新的确认操作，①阻止它消失在

① [译注]"l'opération maintenue de la reconduction des morts"意思是死者更新契约时对其权利的确认运作。英译为"the sustained operation of leading the dead back"(将死者引领回来的持续运作)。

它的胜利里，不让它只是过去的民族学或社会学。这个历史特有的差异，是死亡，是将自身附属于言说存有独有特性的死亡力量，[c. 75]是由这个力量引入对所有实证知识的扰乱。历史学家不能停止抹去死亡的界线，也不能停止重新去描绘它。历史在这个死亡与知识的往还搏动中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是一种特异的科学，便是这般玩弄它不可能条件的科学，不停地将不可能条件转化成可能性的条件，然而也尽可能偷偷地、谨慎地重新标记这条不可能的联机。

第六章　书的空间

[f. 153 | c. 76]物质生活之空间-时间的**地理-历史**(*géo-histoire*)与心态的**民族志-历史学**(*ethno-histoire*)，便如此围绕着同一个基本张力来阐述，在这当中，言说事件倾向于在它的领域化中消失，直到历史为了不使它自身消失，必须要重新划出被抹除的连字符号①。要划出这条给予历史本性之线，即重新标记出意义与死亡的界线：历史性(historialité)②与文学性的界线，若无此界线将无场

① 〔译注〕此处英译者将法文的"le trait d'union"(连字符号，将两个字组成复合词时使用)直译为"line of union"而非英文的 hyphen。

② 〔译注〕historialité 指一件事的历史特性，特别指人(转下页注)

所可书写历史。因此,围绕着被否认的异端,活生生的场所与死亡言说之间的意义游戏得到了安排;但或许,更背地里,是这些地与海的游戏,围绕着死去国王的寓言。

[f. 154]为了加以了解,让我们回到事件性死亡与国王之概念性褫夺的比喻叙事。现在我们无疑地较能够去理解此一褫夺的意义:为何与如何国王"**历史力量**"(« force d'histoire »)的遗产必须从堆满在他书桌上那些文件里的人民中抽离。在米什莱式革命的界线,这些喋喋不休的人民被替换为一种人民的图像,这种人民出自于提供场所之各个地方的杂多性。他们不再是《法国群像》中的民族-人民,而是世界-人民:在领域的明显不相称与时间性的偏移中,卡斯蒂利亚运输业者与奥格斯堡的银行家,[c. 77]阿拉伯或高加索的游牧民与威尼斯船商,塞浦路斯的农场主,拉古萨的水手,以及马德里的加里西亚卖水商人,构成了这幅镶嵌画。但是这些纸上人民的领域化一点也没有耗尽国王之死所意指的理论事件

(接上页注)在社会当中的关联。在本章的脉络中,指让历史主体成形的方法界线。在第七章中,作者使用的另一个字 historicité,亦翻译为历史性,各自说明六、七章的核心概念。请参考第 209 页注 1。

意义:国王的历史力量,其作为历史中心与组织者的能耐,被替换成一个名叫地中海的新主体。

回到这个章节的最后几行:

> 我不相信当地中海这个字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时,[f. 155]会伴随着我们所给予这个字的意义,这个字也不会让他联想到如我们所熟悉的阳光碧海之意象;甚至这个字也不会指出一些主要问题的精确范围,或者框架出一个清楚构想的策略。真正的地理学并非君主教育的一部分。这一切理由可以充分说明此结束于 1598 年九月之临终的漫长痛苦,并非一个地中海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充分让事件史(histoire evenementielle)与结构史(histoire des structures)的距离再次标示出来,尤其是空间史……①

真正的地理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且这个真正的

① [法注 6—1]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p. 1087.[英注 6—1]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2:1236—37.

地理学如何符合于阳光碧海这个布罗代尔自己经常喜欢反对的意象？“**尤其是**”(«plus encore»)意指为何，这个词不满足于再度穿越书的架构，而似乎要给这些空间一顶仿佛结构所呼求的空洞冠冕？而这些终结章节与段落的悬置点呢？它们在地中海中当然不是互相隔离的。但是它们的重复，回响于国王之死叙述的每一个段落，以及它们带到全书最边缘的悬置，[f. 156]独特地戏剧化了它们在书中处处扮演的叙事与理论角色：一个模仿水手航向危险的动作——由一个论点朝向它的结论，由一个例子推广到它可能的普遍化，由一个轶闻带出由此可得到的教训，由一个推测导向验证它的问题场所，简而言之，由一个确定的点导向了包含许多问题的空间。但是，借由模仿“**乐在其中**”(«où l'on se perd avec délices»)的研究动作，这个句子也让空间概念的问题部署有了韵律，[c. 78]让迭合交错的多个地中海其自身差异有了韵律。

这个多样性与布罗代尔借由强调地中海空间所构成之多元性(pluralité)而定义的有所不同：被统合在地中海这个名字下许多海洋所综结的地理多元性；循着被地中海形塑以及形塑地中海之人类活动构成与散布的道路，

处在地理学家的地中海与历史学家的地中海之间的差异；分隔或混合了传统活动中不动的海洋、贸易航线的空间，[f. 157]以及大海战战场于时间性上的多元性。问题并无关于这种多样性。而是关于给予它意义的统一体类型。实际上这种统一体本身使自己去除了其多样性，使得将海洋的概念统一到它的生存经验上，或将它的经验性统一到它的隐喻功能上之多个方法加以显现；多个象征的空间，差异地型构了结构与空间的关联，皇家的继承在其中上演，它们给予空间观念本身一种不同的意义与权力。

实际上要如何去思考这片缺少国王的凝视，而却被这个凝视所召唤，使它接替成为历史力量的海洋？“……**我们所熟悉的阳光碧海之意象**。”但其坚决地是一片陆地式的海洋这点，是布罗代尔不断促使我们去思索的：一个由流动的平原、分散的盆地所形成的海洋，那里的交通依然紧贴着海岸，透过少数的渔夫水手所标示，甚至透过建船所需木材的“**大量短缺**”(«grande disette»)而被标示出来①；

① [法注 6—2] *Ibid.*, p. 300[英注 6—2]

一个地中海，不断地在邻近它的起源——或许形塑它的山脉[1]——与它遥远的延伸之间抹消自己：非洲的沙漠、中亚的大草原、佛兰德的平原、[f. 158]流向波罗的海或北海的河流。无疑这种抹消符合历史学家的意图，在将波浪的移动与知识的扰乱等同起来的古典隐喻中已然可感受到。我们不是应该要"**横渡时间的恶水，不管水势险恶**"(« à travers les eaux troubles du temps, malgré les eaux troules »)[2]，找到一片作为支点的坚实大地？我们不也应该要从海洋变动的形貌转向这些将地中海空间之功能统一体加以定义的陆地式大规则？地中海的统一体，[c. 79]是使其成为历史主题的内在性原理，即系统的与行动网络的统一体。但我们要如何去思考这个赋予内在海洋人格的网络？如果历史的海洋是由人为而非由自然所单独形成，我们能够从何种统一的力量、何种支配的行动来思考地中海的人类统一体？

答案或许看似明显：统一了一个空间的行动，也就是

① 〔法注 6—3〕*Ibid.*, 2e éd., t. 1, p. 46.〔英注 6—3〕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1: 51—52.

② 〔法注 6—4〕*Ibid.*, 1e éd., p. 246.〔英注 6—4〕

将其分散部分关联起来的行动，就是交换。且这个统一体的组织端也就是此交换的组织场所端：都市空间。在《地中海》的第一版中如此强调"**诸城市萦绕在海洋历史中的位置**"[f. 159]。"**每件事都导向它们，每件事当中都有它们的存在与力量之记号。它们在一个基本上是转运空间的海洋里发号施令。在地中海区域，它们就是且依旧是真正的家乡**[1]。"为此论证的逻辑所说服，读者感到惊讶，尽管那些城市都用了轶闻或文学引述的方式来描绘，如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维琴察(Vicenza)、和维泰博(Viterbo)。选择一般的航海城市足以指出，海洋对城市之特别关联隐喻了一种非常基本的肯定：海洋的统一体即是贸易流通世界的统一体。

我们知道这种肯定在此作品第二版时便遭到了严厉批评。诸城市所声称的优越性被放到了那些光辉幻景的地位，有如事件的短暂急逝，迷惑了匆促的观察者。有一个证据反对这种眼花缭乱的景象："**十六世纪的地中海主要是农民世界，佃农与地主的世界……作物与收成是这**

① 〔法注 6—5〕*Ibid.*, p. 292.〔英注 6—5〕

个世界里的大事，其余是上层结构，[f. 160]**积累与不正当地转向城市的结果**①。"地中海活动的核心不再是充满活力的交换行动，而是农民世界的例行之事。它的基本节奏不再是经济动力生产结构的基本节奏。它是不动与重复的空间之节奏。但我们要如何去设想在一个空间之下许多空间的统一体？要如何从这些并陈的不动去设想运动？布罗代尔确实翻转了这个论述：精确地说，"**新经济史就是要从这些生命无穷面对的运动与不动中出发建构**②。"[c. 80]但是这个回答将我们带至问题的核心：要如何了解在"新"与不变不动的世界之间，在新历史与经得起大历史冒险的诸般力量之间，此一受到重视的连结？

关于地中海统一体的问题或许可以用这种方式提问：我们如何设想在历史节奏与历史可理解性条件之间的关联？将历史割划成不同层次乃是根据差异化的两个重要判准，速度的增加与关系系统的复杂化来操作。[f. 161]然这些判准要如何转译成可理解性的判准？在

① 〔法注 6—6〕*Ibid.*，2e éd.，t. II，p. 517.〔英注 6—6〕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2：1241.

② 〔法注 6—7〕*Ibid.*，p. 518.〔英注 6—7〕Ibid.，p. 241—42.

人类交换的加快理性化与历史论述特有的理性之间有何关联？从近距离观察，这个问题的答案模糊的很独特。"新经济史"势必引起在历史三层次的两个图式之间的交流，而它们涉及了两个完全对立的"**历史意义**"。

第一个图式是发展与进步的图式，且是从最简单的行动到最复杂的行动系统，与从极度的迟缓到最高的速度。此图式是由《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所揭露的：最底层的是重复的世界，那些"**从史前时代流传下来的解答**"(« solutions venues de la nuit des temps »)①，以及在几乎不可动的可能性循环之中的狭窄禁闭；被压制的时代，那些"**蒙昧之人**"(« hommes peu lucides »)②的时代，就物质上和智识上都不可能冲破可能性之狭窄限制。其上一层，是"**生动的与喋喋不休的**"(« vif et bavard »)交换的时代，③在这之上将会建立起第三个时代，征服者的时代，产生出一个世界层级之市场与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④

① 〔英注 6—8〕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xii.

② 〔英注 6—9〕Ibid.，xi.

③ 〔英注 6—10〕Ibid.，xv.

④ 〔法注 6—8〕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 *op. cit.*，p. 9—12.

[f. 162]这个运动——从最落后到最先进,从最迟缓到最活跃,从最简单、最愚钝到最复杂与最理性地组织——相符于现代性自发的目的论。但是它也定义了一个科学理性的模型,根据这种理性,人类解剖学就是“**猿猴解剖学之锁钥**”。马克思主义式大宣言的理性模型,也就是年鉴学派革命最直接启发者的模型。它勾勒出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社会学或西米昂的经济史特质。此社会知识的理性[c. 81]提出一种接替已死之皇家合法性的建议:代替地中海无可想象之君主位置的,是耕耘了大地与海洋,这群世界性交换大游戏的主人翁们;代替编年史家位置的,是为此新主宰之当时的社会学者:当时的社会与市场复杂理性的研究,给予了他们对行动与关系上形式较不成熟的智识。我们知道这个国王——经济学家与学者——社会学家的征服理性,对于新历史计划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同样明白,它的逻辑[f. 163]被推到极限,会将历史导向:在解释剩余现象时居于低层的角色。

社会知识的海妖歌声是历史在被奴役或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抵抗的诱惑。且从这个抉择开始,我们必须去了解另一个重要的三层图式,另一个“**历史意义**”,它主导了地

中海作为历史主体的定义,与主导它的书写。在重复行动的长时代之上,前两个阶段再一次呈现给我们,贸易经济与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结构——为其提供场所,随其而转变——之时代。但是,在第三个阶段,速度增加与理性化成长之间的关联被翻转了。最快速的海洋就是战斗与事件的海洋,那些事件“**微光乍现地穿越历史**”,它们才刚出生,便殒落到它们虚幻地发光之黑夜中,如同巴伊亚(bahianaise)暗夜的磷光。[1] 在历史书写的阶序里,由最迟缓到最快速的路径便是失落的可理解性之路径。[f. 164]它并没有从最简单走到最复杂,却从最深刻的部分走到最肤浅的。

历史理性的战斗不停地在这两个前线进行:对抗事件的乍现微光,与国王、使臣或穷人的喋喋不休;[2]同时

① [法注 6—9]*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2e éd., t. II, p. 223. [英注 6—11]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2:901.[译注]此处英译为“the phosphorescence of the Portuguese shores”(葡萄牙海岸的磷光)。然,巴伊亚(Bahia)在巴西境内。参见 Braudle, “The Situation of History in 1950,” *On Histor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0—11.

② [译注]此处冒号后的中译与英译在断句上的解读不同,英译为:“against the firefly glows of the event and of the chattering of the kings, the ambassadors, or the poor”(对抗事件之乍现微光,与国王、使臣或穷人的喋喋不休之乍现微光)。

也要对抗经济法则与社会知识的征服理性。因为发展中之交换与理性化之社会这个“**生动的时代**”，也就是“**喋喋不休的时代**”，一个说太多的时代，它在战斗的接续下隐藏了物质生活之分量“巨大”(au poids «immemse»)与“**难以觉察**”(au bruit «à peine perceptible»)的现实。因而必需“**反转这个阶序**”，[c.82]意思是要反转遍历了(parcouru)这个时代的意义之指义：将那些商业扩张的输家“优先放在前景”，那些输家也就是“**那些群众本身，尽管他们仿佛置身于历史上这个生动、喋喋不休的时代之外。**”①当代的资本家与学者之精确计算，就和使臣、编年史家、小册子作者的喋喋不休一样，欺骗地、虚幻地附着到“清楚明显”现实上。对于世界时代之经济的度量再度成为一个国内的度量。[f.165]它必须从一个时代的地质学中得到它的意义。且在此地质学中，理性之遍历的意义被反转过来：最原生的就是解释的原则，或说是意义的母体。历史这个生动又喋喋不休的时代要是明白可解的，

① 〔法注 6—10〕*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 *op. cit.*, p.12.〔英注 6—12〕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xv.

唯有当它紧紧相系于几近不动的时代，这些宏大持久性(grandes permanences)①的空间化时代。胜利者自夸创造了历史，然而是“**输家**”给予历史以非历史的基础，而若无此就没有历史特有的可理解性。而这个长时代，几近不动的地中海时代固着在它的拟古主义里，让它无法以速度的观点与他者较量。这正是历史性的时间，此时间铭刻的表面让历史的出现成为可能。

因而透过此历史性时间(temps historial)②，透过这个原初地理学的时间，历史的意义就这样形成了。只有历史时间的地理学化，能够让这场由长时段与集体现象对抗国王与事件之编年史的战斗，不会导致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的独断王权。再一次，它不是一个关于土地或环境的因果问题。历史性的空间首先是一个象征空间，[f.166]一个作为意义生产者的时间铭刻表层。在一切自然决定论上，象征功能的过度给予了布罗代尔式的空

① 〔译注〕permanence 的意思不仅指连续且持久之特性，同时也可指能够确保组织机关持续运作的事务，此处的宏大(grandes)持久性即意指前述所提到的大规则或大原则。

② 〔译注〕指以历史学方法所形成的时间分期。

间观念,它的独特性,特别在他用来谈论地中海世界之物理(*physique*)统一体的章节中可以察觉到。我们知道此物理统一体之确定,需要重新拉回到地中海的中心,当它朝向亚洲沙漠,或者在内海(la mer intérieure)——地中海的特有称呼(*proprement dite*)——的汉萨港口[①]而扩散。然而内海得到它的统一体,并不只是像一个流通空间或者像一个有着相似地形与路径之世界的中心那样。它是透过它的气候(climat)[②],透过一个由其核心加以统御的一致气候。由此,它得到了这个在速度上超过它的现代大西洋(l'Océan)[③]所缺乏之的内在性:[c. 83]"**大西洋(l'Atlantique)也是一个人类的统一体,而且是现今世界中最有力的一个;它也是一个交会处与融合处。然对大西洋(l'Océan)复合体而言,它缺乏一个同色调的核心,一个均一光线的世界,闪耀在地中海的中心,遍布橄榄树的**

① [译注]汉萨(la Hanse),位于波罗的海——欧洲的另一个内海。

② [译注]climat 在法文中亦可转作氛围(atmosphère)来解释,也有环境(mileu)、场所(lieu)的延伸意。

③ [译注]Océan 此处作大写,有指大西洋(l'océan Atlantique, en France)的意思,特别是相对于地中海。参考 *Centre National de Ressources Textuelles et Lexicales*, s. v. "Océan," http://www.cnrtl.fr/definition/ocean(accessed June 4, 2012).

大海[①]。"

一个同色调的中心,均一光线的世界……我们怎能不感受到每个经验描写与每个科学确定上的过度表达?[f. 167]而同样是不经意地,这些以下的分析和阐明,致力于朝着北欧民族的郁灰去画出这幅地中海的单色画:"**在一八六九年的十月,当弗罗芒坦(Fromentin)搭船离开墨西拿(Messina)时提到,'天空灰暗,风儿冰冷,遮蓬上雨丝蒙蒙,我心愁苦,宛如身处波罗的海。'**"[②]以此景象的方式使得内海的光转成暗灰,而在解释时却将其气候上的一致性表现(montre)得像是两种外部力量相冲突的结果:撒哈拉的干燥向北与西延展直至阿摩里卡(Armorica)海岸,而另一股来自大西洋与之相抗的雨水,冲击地中海使其仿佛"**一片覆满白雪的平原**"[③]。在此矩阵意象(单色核心)所呈现的庄严刻板,以及某种不对称之间,似乎系统性地存在着裂隙,这种不对称的差异来自于

① [法注 6—11]*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1e éd., p. 195.[英注 6—13]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1:231.[译注]英文此处少译一句"...d'un bout à l'autre mer de l'olivier."

② [法注 6—12]*Ibid.*, p. 196—197.[英注 6—14]Ibid., 232.

③ [法注 6—13]*Ibid.*, p. 197.[英注 6—15]Ibid., 233.

地中海自身，发生在描写与解释之间，透过吊诡的意象加以凸显：就如同可以此"气候的"统一体用来隐喻那更根本之象征的统一体，唯有它能够把内海形成一个历史主体。[f. 168]此单色核心或同一的光线，早在所有地理解释之前，就已说出了地中海的历史性，也就是"**历史力量**"，承续了皇室的落日余晖。就如同由他处所唤起之"**创造性的空**"(« vide créateur »)[①]，早在因地理上的开放带来自由经济交换所导致的结果之前，便已把自己铭刻进皇室的空缺里，在其中画上国王已死的标志(figure emblématique)，以保存其历史化的力量。

此矩阵意象所定义的，不只是地中海的气候统一体，它定义了"太阳"，作为继承的条件，让地中海得以**取代了国王的位置**而成为历史的主体。它定义了专属于此历程的合法性形式，这个形式，在地中海的身体——论述的形象与可感的形象所构成之身体——中所勾勒出的内容并非气候统一体的，而是象征空间之统一体的。[e. 84]继承了国王的地中海必须要像国王一样具

① 〔法注6—14〕*Ibid.*, p. 1089.〔英注6—16〕Ibid., 2:1239。

有双重的身体，一个是隐藏的知识之身体，另一个是可感的证据之身体。地中海继承自国王的是认识之空间与再辨认之空间两者间的同一性。从事件欺骗性的微光或交换这种太明显的现实，历史科学把我们重新导向隐藏起来难以觉察的现实。[f. 169]然而这些为往昔的国王与今日的经济学家所察觉不到的现实，却在它的同一性当中，让自己被遍历了不同时代而共在于同一个地中海空间的旅人所感知。这些"**人类博物馆的收藏，采集自往昔的人们，且永远延续于今日的人们当中**"[①]：就像一八九七年的阿拉伯船只，仍然近似于达·伽马(Vasco da Gama)[②]当初所借的那艘船；描绘在地下墓穴墙上的三桅帆船，如今仍航行在尼罗河上，同样"**群集的人们，即便在最喧嚣、最壮观的侵袭下，都无法切中深处。**"[③]如果编年史的古老幻象与前来征服之科学与资本所带来的新幻象，能够让自己归结于自身的度量下，

① 〔法注6—15〕*Ibid.*, p. 298.〔英注6—17〕

② 〔译注〕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0或1469—1524)，葡萄牙探险家，史上首位由欧洲直航印度的人。1524年曾任葡属印度总督。

③ 〔英注6—18〕Ibid., p. 298.

那么借由此可能性,在一九三〇年的旅人便可重新找到堂吉诃德、班戴洛(Bandello)或阿莱曼(Mateo Alemán)笔下人物所行经的路途。给予地中海其统一体的不只是橄榄树,更在于重新找到这棵树的可能性,在久远记载中曾被描写的同一个地方。地中海即为一个再次辨认的海洋,一段再次经历的旅程,[f. 170]透过这些物质的痕迹,而与其近似的是书写的痕迹。

地中海统一体因而成为回归之旅的统一体。在档案文件、地理学家的纪录、往昔说故事者的叙述,以及当代旅行者的印象中不断交互引证,我们可感受到对于某种模式的着迷:跟随著书中痕迹去旅行的模式,为了重新找到在书中所描述过的那些确实场所。在《地中海》的第一版明白指出布罗代尔如何着迷于维克多·贝拉尔(Victor Bérard)①的独特事业,此人追随尤利西斯的足迹以证明他的论点:荷马史诗其实是一部地理之书,我们可以重新找到同于荷马所描写的,诸如卡吕普索(Calypso)、阿尔喀诺俄斯(Alcinous)、或那些食莲人(Lotophages)的所在地。我们知道,照相的模仿(*mimesis*)将这种再辨认带入了幻觉,[c. 85]它让我们看到了独眼巨人的洞穴、珀耳塞福涅林中的垂柳、喀耳刻的猪、或阿尔喀诺俄斯的葡萄藤。然而,布罗代尔看来并非因为它的过度而是因为它的不足去批评这种对于幻觉的考察:“**维克多·贝拉尔究其一生去探寻奥德赛故事中的景色。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探寻:[f. 171]但我们不是应该在今日的人们身上去重新找到同于古代史诗中的人物吗?一个有血有肉的尤利西斯,而不仅是在他惊险旅程中的变换场景。**”①有血有肉的尤利西斯……这段对于维克多·贝拉尔的引注(référence)②将不复见于《地中海》第二版,与标题为“**地理历史与决定论**”(«Géohistoire et déterminisme»)之第一部分的结论一同消失。但此书的结论将带着我们,随着新的旅人脚步,再次前往那片仿佛尤利西斯曾经航行过的海面上:“**我的想法和奥迪希欧(Audisio)与杜**

---

① [译注]维克多·贝拉尔(Victor Bérard, 1864—1931),希腊文化研究者,法国外交及政治家。他以翻译荷马史诗《奥德赛》(l'*Odysseé* d'Homère),以及企图重建书中尤利西斯(Ulysse)的旅程而闻名。

① [法注6—16]*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1e éd., p. 299.[英注6—19]

② [译注]请参考第一章对于 référence(指涉)的论述。

瑞尔(Durrel)①**一样，认为所谓的古代(l'Antiquité)可在今日的地中海沿岸重新找到。在罗得岛，在塞浦路斯，观察那些坐在烟味弥漫的巨龙旅店里玩牌的渔夫，你便能对何谓真实的尤利西斯有所概念。”**②真实的尤利西斯：不是那个满口谎言的尤利西斯，是有血有肉的，而非存在于纸上。我们可从荷马的虚构中萃取出真实的尤利西斯，就像从西莫尼德斯这个骗子诗人口中得知真实的达那厄。历史性的地中海，这个给予水手、商人、银行家的地中海以真实之统一原则的单色核心，恰正是同一个书写的海洋，使达娜依与她的小孩安全无恙。[f.172]它是一个场所，透过确保**神话**(*muthos*)与**言理**(*logos*)③的同一

① 〔译注〕奥迪希欧(Gabriel Audisio, 1900—1978)，法国作家与诗人，曾任阿尔及利亚经济与旅游行动办事处(l'Office Algérien d'Action Économique et Touristique)首长。杜瑞尔(Lawrence Durrel, 1912—1990)，脱离国籍之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与旅游作家，著名作品包括《亚历山德拉四部曲》(*The Alexandria Quartet*)。

② 〔法注6—17〕*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2e éd., t. II, p. 516.〔英注6—20〕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2:1239.

③ 〔译注〕muthos(μῦθος)在荷马与其他希腊诗人的用法中，意思是被说出来的话，或者被说出来的事情；亦指叙事或故事、寓言，在荷马《奥德赛》中并未区分μῦθος的真实或虚假，然在柏拉图中便指向虚构，相对于λόγος之真理。logos(λόγος)在希罗多德的使用中，最初的意思是计算；次指关系或数学比例，或文法规则；对于情节、论述、法律与(转下页注)

性，撷取并使意义发生。这样的重合，之所以可能发生在这些社会时代的地质学知识与其供人注目的地理形貌之间，乃因此重合是发生于物质空间与书写空间之间。

皇家的继承，解除了系谱学、编年史与预言对于时间的絮聒(bavard)，接替以物质文明所铭刻的空间，这么做之所以可能，乃因此原初的“**神话学**”①保证了物质空间与论述空间的复原。地中海之一体，既非出于气候、交换，也不是战争，亦非以上的加乘或交织。它之所以为一体，因为它就是**这样被书写而成的**。像这样使得历史主体鲜活起来，响应了修正主义者不如此的挑战，后者相反地让历史事件堕入深渊，不得救赎。这个单色的核心，使地中海如同一个新的历史主体般搏动，也就是书写的核心。[c.86]为了要把国王的历史力量传送到海洋，就必须要有一种历史性或原初的“**地理学**”让四种场所能够彼

(接上页注)原因之说明解释；连续的口语表达、叙事或论辩；衍伸为指一种特别的说话方式，像是神圣言说或神喻；或者有主题的言说。因而此处将logos翻译为言理。参考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s. v. “μῦθος,” “λόγος,”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① 〔译注〕神话学(mythologie)指将muthos与logos同一化产生的研究成果。

此重合，作为地中海的空间：有许多地理限制的世界、[f. 173]交换的世界、死去国王的空位，以及所有空间叙述的原初场所，也就是《奥德赛》(l'Odyssée)，一本书写海洋之书，甚至早在历史学家之名出现以前，其文字便已遍历至回归点，使其成为一块书写的领土，而它同时也是一本完全在书写空间，且书写出空间之书。借此，没有任何异端、宗教战争或者死亡，能够经由**书写**(l'Ecriture)[①]而降临。贸易和征服的大西洋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同一性，而不只是欠缺气候的统一体。如果这片宏大的交换之海，在罢黜了地中海统治世界地位的同时，却没有继承它的"**历史力量**"，那是因为没有一部作品先去完成这趟旅程。且后来的作家们，又纷纷逃离大西洋，投向非洲的黑暗之心、合恩角的天险，或迷人的太平洋小岛。而大西洋的史诗之作，《白鲸记》(*Moby Dick*)，本身却是一部反史诗：利维坦的大西洋(l'Océan du Léviathans)取代了海妖

① 〔译注〕Ecriture 做大写使用时，可指《圣经》。此处加黑楷体为译者所加，表示此处字体为大写，以便与同一字的小写做区别，强调作者借由改变大小写的方法，将该字作同名异义的使用。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凡遇到同样情形时，仍以此方式注明。

们的海域，让人蛊惑，将人吞噬，洪水再度封闭了一切，在此湍乱的无垢中心独留一名幸存者，这个孤儿，也就是此**书**(Livre)[①]的受诅之子，以实玛利(Ishmaël)。

"**塞维亚的大西洋是一个没有过去的空间。**"皮埃尔·萧努(Pierre Chaunu)[②][f. 174]在《塞维亚与大西洋》(*Séville et l'Atlantique*)书中诠释部分的一开始便如此宣称。[③] 大西洋以一种果断的方式，脱离了将其空间与一趟旅程的时间相互重合之史诗(*épos*)写法。从《奥德赛》的例子观之，使得大西洋存在而成为历史对象的那本书，是一本船舰目录。相对于荷马式目录对记忆术的绮想，而塞维亚**招商局**(*Casa de la Contratacion*)的**登记名册**(*libros de registros*)确实能够轻易地标志出新历史科学的范本材料。在整个文学的真空(vide)上，科学得以建立它的处女地，一个以"**统计诠释**"(« interprétation statistique »)

① 〔译注〕关于书(Livre)的大小写意义，请参考第 49 页注 1。

② 〔译注〕皮埃尔·萧努(Pierre Chaunu, 1932—2009)，法国历史学家，专长为拉丁美洲史，及法国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社会与宗教史，首创"序列史"(serial history)方法，带领了法国在量化史学上的发展。

③ 〔法注 6—18〕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Armand Colin, 1959, t. VIII, 1, p. 8.〔英注 6—21〕

来解释大西洋的空间，在这里没有什么事物是不能被测量的。但同样的问题再度出现：这种范本的科学能够写成历史吗？在这六大册表格、序列、图形的最后，作者以统计诠释整合了一百五十年来在塞维亚新世界每一个港口所进出的每一艘船舰的航速与吨位，而提出此一问题：如何从这四千页的展开中，去书写一部统计的大西洋史？最自然的便是遵循此种双重创造的逻辑，[c. 87]创造出一个贸易的空间，[f. 175]并以统计的方式来呈现：

> 因为没有什么可说是于开始时被给予的，在一切皆互为连结的大西洋里，没有什么事物铭刻于开始，因而只能够将每一个机构、每一块领土、每一个航行、开采或交易的模式，定位在它出现的时刻，嵌合于时间的进程当中。如此将可完美地表达出大西洋原初的真理，理解这整个支配的全局，经纬出先前所不存在的结构，一点一点地增添其分量，在一个没有过去的空间上建构出它的过去。[1]

① 〔法注 6—19〕*Ibid.*，p. 11—12.〔英注 6—22〕

这种“**吊诡的**”解答，简单地说，与一般人所期待的看法相反，然而历史学家还是不得不予以摈弃，理由非常简单：如果接受了这个答案，意味着“宣判了自身的不可理解”。[1] 在整个“**教育**”(«pédagogie»)问题的另一边，宣称了一个根本的分割：去遵循某种构成历史对象与其科学解释的言理，而它禁止书写一本可理解的历史之书。于是历史学家选择了“**更聪明**”的答案：一开始就揭露其结构——即空间的阶序——在触及连结了的时间之前。然而，在问题当中的结构事实上什么都不能构成[f. 176]（就像整部作品中的一卷，在没有欠缺的情况下也有所欠缺），这些结构不能先行于任何书写，不能从任何一个神话去双重化大西洋空间的言理。大西洋的空间仍然是一个没有历史性的空间。科学的与叙述的可理解性因而没有可以涵盖的场所。言理与神话依然保持着分离的状态，一本未完成之书。这些书的集成便注定要作为一本未来之书的材料集成。然而这个以科学构成未来的开放工地，同时也是一个“乐在其中”的海洋，将“**构成历史**”

① 〔法注 6—20〕*Ibid.*，p. 12.〔英注 6—23〕

(« faire de l'histoire»)与书写历史之间的差异，投射到无限之中：对于《奥德赛》的研究取代了《奥德赛》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忠实于“**真正的尤利西斯**”(« véritable Ulysse»)。因为在此书引领奥德赛回家之前，借由忒瑞西阿斯(Tirésias)[1]的声音，宣判他必需流浪，直到抵达人们不知大海为何物的国度为止。

① 〔译注〕忒瑞西阿斯(Tirésias)，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盲眼先知。在《奥德赛》第十一书中，当奥德赛前往冥府(Nekyia)获取回家的线索，忒瑞西阿斯为其预言了路途中所必须历经之艰难险阻。

第七章　异端的历史？

[f. 177 | c. 88]在心态的历史与空间的历史之间，历史可理解性(l'intelligibilité historienne)[1]的循环完成了。此乃属于历史的(de l'histoire)——作为一种属于历史的经验与材料——因为在这里充斥着言说过度，这些字切入了生活，造成书写的战争。且有这样一种历史的科学，因为它属于借由回溯那些已被书写的痕迹，以平息战争与疗愈伤痕的书写方式。有这样一种心态的历史，因为存在着异端与制约，属于这些被标记与受刑的身体，是为

① 〔译注〕关于historienne一词的使用请参考第43页注1。此处的可理解性乃是基于历史学研究而产生。

了以荒诞的横断方式打破《圣经》(l'Ecriture)的生命承续,打破从言说戒律朝向身体戒律的神圣关联:为了否定从圣言(Verbe)到圣父与其道成肉身之间的"**真正**"关系,否定了亚当与其肉体之间的关系,[f. 178]否定了复活的身体与天使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此异端的分离解除了语言到肉体、身体到言说之间"**好**"的联结。它因而给予了生命某种暧昧说法,"**完全不像**"一般所言。这种极端的冒险给予了心态史材料,且让后者反将前者赎回。实际上,心态史给予异端言说另一种声音,场所的声音;它给予异端言说一种内在性的身体,一个异教的身体。它因而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规约了宗教的战争,亦即**书写**的战争。它将异端分子——圣经的"**伪造者**"(« falsificateur »)——转化为异教徒。且一个异教徒永远所言为真,[c. 89]因为其言说即为他存在的表现。心态的历史给予字词另一种肉体,既无道成肉身的精微,也没有上天入地的惊险旅程。

但是,若要使此将异端转换为心态的维和规约成为可能,便需要这种异教的肉体——让言说生根的大地之肉体——其本身必得由字词所织成。这片大地给出身体

以言说出偏离生命之书的话语,而这些话语本身已预写于另一本生命之书,生命之书的另一概念。历史的浪漫革命,[f. 179]在于史诗中发现了这本另外的生命之书,将其构想为一本具有原初表现力,在事物的吐息中蕴含意义的内在性之书。在米什莱的时代重新发现了《奥德赛》,视为对于出生土地的歌颂,维克多·贝拉尔则环绕整个地中海以重新寻获其痕迹,且它还给予此空间的新历史其预先书写的表面。

这种领域化言说的与书写大地的循环是奠基式的,但绝不是因它给予了历史科学其研究工具与方法。它或多或少同时给予了别的:实际上,它定义了这些工具与方法之产生物的条件,用以形塑出历史。它给予历史科学任何计算与任何归纳的严格性都无法保障的:其所宣称的真理体制。因为历史,基本上牵连着言说所带来的混乱,永远丧失了实证主义者的资源,即不能以科学对象与经验建构规则的内在明证来取代真理的难题。其通往科学的**属己**(*propre*)之路,得通过**真实树立**(*position du vrai*)的必然迂回。其他社会科学却可更方便地绕过这个部分。[f. 180]它们建构了科学的有效性,达到拟像的极

限，以构作良好的认识与“**不可忽略**”(« incontournable »)的现实的游戏方式去空洞化真理问题。然而历史若要成为科学且**保持其为历史**，只能够透过给予言说以真理体制的诗学迂回。此真理所给予自身的是异教徒道成肉身的真理，一个字词的真实身体以替代流浪的言说(la parole errante)。它并非在一个显著的哲学命题形式中给予自身以真理，而是在叙述的脉络中：在解释的模式底下，但也是在句与句的切分间、在动词的时态与人称、在本义的与比喻的游戏里。

[e.90]因为让历史蒙受其惠的“**哲学**”乃是它不惜一切也不想要听说的哲学，除非以一种可敬的形式——或可说是否定——一种对于科学方法与对象进行反省的形式。柏拉图以来的哲学进展，首先是一种赌注(pari)，将任何叙述——或**神话**[①]——的真实性，当成是**言理的**，当成是模仿的或真实预兆的真实性。历史的进展则本身必需奠基在神话与言理的同一性上。[f.181]但它也必需不断地从被叙述的知识链结中将其抹除，以及不断地从方法和工具上，去否定加诸于素材(*corpus*)上之论述的地心引力。它必需不断地忘记其作为科学的方式，并不是它所希望的存在方式。

异端的神话学规约以及它科学式的否认，理所当然地担负起这个麻烦，把新历史扣押在它不可能的起点面前：即在空无中与被废除的皇家合法性当中所诞生之言说的民主失序。如果新史学在君主、农民，与天主教时代之长时段里找到它所选择的领土，这并非出于对某种静态的人民之时间与场所的民族学者式乡愁。这些时间与场所，唯有将自己提供给建立在新史学论述的可理解性之上的意义运作。唯有透过这个场地，声音与身体的交换能够以其严谨去对抗编年史长篇大论，让国王的历史力量过渡到空间的史诗，让基督教异端失落的声音找到能解释他们的异教身体。在皇家的身体、神圣的言词，与诗学谬思所规秩的同一性所结构出的象征宇宙里，[f.182]大众时代的知识历史必须去寻求前进的路标。接踵而来之民主革命的历史、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工人运动与其传奇的历史，遂落出此场域之外。适合于大众时代的大众历史，只有在对君主时代的言论中方能找到一席之地。借由某种显著的吊

① 〔译注〕请参考第190页注3。

诡，现代大众的历史似乎自愿被放弃，成为编年史与圣徒史这古老种族的后裔。“**令人费解的是**”，一位专家写道，“**工人的历史仍然相当疏离于法国学界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所进行的视野革新。**”[①]要怎么去思考这种疏离？肯定不是方法与工具的问题。因为那些研究君主制长时段的历史学家，与研究现代社会运动的历史学家，[c. 91]同样受教于西米昂与拉布鲁斯(Labrousse)[②]的经济与统计学派。且后者相较于前者，具有在材料上与统计序列上的优势，这些已然部分被建构起来。这也不只是因为现代革命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太过接近于我们的现实性，[f. 183]且激发了更大的参与及不满，而得以充分享有身为科学对象的地位。然而更加构成其缺陷的是它诠释的模式，以及适合对于字词混乱加以规约的书写形式。

像这样的缺陷显然并非偶然。它把持了对象的本性

① 〔法注 7—1〕Yves Lequin, *Les Ouvriers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1848—1914),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1977, p. v.〔英注 7—1〕

② 〔译注〕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 1895—1988)，法国社会与经济史学家，他建立了以经济、社会、文化三点为核心构成的历史学方法，对计量经济史(Cliometrics)的发展有极重要影响。

自身。现代民主与社会运动的本性是去解除那为了替适合于心态史书写与诠释运作而给予材料的象征秩序。民主时代的历史科学不能是它自身历史的科学。因为后者的特性便是去毁灭被异端声音所领域化之处的土壤。言说过度将场所给予了现代社会运动，不让自己被**救赎**(*racheter*)。我们确实可以完美地**化约**(*réduire*)它：工业形态的转变与经济的循环，技术的革新与城市或工厂的社会互动，它们共同提供了将每一个言说过度带回坚固决定性上的某物。且为了使其保持不停地运作，“**意识形态**”的批评又提供了种种变体。科学在其中确实找到了它的价值(compte)，但历史则无。因为后者需要一种对于过度的诗学规约，以一种声音的身体代替另外一种，[f. 184]简单地说，一种对于异端分离的救赎。但是，在现代民主与社会运动的起源，有一种新类型的异端：一种俗人的异端，没有刑求它的宗教，但也没有象征救赎的程序。

对此异端，修正主义者的史笔用它自己的方法来加以标示。将其等同于象征秩序的崩解，以及民主和社会想象之恐怖主义式与替代性增殖这样的结果。然而要能对抗这种灾难式的视角，历史会在最坏的情况下回避它

的对象，在那些更审慎的公式中，民主与社会的异端，借由主张一种从论述阶序到身体阶序之间的新关系宣告了自身。没有什么比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1]选为“形成”(« formation »)英国工人阶级之开幕场景那简朴的一幕，[c. 92]更能够说明此事：在 1792 年一月，伦敦的某个小酒馆里，有九名正直勤奋的工人，秉持独特的信念，即任何具有理性的成年人，就和其他人一样，都具有投票选举议会成员的能力。他们选用以散布此理念的方法是“**通信会社**”(« société de correspondance »)。[f. 185]且此会社所颁布的首条规则，以及任一类似的会社也都作出如下宣称：“**我们会员的人数无限。**”[2]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然而，这确实是异

---

① 〔译注〕E. P. 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作家与和平运动者，著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此书有中文译本《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2001)。

② 〔法注 7—2〕Edward P. Thompson, *La Formation de la classe ouvrière anglaise*, trad. G. Dauvé, M. Golaszewski et M. N. Thibault, coll. «Hautes Etudes», Gallimard/Le Seuil, 1988, p. 21.〔英注 7—2〕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Penquinm, 1980), 19.

端，是为现代社会运动的建构性“**分离**”，这就是他们的自我宣言。政治秩序之象征标记的断裂，在此未知言说主体的构成中有其作用，即在三种命题之关系中自我定义：第一，个人应被算作为另一个人；此言说存有的秩序排除了所有的排除。第二，献身于此命题之实证性的政治主体带有无限的标记，它不具有任何数字，因为它是排除的纯粹否定。第三，适合此政治主体化新模式的言说与联络模式便是通信，与他人之间的单纯联络，而毋须建立起在场与缺席的社群从属关系。现代社会运动在此纯粹断裂或纯粹开放处有了它起源的场所，组织的政治实践与社会知识的客观化模式将于此遭到祛除：它不再是一个阶级，[f. 186]而是“**所有阶级的解消**”(« la dissolution de toutes les classes »)。据我们所知，此公式出自于青年马克思。然而或可借由移除马克思所连结的拆解意象，来更新它的意义。在其数无限的纯粹祈愿中，这个自我宣言的阶级，将其等同于一种无场所的言说行动，与一种不可计算的集体行动，无从辨认。它是主体在政治领域中的降临(l'avènement)，而此主体不过是再跨越与再解离了于论述与身体之间建立汇聚的合法性模式。

社会与民主的时代其实不是大众或个体的时代。它是一个有风险的主体化时代，为一种无限的纯粹开启所引发，以及由非可指定地点的言说场所而构成，这些介在言说阶序与分类阶序之间的言说场所乃是特异之强调。[c. 93]因而由此去投射工人"阶级"之无限的言说场所，不在工厂或军营、街道或小歌厅，而是文本、句子、名词：用以指涉的文本诸如——《人权宣言》(les Droits de l'homme)或《旧约》(l'Ancien Testament)——[f. 187]这些文本容许去强调有另一种经验，由于语言的分离而投入沉默；语言中句子与句子的配置，将原本没有场所可显示，且仅被当成是含糊杂音的事物，转变为可见与可表达的，提升至一个前所未见之主体的公共空间，在此它们拥有新的合法性与形式，经由这些形式可推论出前者；这些字，从指意的共同语言中摆脱：它们是阶级的名字，并不指向任何个体的精确集合，而是名字与状态之间的关系动荡。这就是布朗基(Blanqui)[1]要求追还的无产阶级之名，当他面对法官询

① 〔译注〕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法国社会主义者与革命家。他主张政治革命应由具高度组织的小团体之密谋行动而达成，被称为布朗基主义。

问他的职业为何时，他在愤怒中如此回答：**无产阶级**事实上并非一般所理解的一种职业，或者说行业；它是一种更为古老且具有全新意义的职业，一种从属于社群的宣称，而这个社群就正是算入了那些不可数的。这些非阶级的阶级之名，其自身所结合的是行动的名字，这些行动并不回应任何的行业规约，也不回应任何被定义(解放)的学徒关系，而是去调整新轨迹的无限空间，[f. 188]借由让言说的与历史的主体游历在物质场所与象征场所之间、名字与身体之间、条件与知识之间的风险间隙。

民主与社会的历史性(l'historicité)[1]所特有之异端，应将其设想为一种双重计划。在激发与伴随现代社会运动兴起之偏常宗教与异议知识的快速膨胀当中，它首先将自己标记为经验性的。E. P. 汤普森出色地指出，工业革命、工作条件，与各行各业的传统，如何无法在英国自行孕生出一

① 〔译注〕historicité 的意思指可被记述成为属于一个时代的历史之特性。但与第六章所阐述的历史性(historialité)有不同的强调(请参考第171页注2)，在本章的脉络中，不仅强调此历史性是经由书写而产生，并且所属于它的时代。然而根据第179页注2所标示的段落所示："或说是一般而言主体形成历史之可能性"，朗西埃对于 historicité 的使用为综合了全书对于历史性的讨论，故在本章中仍翻译为历史性。特此说明。

个阶级与工人运动。为此它的经验必需落实在一场书写战争的经纬中，在这场战争里，人权的新宣言，交错着圣经预言与《天路历程》的谕示，再次地动员，并按照新的界线来划分宗教歧见的能量。[f. 189|c. 94]工业或爱情的新宗教、教育革命与自学进修、荒诞的语言学与新语言、非正统的(hétérodoxes)医学知识与诊疗、通俗天文学以及对遥远的世界、过去和未来之玄想，如是诸般交错，形成让主体得以存在的连结网络，要在此网络之外去思考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或至少应该依旧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种经验的散布遵循着一个更基本的逻辑。在知识与异端信仰所铺陈的荒诞轨迹中去捕捉工人主体，并不标示出时代理念对于一个尚在襁褓中的运动之原初构成的单纯影响。它实现了民主时代历史主体之特异的存有模式。所谓民主时代，并非由其身体与言说统治了一个层级阶序世界的主权之专有名词，也不是科学借由其性质上的融贯而予以定义的阶级之一般名词。它们是特异的名字，错误的专有[①]与

①［译注］propre之前皆翻译为特性、本义或属己，此处翻译为专有，为与共有(communs)对照。

错误的共有，一群既无场所也无身体的作伙存有(être-ensemble)[①]；作伙存有作为一个介于其中的存有(être-entre)：介于许多的场所与许多的身份之间，许多定位的与认同的模式之间。这种异端或现代漂浪(errance moderne)具有一种前所未闻的性质：它等同于法律的原理自身，借由宣布身为人与市民的权利，[f. 190]将民主的主体设立在其无限的裂隙与相互竞争中，并同时使其历史脱离了从属的保证，而置身于结合的不确定性当中。

此民主主体"本身"的原则性区分，可说是只能够在妥协形式中加以规约的米什莱式革命。它想要借由与过去和解以缝合民主的区分。它找到一种避免了民主降临时，造成弑君断裂之显著暴力的方法。在革命对峙的暴力之外，它发明了一种意义的逻辑，一种对其双重出身的思考，将法治的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u droit)附着于大地的矩阵。言说场所的逻辑，缔结了科学、叙事与政治的三重契约。借由串连起在沉默意义之叙述中模仿的絮聒

①［译注］ensemble表达"在一起"的社会学意义，于此段脉络下采取较口语的翻译方式。

声音，它进行着一种双重运作：使现代的共和国根植于其历史与其领土里；开启了一种君主与宗教裁判时代之历史的民主诠释，一种以大众与长时段历史为观点的诠释。它给予了主权在民的政治与学术性历史一个共同的场所。[f. 191 | c. 95]而它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它采用了自己的方式，以一种主体的逻辑，此主体名之为**法国**。妥协来自于如此道成肉身，将民主主体性的流浪性质，归属于同一的主体。以此观之，年鉴学派的历史，也就是一种解放或遗忘——进步或反动——的历史，从妥协的主体与政治条件来看：历史的主体变成了客体，或应该说场所，并列于其他场所之间，提供给历史的诸客体；长时段不再关联于出身与降临；言说场所的逻辑被固定于民俗史（ethno-histoire）。就这样，对于君主与宗教裁判时代的民主诠释将自己解放到心态史中，当历史学家成为无人的小孩，仅仅是所有应募于科学工地之劳工的手足兄弟。

我们可以说，隔离"新"历史与其所属时代的显著吊诡，便是这种遗忘的代价。固着在救赎弑君暴力与异端分离的任务上，学术历史遗忘了此救赎的意义与条件。

将其简单地等同于促进历史论述的科学化。[f. 192]因而使得自己无法再更新契约。且空间的历史、长时段的历史、心态的历史之成功，反而强制不能去思考皇室之死的"**另一面**"，即其所散布的象征暴力：将主权的属性分散到民主主体化的风险与社会异端的循环当中。但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米什莱式的契约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妥协，一种绝望的意志，想要将民主的断裂封闭在法国主体的共和国-未来（le devenir-républicain）当中。因而它将历史构作为一种降临的叙述，一种前历史（préhistoire）的历史，被召唤来自我废除于一个正义的共和国之历史尚未发生的年代里。当它赋予了共和时代得以思考与书写其前历史的方法，同时也禁止了去思考一种属己的历史以及它的书写形式。它将共和时代从民主异端中解放出来。后者反而借由其特质的自身发展，献身于去不确定地解除科学救赎异端之诗学公式规则。

将民主与工人时代的社会史放置于心态的大历史边缘之困难，[f. 193 | c. 96]因而不在于我们自愿将它放在何处：不论是在原因的争战里，或在经济与社会决定论之健全唯物主义与意识形态原因之虚张声势彼此的对立

中。思考现代社会运动的异端本性，并非去恢复诸“**理念**”(«idées»)与“**意识**”(«conscience»)的角色。决定言说存有的生命，同等且更甚于劳动与其报酬之负担的，是名字与其缺席的负担，字词被传诵与被书写、被阅读和被了解的负担，与其他一切事物同为物质性的负担。因而问题无涉于原因的良好阶序。它涉及真理的体制，将历史论述与其对象链接起来。民主与社会异端已然被上千次地谴责为一种“**新宗教**”。但这种“**宗教**”却不能同其他宗教一般地领域化与变更信仰。字词过度无法在自己之中自我主宰，除非冒险去撤销隶属于其宣称的历史力量与历史意义。因为民主与工人时代的社会历史旋即落入两难：或将自己化约为专有名词的编年史，既不再组织任何的论述合法性，也不再组织任何历史意义——成为研究某一战争、军事、党派、工会或报纸的专题论述。[f. 194]或者成为一种科学，将这些作为局部或单点表现之表面上的个体性与滋扰，借由决定其底层的实在性，引领回它们的基础上。但是，在编年史的专名与科学的共名之间，是历史特有的材料与论述，要冒着再次消失的危险：它特有的材料，即言说的事件，是为言说存有献身于其言说真

理所形成的轨迹；它的论述，即为这个事件在叙述与科学之对等中的再次铭刻。

确实社会史有时认为找到了脱离此两难的方法，只要去填满介于经济与社会决定论的严格性，以及展现(manifestation)与论述事件性之间的裂隙。对社会与民主的言说过度而言，它认为已发现了一个场所。称之为**文化**(*culture*)或**社会性**(*sociabilités*)。这些概念将字词过度反映回存在模式与生产方式的表达上。但是书、大地、与墓穴在领域化以及对此过度的救赎上却付之阙如。最多有可能为其指定住所。[f. 195]“**人民的社会性**”或“**工人文化**”便填补了从物质生活到言说事件之间深度的想象裂隙。[c. 97]且与此同时，也堵塞了设立于多处场所与多重身份之间，民主的作伙存有——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人——之间隙。这些他们企图去解释的，就这样为之消逝。对于工人言说的解释可代表性地证明，因为缺乏汇集的大地或海洋，这些解释被归结为行业的文化，且在当中，无差别地，形成了傲慢的合格或痛苦的不合格等表现。不管实在论者如何陈说，这些字词总是比事实还要顽固，且行业，一旦它在社会冲突中被唤起与被

主张，便使得此间的联系得以表白，究竟是隶属于奴役或**圣职**（*ministère*）的荣耀，就像**公开声明**（*profession*）可以是**宣言**（*déclaration*）的光荣或**供认**（*aveu*）的耻辱。**普罗**（*prolétaire*）这个名词在它的拉丁文字源里（献身于单一生产的众庶）要解释得更为清楚，远胜过步履蹒跚的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所给的"**严格**"定义。不论我们如何推论种种行业的伟大与衰落，一位工程师，[f. 196]当他成为一名社会斗争者，开始时首先是一名打铁匠人（homme du fer），一位打字员首先是一名文字匠人（homme de la lettre），而裁缝一开始是一名衣冠匠人（homme de l'apparence）。且当那些鞋匠在各处即将揭开工人运动的序幕时，与制鞋业的兴衰是丝毫无关的，重要的只有一个事实，长久以来，在圣与俗的书写当中，他们是最常被指名、提及、特别是被诅咒的名字。

社会斗争者的身份因而不是某些团体或次团体的"**文化**"表现。它是一种名字的发明，为了担负起对于论述阶序与事物状态阶序之间关联的象征构造予以肯定或否认的种种言说行动之代价。首先是对于他者言说中固有排除之否认，举例来说，当现代的罢工运动宣布它"**在假装我们不像其他人一样是人的政府底下**①"。它也是对于被指定为被排除者的认同，当公共空间里出现对于"**人间受难者**"（« damnés de la terre »）的呼吁，或对于"**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 nous sommes tous des juifs allemands »）肯定的回响。它最终成为对空间与时间的开放，让不算数的人得以被计算，[f. 197]当组织肩负起这个任务；"**你们与人类的敌人战斗……为了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②"。此否定、认同与开放的三段公式，同等地肯定了社会主体宣言的基本特征：[c. 98]此谓之**异言**（*hétérologie*），一种他者的逻辑，树立在字与物之间，在一种属己身份的意识条件下——即便是模糊的意识——所

① 〔法注 7—3〕Grignon, *Réflexions d'un ouvrier tailleur...*, Paris, 1833, in Alain Faure et Jacques Rancière, *La Parole ouvrière*, UGE, 1976, p. 74.〔英注 7—3〕〔译注〕此处引用数据之完整书名为 Alphonse Grignon, *Réflexions d'un ouvrier tailleur sur la misère des ouvriers en général, la durée des journées de travail, le taux des salaires, les rapports actuellement établis entre les ouvriers et les maîtres d'atelier, la nécessité des associations d'ouvriers, comme moyen d'améliorer leur condition*. [*Signé: Grignon.*], L.-E. Herhan, 1833.（《一个成衣工人对一般工人不幸的反省，工作时间、工资、劳雇关系、工会作为改善工人处境媒介的必要性》）

② 〔法注 7—4〕1796 年伦敦通讯会社对其秘密成员的指示，引用自 E. P. Thompson, *op. cit.*, p. 19.〔英注 7—4〕E. P. Thompson, 16.

不可思考之处，唯有在面对他者的观点时才能够被表述，在以下三种形象的游戏当中：用名字来指明位置的主人；用从语言借来与诈取的名字所组织而成的新身份；被排除的绝对他性，可以是受难者，但也是**无言者**（*l'infans*），再也不说话的人。文化的概念，不管是应用到古典的认识上，或鞋子的制造上，其结果即为抹除了运作在许许多多命名与其建构的脆弱中之间隙的主体化活动：在声音场所中身体的缺席，在身体场所中声音的缺席，[1]为历史主体所通过的断层或间隙。它等同且局限了仅于场所或身份的裂缝中方才具在的存有。

[f. 198]文化史因而完全不能够告诉我们造成社会斗争诸般形象的理由，就像"**当时的社会学家**"不能够告诉我们"**事实上**"什么是社会阶级，以及它们在法国大革命里的关联。真理无关于辅助科学。历史也不能够把它的问题推给某个历史领域或假设的次领域，就像不能够把它的问题推给姊妹科学或辅助科学。社会史与文化史

① 〔译注〕请参考本段"在以下三种形象的游戏当中……"所说明之运作方式。

并非能够牵起友谊之手的历史领域。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名字：其意义程序取决于它如何定义历史性——或说是一般而言主体形成历史之可能性[1]——且其书写形式则要铭刻在叙述文类与真理形象当中方得以算数。我们历史科学的问题首先在于与"**它的**"历史性之间必要且不幸的关联——也就是民主的历史性：主权属性与从属逻辑的分散，人与公民之不确定的差异，不论任何言说存有或者任何言说者随机集合所具有的可能性，[f. 199]不论如何都是历史的主体。亲子的逻辑以及专属于浪漫时期共和历史之意义的领域化程序，在此失去了它们的力量。而历史学家很容易便对于将叙述与真理两相集成的可能性彻底绝望。在每一个叙述的可能形象里，他都会看到两难的出现：或者是叙述与其对待命运中主角的仁慈，[c. 99]抑或由科学来解消他的声誉；或作为抒发自我梦想的人民大史诗，还是数字除魅的严格性，甚或是真实的、日常的与家庭生活中令人沮丧的枝微末节。他将自己设立在悬置的逻辑中，不管是否自愿：对于民主与社

① 〔译注〕请参考第209页注1。

会历史性的主体与事件而言，总是太靠近我们的感情与愤怒，太容易被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仿佛只有借由在科学保证或科学主义者的救赎中增长，真理才得以获胜。这种增长，当然，永远是不充分的。然而这欺骗的游戏本身反而产生了一种对于"主体"而言逐渐扩大的不便，以及对叙述而言一种重新产生的怀疑。即便冒着让此怀疑回头，从政治严格性的立场，[f. 200]去指控学术上不充分的危险。假使马克思主义对于"它的"时代的历史贡献无多，假使其历史科学自身也在其前历史的历史中被专业化——比方说农业的危机、商业的降临、与君主时代的心态等等——借由此循环逻辑的必然性，便使得对历史论述的政治怀疑，响应了对其主体的科学怀疑。这便是何以马克思主义被宣告为过期，但这么做本身却没有打开任何新的道路。两种怀疑的形象只能够相互结合，为了扭转民主与工人时代的历史，从企图取得专属于它的计算当中，而共和的浪漫革命已然这么做过，且心态史因此获益：其所专属的计算即为一种对于知识条件的诗学运作。

心态史活在米什莱反文学的文学工作里：发明了一种在叙述中意义内在的叙述、一种借由属己之道以撤销异端之荒诞的叙述。多亏有此发明，让心态史能够将异端失落的声音与穷人生命无足取的轨迹，领域化至两本伟大的生命之书上，一本是基督教的圣言成为血肉之书，[f. 201]一本是异教的书写大地之书。工人与社会史这种不可想象的荒诞，除了两三个例外，其禁止自己去想象——然而对它而言这也是完全必要的——简单地说，也就是，去发现一种诗学。且无疑地，为了要发现，它必需要在文学革命方面更进一步：在小说与史诗分道扬镳之处，在民主协调的并列句型继承了君主从属的句法之处，[c. 100]在对伟大生命之书的背离之处，以及对语言与主体化模式的多样性采取行动之处。要脱离介于人民**史诗**的幻影、数字的严格性，或日常琐碎之间令人绝望的进退两难，就必须将自己隶属至文学为了集成个体的轨迹，以及数字的法则、日常生活的微光与神圣文本的烈焰而发明的新逻辑：我们可以从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例子，学习如何创生"**在行动之间**"的叙述，就在与民主时代的主体以及他们对明日的等待之相同沉默中，脱口而出一句的承诺里("**好呀，当然，如果明天天气**

不错的话，兰塞太太说。但是你们得天一亮就起床"[1]；或请看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f. 202]如何从一个残缺不全的名字(Charbovari[2])之无意义中，引出一个被支解生命的历史；又或随着乔伊斯(James Joyce)之新尤利西斯(Ulysses)的跋涉，在岛屿上、都会里，以及其妻的欺瞒当中，在他笔下的殖民城市里兜圈，为语言的多样性所撕裂，于一方面透过另一方面，交错地误用基督教与异教的生命之书；甚或随同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3]，当他"**试图重建一个巴洛克祭坛**"，于其叙述中纵向句法的暴长——这种"**填缝的水泥**"(«ciment bouche-trou»)或"**黏稠的白酱**"(«gluante béchamelle»)能将所有遗迹的意义凑合在一起——以及被重新发现的生命所索述的独立，在脱骱的句子中，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滋长与反地中海的愿

① [法注7—5] Virginia Woolf, *La Promenade au phare*, Le Livre de poche, 1968, p. 15. [英注7—5] Virginia Woolf, *To the Lighthouse*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0), p. 3.

② [译注]"Charbovari"出自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主角Charles Bovary第一天入学时因紧张而只能拼出自己姓名的模糊音节。参考彭愈霞，《小说人名的翻译——以《包法利夫人》为例》，《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春季号，2009。

③ [译注]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 1913—2005)，法国小说家，于1985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景相关联：地-海或书写的母亲，从此以后疲于再做历史的"**粪坑**"(«cloaque»)或"**阴沟**"(«égout collecteur»)。[1]

无疑地，有些此类的游览，对于民主与工人时代的历史而言是必要的，其有助于计量其主体，以及发明适合形成悬置真理的书写形式。然而在知识规则的保证与真理冲击的随机性之间的张力下，[f. 203]每一种科学都有此倾向与其特有之确定性的反向理性对赌。且在被称为当代历史中的沉重怀疑，太轻易便将自己推向科学性招揽的双臂与勋章，而不是去寻求描绘属于其时代历史性的形象。严肃科学与文学的对立，十分自然地自我提供了退却为美德的转换。"**文学**"为了消除疑虑而宣告放逐，其所想要祛除的仅仅是：[c. 101]当拒绝被化约为不过是数字与图表的语言，历史已然接受了把其论证的命运链接到程序的命运，借由共同语言产生与促使意义的流通。在此共同语言中，证明档案与曲线组成了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总是预

① [法注7—6] Claude Simon, *Le Vent, tentative de restitution d'un retable baroque*, Editions de Minuit, 1957, p. 137—8. [英注7—6] Claude Simon, *The Wind*,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59), 144.

设了一种选择,关于语言的力量与它所链结的力量。没有一种字词集结(assemblage)是不运作这种选择,不在此意义下创作"文学",而引发表露(monstration)或证明(démonstration)的结果。问题因而不在于知道历史学家是否应该产生文学,而是他产生了何种文学。在实践上,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一样很清楚地知道,如何偷偷中断统计结果的分析,以插入微小的叙述[f. 204]——教师的簿记、儿时的回忆、以郊区居民为本的小说——一举提供了肉体与意义。然也正是这种不光彩的诗学本身,立刻拒绝了它所运作的,把一种意义的语言与程序替代至另一种。它把微小的叙述转换成微小的窗口,在数字诉说"它们的"语言处开放了时间。它将自己作成一种貌不似真的文学断片,像是把过去的教科书切割开来,为了如同镜像一般地去再现语言的与事物的图表。假使它依然模仿将意义领域化的米什莱式程序,它也是悄悄进行,已然感应到这种方式不再属于诗学所必须要思考的时代,然在此同时,于大多数的情况下,时代也停止了对此的思考。

诗学形式的问题,端视历史如何能够书写,因而严格链接到端视其对象如何被思考的历史性模式问题。米什

莱已然发明了一种诗学,作为一种肯定的历史性,作为法国主体与共和国形式的系谱学。惧怕这样的发明,[f. 205]当代历史只能够禁止去思考其所面对之历史性的形式本身:感性经验的形式、时间的知觉形式、知识的与信仰的关联形式,远与近、可能与不可能的形式,这些将民主与社会的时代构成了一个等待的时代,被未来的帝国所治理的时代;名字与无名的经验形式、属己与共同的形式、意象与认同的形式,[c. 102]它们同时朝向对于社群想象以及对于个体性发现的等待。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种奇怪的吊诡,心态史不再对于时代的感觉感兴趣,精确地说,当时代发狂失控,当未来成为个人行动与集体行动的基本维度;它也不再对信仰感兴趣,当后者进入政治与社会行动的内在性,而颠覆了在场与非-在场、可见与非-可见之间,于其领土上标记出可感的基点之关联。这种无兴趣将构成历史(*faire de l'histoire*)的良好方法对立于相信自己在创造历史(*faire l'histoire*)之时代的徒然幻影,实际上将其导向一种被充分决定的限制:[f. 206]历史的牺牲等于对科学信仰的肯定。这种牺牲可以一种温柔的形式,让历史消逝在社会科学或政治科

学里。也可以采取一种宣告对象结束的形式。“**历史的终结**”(« fin de l'histoire »)就这样标告在我们当下的阶序中。这个名词就我们通常所指，是为某种特定历史性的终结，社会与民主异端被封闭的间隙，在这两世纪以来恶劣或错误的历史，为了工业与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利益，最终通往其本性的和谐发展。然而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字指为在历史中信仰的终结，如同理性形象的终结。

这种信仰的终结本身可具有两种形象。有时采取让历史在更深奥或更睿智的科学阴影下悔罪的形象。也可以采取百科全书式大工地的形象，在它的充实与修正这种无止境的劳作中开启——关阖：如此虽使得历史脱离了同名异义的危险，但或许最终将自己缩减至摘要与传递的工作。晚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控历史科学致力于，经由其理论本身，[f. 207]无止境地将过去交付给胜利者。当然，现在与当时激发他在《历史哲学论纲》(*Thès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中那种绝望口吻的情况无法相比。但在今天去宣告此后开启了一个无历史的时代，且将一切完全归功于“**赢家**”(« gagneurs »)的无耻愚昧，却清楚显现了某种二择一的选项：或者历史

一开始便将自己隶属于巩固其“科学的”辨识，冒着让它特有的冒险被清除之危险，由其前历史的百科全书供应给胜利者的社会。[c. 103]或者它一开始就感兴趣于探索那不可预见之交错中的多重路径，借此使得可见与可说的经验形式得以被领会，正是这些形式构成了民主时代的特异性，且亦容许去再思考其他时代。它感兴趣于书写的形式，这些书写形式使得它在其时代的交织中可以被理解，在数字与意象、在字词与符征的组合里。为此它同意于其特有的脆弱性，同意于它从历史的制作者与故事的叙述者之可耻亲缘中所持有的力量。[f. 208]有位历史学家最近感叹于来自“**邻近学门**”(« disciplines adjacentes »)之谣言与多余的纷扰，将“**信心危机**”(« crise de confiance »)引入了他的学门，想要使历史学臣服于文本与其解构的邪恶帝国，臣服于实在与想象之致命的无区分。① 我们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历

① [法注 7—7]Lawrence Stone, «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 *Past and Present*, n 131, mai 1991.[英注 7—7]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1(1991): 217—18. See also, in 133(1991): 204—209, Patrick Joyce's response.

史,除了当关涉到形成它的时间时,它特有的困乏,或者当它面对于形成其对象之感性物质——时间、字词与死亡——时的恐惧。历史并不需要保护自己免于任何外来的侵略,它只需要达成和解,与其属己之名。

“轻与重”文丛(已出)

01 脆弱的幸福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孙伟红 译
02 启蒙的精神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马利红 译
03 日常生活颂歌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曹丹红 译
04 爱的多重奏 [法]阿兰·巴迪欧 著 邓刚 译
05 镜中的忧郁 [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 著 郭宏安 译
06 古罗马的性与权力 [法]保罗·韦纳 著 谢强 译
07 梦想的权利 [法]加斯东·巴什拉 著 杜小真 顾嘉琛 译
08 审美资本主义 [法]奥利维耶·阿苏利 著 黄琰 译
09 个体的颂歌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苗馨 译
10 当爱冲昏头 [德]H·柯依瑟尔 E·舒拉克 著 张存华 译
11 简单的思想 [法]热拉尔·马瑟 著 黄蓓 译
12 论移情问题 [德]艾迪特·施泰因 著 张浩军 译
13 重返风景 [法]卡特琳·古特 著 黄金菊 译
14 狄德罗与卢梭 [英]玛丽安·霍布森 著 胡振明 译
15 走向绝对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朱静 译

16 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

[法]保罗·韦纳 著　　张 竝 译

17 图像的生与死　[法]雷吉斯·德布雷 著

黄迅余　黄建华 译

18 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

[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 著

张 亘　夏 燕 译

19 伊西斯的面纱　[法]皮埃尔·阿多 著　　张卜天 译

20 欲望的眩晕　[法]奥利维耶·普里奥尔 著　　方尔平 译

21 谁,在我呼喊时　[法]克洛德·穆沙 著　　李金佳 译

22 普鲁斯特的空间　[比利时]乔治·普莱 著　　张新木 译

23 存在的遗骸　[意大利]圣地亚哥·扎巴拉 著

吴闻仪　吴晓番　刘梁剑 译

24 艺术家的责任　[法]让·克莱尔 著

赵芩岑　曹丹红 译

25 僭越的感觉/欲望之书

[法]白兰达·卡诺纳 著　　袁筱一 译

26 极限体验与书写　[法]菲利浦·索莱尔斯 著　　唐 珍 译

27 探求自由的古希腊　[法]雅克利娜·德·罗米伊 著

张 竝 译

28 别忘记生活　[法]皮埃尔·阿多 著　　孙圣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 / (法)雅克·朗西埃雷著;魏德骥,杨淳娴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5751-2

Ⅰ.①历…　Ⅱ.①雅…②魏…③杨…　Ⅲ.①历史哲学　Ⅳ.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9890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历史之名

论知识的诗学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雅克·朗西埃
译　　者　魏德骥　杨淳娴
责任编辑　王莹兮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1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751-2/B·1047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